

A SHORT  
HISTORY OF THE

#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从伦敦的阁臣到广袤战场上的将军，  
从英国红衫军、黑森雇佣兵  
到西班牙无敌舰队、北美民兵，

从伦敦、海牙、直布罗陀到波士顿、  
好望角、牙买加；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 美国 独立战争 简史

1775 ~ 1783,  
一场造就了美国的战争

（英）斯蒂芬·康威◎著  
邓海平◎译

以独特视角将北美独立战争放入全球  
的大视野下进行全新解读，

全面呈现这场源于北美，最终席卷西欧、  
北美、西非、南亚、南美的  
全球帝国之战！



化学工业出版社

# 美国独立战争简史

斯蒂芬·康威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 版权信息

---

书名：美国独立战争简史

作者：斯蒂芬·康威

书号：978-7-122-30595-4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目录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大事年表](#)

[主要人物](#)

[序](#)

[导言](#)

[第一章 通往莱克星顿的漫漫长路](#)

[第二章 为美国而战](#)

[第三章 世界之战](#)

[第四章 平民](#)

[第五章 战争结局及解析](#)

[第六章 尾声](#)

[延伸阅读](#)

#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来自于英国I. B. Tauris出版公司的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写作严谨、可读性强，对于我们在21世纪理解和研究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见仁见智的历史争论，这一系列独辟蹊径，试图基于史实本身对其做出全面而公正的解释，这样既能激起普通读者和历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也能进一步感染广大的历史学习者及专业学者。因此，在讲述历史领域的重要主题、思想史、宗教、政治、古典研究、哲学观点等内容时，本系列丛书特意避免使用平淡乏味、冷漠刻板的方式进行陈述——那只是给初学者讲授史学入门知识的通常做法。长期以来，这一系列丛书一直致力于给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特定历史概况的基本史实。但除此之外，这套系列丛书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例如，书中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解释过去的人们在特定的背景下是如何理解某个历史主题，以及其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这种新颖的分析方式十分具有借鉴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更好地理解这些特定的历史主题。

此外，对于这样的历史主题，各位作者在此系列中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虽然作者们已经暗示了某种答案，但还是在每本书后的“延伸阅读”中提供了长长的参考书目，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做进一步的阅读与探索。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中众多的历史主题，相较于市场上其他同类丛书做了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和解析，同时内容却简洁而紧

凑，不愧是“在介绍历史知识方面更为出类拔萃”的代表。本套系列丛书结合质疑性和查证性的分析，对相关历史做了全面的描述，可以说是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数字时代大背景下，为读者了解和研究历史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斯蒂芬·康威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康威的叙述清晰，一点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越过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争论，这个争论的核心就是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美国独立战争，到底是应被看作一场关于地方自治的战争更好，还是一场关于争夺本土统治者地位的战争更好？相反，康威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美国革命，它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康威的这本书揭示了战争的深层原因在殖民时代早期就生根了，而它广袤的枝杈遍布各地——从波士顿到孟加拉，从费城到菲律宾。作者紧凑地叙述追踪了北美、加勒比、西非、南亚，以及众多战场的最前线。康威探索了多场战争、多个大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场残酷的内战，一场殖民地解放的斗争，一场欧洲的、北美的，最终又演变为全球的冲突，以及一场造就了美国的战争。康威眼中的独立战争是一场政治和文化的冲突，但首先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军事史上所有最具偶然性的、戏剧性的桥段，轮番上演。一众人物——从伦敦的大臣，到广袤战场上的将军；从为自由而战的非裔美国人，到呼吁结盟的美国土著居民，再到寻求安全与稳定的妇女——人们在此可以直面血腥的“暴乱”与伟大的战略。这是一位史学大师挥斥方遒的杰作，在我所知的作品中，它是独一无二的。

——简·卡门斯基（Jane Kamensky）

布兰迪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斯蒂芬·康威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对这场战争采用了一种显著放大的视角：从北美英国殖民地的叛乱到欧洲势力的干预，到这种对抗在全球的蔓延，再到英国出人意料地将战后问题料理得很好。康威将这个枝蔓芜杂的故事抽丝剥茧，其讲述权威，令人信服。他证明了，虽然英国人没能保住13个北美殖民地，但他们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却有充足的财政资源和海军实力挺过这场艰苦的战争，并比他们的敌人经营得更好。这本简史就是理解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起始点。

——艾拉·D. 格鲁伯（Ira D. Gruber）

莱斯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

美国独立战争研究方面的杰出学者斯蒂芬·康威写就了一本卓越的通识性著作，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适合阅读。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这场战争置于国际化历史语境中进行考量，包括欧洲、加勒比地区、地中海地区和印度。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地说明了：英国军队和舰队在全球是多么分散，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军事需要是如何挤占了英国在美国要赢得战争所需的资源的。他超越了许多著述仅局限于国内因素的做法，揭示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年代是英国现代史上最为孤立的一个时期，而且当时英国也面临着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交战以来第一次严重的入侵威胁。康威给出的英国失去美国的原因令人信服。与此同时，他广博的见解揭示出这场战争中英国并没有一败涂地，因为它在1782年与波旁王朝的对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使法国陷入了“破产”境地。

——安德鲁·奥肖内西（Andrew O'Shaughnessy）

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 大事年表

1607年 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建立。

1619年 弗吉尼亚下议院第一次会议召开。

1620年 激进的英国新教教徒定居者在新英格兰建立了普利茅斯种植园。

1621年 詹姆斯一世的枢密院发布命令，要求弗吉尼亚的烟草必须先运到英国，然后才能出口到其他地方。

1624年 弗吉尼亚成为皇家殖民地。

17世纪30年代 查理一世考虑将清教新英格兰殖民地交给费迪南德·戈吉斯管理，而后者是清教徒的敌人。

1649年 查理一世被执行死刑。

1651年 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航海法令》，对殖民地海外贸易进行了规定。

1660年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航海条例》中的第一部法案通过（其他法案分别是在1663年、1673年和1696年通过的）。

1684年 马萨诸塞因为坚持拒绝受《航海条例》的管理而被撤销了

其殖民地宪章。

1685年 詹姆士二世建立了新英格兰自治领。

1688～1689年 英国光荣革命，詹姆士二世被推翻，新英格兰自治领退出历史舞台。

1696年 英国贸易部建立。

1702～1713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得英国政府更加关注殖民地。

1721年 沃波尔成为首席大臣，并在后来的20年中主导了英国的政治生活。他对殖民地事务采取的放任做法意味着殖民地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自治。

1739～1748年 英—西冲突发展成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战争（如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一样）使得英国政府对殖民地更为关注。

1748年 哈利法克斯伯爵成为贸易大臣，并试图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

1754年 英国殖民者和法国殖民者的第一次冲突在俄亥俄山谷发生；欧洲的七年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

1756年 七年战争爆发。

1757年年末，威廉·皮特向殖民地提出，将它们的地位提高到省一级，并由议会向其提供补贴，以便解决其招募地方军队的成本问题。

1758年 在皮特的新提议之后，殖民地议会招募了比以往规模大得

多的军队。

1759年 英军占领魁北克。

1760年 蒙特利尔陷落，这意味着七年战争的北美部分实际上已经结束。

1763年 巴黎和谈结束了英国和波旁王朝列强之间的七年战争。《皇家宣言》的颁布暂时停止了殖民地向西扩张，从而避免了与土著居民的冲突，并促进了新教教徒在魁北克这个新占领省份的定居。

1764年 议会通过的《岁入法案》特别规定要对进口到北美殖民地的糖蜜征税，以便可以为英国驻军筹集军费；议会还通过了《货币法案》，要求在殖民地流通纸币。

1765年 乔治·格伦威尔的《印花税法案》，本意是要筹集更多的资金来维持驻扎在美国的常规军，结果却引发了整个殖民地的强烈反对。

1766年 议会撤销了《印花税法案》，但同时通过了《北美宣示法案》，该法案主张英国对殖民地享有主权；罗金汉侯爵内阁的《岁入法案》降低了对北美殖民地进口的糖蜜征收的关税，但将这种关税扩展到了所有的糖蜜上——不论这些糖蜜是从英国进口的，还是从外国进口的。

1767年 议会批准了查尔斯·汤森德提出的关税法案，对英国出口到北美的一系列特定商品征收关税。

1768年 反对海关的暴动促使英国政府向波士顿派兵。

1770年 英国士兵向波士顿人开枪，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作“波士顿大屠杀”；诺斯勋爵说服国会废除所有的汤森德关税，仅继续对茶叶征收关税，这是唯一一个富有成效的关税。

1772年 信用危机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773年 《茶叶法案》试图促进廉价茶叶在北美的倾销；诺斯勋爵说，他希望能够从汤森德茶叶关税上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也帮助东印度公司；北美爆发大规模抵制茶叶运输船只靠岸的运动，最后在12月演变成了“波士顿茶党事件”（亦称“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4年 议会通过了《强制法案》[Coercive，又称《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就茶党事件对波士顿进行惩罚，并重组了马萨诸塞政府；各殖民地为协调反抗行动而召开了大陆会议。

1775年 4月：英军与殖民地民兵在马萨诸塞发生冲突。

5月：美军占领了提康德罗加。

6月：邦克山战役爆发。

7月：大陆会议向乔治三世送交了橄榄枝请愿书。

8月：王室宣布殖民地处在造反状态；法国政府派出一名代表与大陆会议协商。

11月：圣约翰的英国驻军向美国人投降；议会通过了《美国禁运法案》，根据该法案，皇家海军可以扣押任何殖民地商船；邓莫尔勋爵试图招募弗吉尼亚奴隶为王室效力。

12月：美军占领魁北克市的企图被挫败。

1776年3月：英国军队撤离波士顿。

5月：法国政府决定向美国人提供秘密援助。

6月：英军企图占领位于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附近的苏利文岛，但未能得逞；最后一批美军士兵撤离加拿大；英国军队在纽约州的斯塔滕岛登陆。

7月：大陆会议宣布反叛英国的各殖民地成立独立国家。

8月：华盛顿的大陆军在长岛战役中失利。

9月：英军占领纽约市。

10月：瓦尔古岛战役和白原战役爆发。

11月：英军占领纽约的华盛顿堡，并开始入侵新泽西。

12月：英军占领罗得岛的纽波特，并一路追击华盛顿的军队到特拉华；华盛顿大胆反击，在新泽西的特伦顿将英军的一支黑森雇佣兵分遣队彻底击溃。

1777年1月：华盛顿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击溃英军一支分遣队。

7月：伯戈因的军队重新占领提康德罗加，并在哈巴顿击败美军。

8月：豪的军队在马里兰的麋鹿河头登陆；伯戈因军队的一支分遣队在本宁顿战役中失利。

9月：豪在布兰迪维因小溪打败华盛顿；豪占领费城；弗里曼农场战役爆发。

10月：日耳曼城爆发了一场战役，不分胜负；伯戈因被迫在萨拉托

加投降。

1778年2月：法美签订联盟协议。

4月：法国地中海舰队离开土伦港，跨越大西洋。

6月：英国军队撤离费城；在新泽西爆发蒙莫斯战役。

7月：法国和英国舰队在阿申特岛海域交战；法国舰队出现在纽约海域。

8月：法美联军围攻罗德岛的纽波特。

9月：法国占领多米尼加。

10月：本地治里落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之手。

12月：英军占领佐治亚的萨瓦纳及圣卢西亚。

1779年1月：法国占领塞内加尔的圣路易。

3月：美军在南卡罗来纳的布莱尔小溪遭遇失利；法国在印度马埃岛的据点被英军占领。

4月：法—西联盟缔结。

5月：英国远征军侵扰弗吉尼亚。

6月：英国在现今缅因州的佩诺布斯科特建立据点；法国占领圣文森特。

7月：法国占领格林纳达。

8月：法—西联合舰队在普利茅斯港停泊。

9月：法美联军开始围攻萨瓦纳；西班牙占领英国在西佛罗里达的军事城堡。

10月：萨瓦纳围攻解除；英国占领位于现今洪都拉斯的奥莫阿。

1780年4月：英军占领尼亚加拉湖附近的圣胡安城堡。

5月：英军占领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并在沃克斯华击败美军。

7月：法国远征军在罗得岛的纽波特登陆；海德·阿里开始进攻卡纳提克。

8月：康华里在卡姆登击败霍雷肖·盖茨。

9月：英军在波利勒被海德·阿里击败。

10月：美军在国王山的胜利阻止了英军向北卡罗来纳的进军。

12月：英国政府宣布对荷兰共和国开战。

1781年1月：塔尔顿在哈瓦那的考彭斯被摩根击败；英军打退了法国对泽西的进攻。

3月：在吉尔福德法院战役中，康华里取得了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英军占领荷兰的圣尤斯特歇斯岛。

4月：格林在南卡罗来纳的霍布柯克山战败。

5月：西班牙占领西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

6月：法国占领多巴哥。

7月：拉法耶特侯爵在弗吉尼亚的绿泉被康华里打败；艾尔·库特在波多诺伏打败海德·阿里。

8月：法美联军开始从纽约向南往弗吉尼亚进军；库特再一次在波利勒击败海德·阿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荷兰在帕当的工厂；英国和荷兰舰队在北海的多格滩交战；法西联军开始围攻米诺卡岛的圣菲利普。

9月：英国和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湾河口进行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英军撤退到纽约市对舰艇进行维修；库特在绍林格再一次打败迈索尔王国军队。

10月：康华里在约克镇投降。

11月：法国重新占领圣尤斯特歇斯岛。

1782年1月：英军占领荷兰在亨可马里的基地。

2月：英国驻军在米诺卡和圣基茨岛投降；蒂普苏丹在坦焦尔打败英军；英军未能攻占位于西非埃尔米纳的荷兰据点。

3月：西班牙占领位于现今洪都拉斯的里奥内格罗英军基地；诺斯勋爵内阁倒台。

4月：罗德尼在桑特海峡战役中打败格拉斯；法国占领古德洛尔；罗金汉侯爵内阁在伦敦就职，并开始与美法谈判。

6月：库特在阿尔尼打败迈索尔军队。

7月：罗金汉侯爵去世，谢尔本伯爵继任首席大臣。

8月：法国对哈德逊湾公司发动了突然袭击。

9月：英军驻直布罗陀军队击退了敌人的主攻。



11月：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巴黎达成了初步的和平协议。

1783年1月：英荷停战。

6月：法、英军队在古德洛尔交战，直至他们听说初步和平协议在巴黎已经签订的消息后才停战。

9月：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正式的和平条约——《巴黎和约》。

1784年1月：蒂普苏丹继续在印度进行战斗，占领芒格洛尔。

3月：蒂普苏丹与英国人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

5月：英荷签署和平协议。

# 主要人物

阿蒂马斯·沃德（Artemas Ward，1727～1800），美国将军。作为一名参加了七年战争的老兵，沃德指挥新英格兰民兵围攻了波士顿的英军。直至华盛顿到来之前，他一直都担任指挥官。

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bell，1739～1791），1778年年末占领佐治亚萨瓦纳的英军指挥官。坎贝尔后来曾担任牙买加副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政治家。他是罗金汉侯爵领导的政党的成员，而且也反对向美国人开战。他在战争爆发前曾提出一个和解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得到议会批准，那么战争可能就不会爆发。

艾尔·库特爵士（Sir Eyre Coote，1726～1783），英国将军。七年战争中在印度服役，之后在1777～1783年间于孟加拉担任总司令。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劳内男爵（Baron de Laune），法国政治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在1774～1776年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反对法国向美国叛军提供援助，但在与法国内部更为强大的韦尔热讷伯爵的斗争中失利。

奥古斯丁·普雷沃斯特（Augustine Prevost，1723～1786），出生于

瑞士的英国将军。在1756年皇家美国军团（Royal American regiment）刚建立的时候，普雷沃斯特就加入了这支队伍。1779年，他在南方指挥英国军队，并成功顶住了法美联军对萨瓦纳的进攻。

巴纳斯特·塔尔顿（Banastre Tarleton, 1754~1833），英国军人。他在美国南部指挥的是忠于英王的地方军队“英国军团”（British Legion）。一开始他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后来于1781年1月在考彭斯战役中被丹尼尔·摩根打败。他获得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这个名声由于不断在大众喜闻乐见的有关这场战争的小说和电影中再现而被固化下来。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美国博学家、科学家，著名政治家和杰出外交家。他从1776年年末开始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也是参与1782~1783年和平谈判的美国代表之一。

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 1733~1810），美国将军。他在1780年5月在查尔斯顿向亨利·克林顿爵士投降，但1781年10月，他又在约克镇接受了英军的投降，算是挽回了脸面。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 1741~1801），美国将军，他早期取得的成就完全被后来在1780年叛变的事情给掩盖了。阿诺德在加拿大和萨拉托加指挥大陆军，但当他计划将西点交给亨利·克林顿爵士的企图败露之后，他逃到了英军那里。

伯纳多·德·加尔韦斯-马德里（Bernardo de Gálvez y Madrid, 1746~1786），加尔韦斯伯爵（Conde de Galvéz），西班牙军事指挥官和殖民地官员。1779年，作为路易斯安那领地的总督，他带领西班牙军队进攻

英国的西佛罗里达。1781年5月，他的军队占领了那里所有英军阵地。后来他担任了新西班牙总督。

查尔斯·格拉维尔（Charles Gravier, 1717~1787），韦尔热讷伯爵（Comte de Vergennes），法国政治家。在路易十六时期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韦尔热讷伯爵成功地说服法王，法国政府应该利用英国在美国发生麻烦这个有利时机。在美国战争之前，他是法国最有权势的大臣，并统领了法国谈判代表团于1782~1783年间在法国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

查尔斯·华生-温特沃斯（Charles Watson-Wentworth, 1730~1782），第二代罗金汉侯爵，英国政治家。他在1765~1766年组建了一个短命的内阁，撤销了《印花税法案》。在扮演了许多年反对派的角色之后，他于1782年又重新短暂掌权，并开始就结束战争展开谈判。

查尔斯·康华里（Charles Cornwallis, 1738~1805），亦译为查尔斯·康沃利斯，第二代康华里伯爵（2nd Earl Cornwallis），第一代康华里侯爵，英国将军。从1776年直至1781年英军在约克镇投降战争结束，康华里一直在美国服役。战场上的失败，并没有妨碍他在英国的帝国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之后，他担任了印度总督，后又调任为爱尔兰总督。

查尔斯·李（Charles Lee, 1732~1782），美国将军。和盖茨、蒙哥马利一样，李以前也是英国军官。1776年夏天，他带领美国军队打退了英军对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进攻，但1776年12月在新泽西被英国骑兵部队俘虏。1778年俘虏交换之后，他回到大陆军继续指挥作战，但他的名声终毁于他在蒙莫斯战役中的所为。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英国政治家。福克斯是一位反对对美国人开战的著名人物。1782年，他成为罗金汉侯爵内阁的外交大臣。

查塔姆（Chatham），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词条。

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1736～1802），美国将军。1781年1月，他于南卡罗来纳州的考彭斯打败了由巴纳斯特·塔尔顿指挥的英军和本土保皇派军队，从而声名鹊起。

蒂普苏丹（Tipu Sultan，1750～1799），于1782年末继承其父海德·阿里，成为迈索尔的统治者。蒂普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甚至比他父亲还要出色。他在南印度击败了英国军队，并在巴黎和平协议已经签署之后，仍然继续与英军战斗。

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1733～1804），美国将军。斯凯勒是一个纽约大地主，1775年他在大陆军赢得了很高的职位。尽管他名义上是入侵加拿大的总指挥，但实际上美国军队是由蒙哥马利带领的。由于被怀疑有失败主义情绪，甚至是同情敌人，1777年，他的北方军队司令的职位由盖茨接任。

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亦称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78年他对法国的盟友奥地利开战，这曾经一度使英国人燃起了两国重新结成在七年战争中那种英—普联盟的希望。

弗朗索瓦-约瑟夫-保罗（François-Joseph-Paul，1722～1788），格拉斯伯爵（Comte de Grasse），法国海军上将。在1781年9月的切萨皮克战役中，他打败了英国海军上将格雷夫斯率领的英国舰队，这使得康

华里在约克镇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不过，几个月之后，在桑特海峡战役中，他又被英国海军上将罗德尼所打败。

弗朗西斯·罗顿（Francis Rawdon, 1754~1826），罗顿勋爵（Lord Rawdon），英国将军。在参加了北美的大部分战役后，当康华里向北进军的时候，他则指挥南卡罗来纳州的英国军队在霍布柯克山打败了格林。后来，他在印度的职业生涯亦很出彩。

弗朗西斯·皮尔逊（Francis Peirson, 1757~1781），英军军官。1781年在守卫泽西的战斗中阵亡。他因北美画家约翰·辛格顿·科普利关于这一事件的著名画作《皮尔逊少校之死》而名垂史册。

弗雷德里克·霍华德（Frederick Howard, 1748~1825），英国外交官，第五代卡莱尔伯爵（5th Earl of Carlisle）。1778年，他被诺斯勋爵内阁委派为代表团团长，与美国人进行和平谈判。但大陆会议拒绝接见他。

弗雷德里克·诺斯（Frederick North, 1732~1792），诺斯勋爵（Lord North），英国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担任首相，直至1782年3月辞职。“诺斯勋爵”是一种荣誉称号。他是第一代吉尔福特伯爵（1st Earl of Guilford）的儿子，同时也是下议院议员。诺斯并非出色的战争指挥家，但他为英国的战争活动筹措了相应资金。

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冯·施杜本男爵（Baron von Friedrich Wilhelm Steuben, 1730~1794），美国将军。七年战争期间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之后，冯·施杜本担任大陆军的总监察长，并依据欧洲练兵方式训练大陆军。他后来成为华盛顿的总参谋长。

盖伊·卡尔顿（Guy Carleton，1724～1808），英国军人和殖民地总督。他在1775年12月成功保卫了魁北克，在1776年被授以爵士身份。1782年，卡尔顿在亨利·克林顿后继任北美英军的总司令，之后指挥了英军1783年撤离纽约的行动，并于1786年成为第一代多切斯特男爵（1st Lord Dorchester）。

海德·阿里（Haider Ali，约1720～1782），迈索尔的统治者。1780年他在波利勒打败了英国军队，但却在1781年一系列的战斗中被库特打败了。

何塞·莫尼诺-雷东多（José Moñino y Redondo，1728～1808），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Conde de Floridablanca），西班牙政治家。从1777年开始，他在西班牙卷入战争的整个期间担任首相。

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1730～1795），英国将军。七年战争中于德国服役。从1775年开始在美国服役，1776年受封为爵士，并于1778年接替威廉·豪爵士成为北美英军的总司令。

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1727～1786），美国将军。他之前是英军军官，之后因为在萨拉托加取胜而声名鹊起，一些美国人一度认为他是比华盛顿更好的军事指挥官。然而，后来在1780年，盖茨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登遭遇康华里，结果惨败。

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亦称凯瑟琳大帝，1729～1796），1762年成为俄罗斯女王。凯瑟琳是德国血统。1775年，凯瑟琳大帝拒绝将军队借调给英国政府。1780年2月，她又决定成立武装中立国同盟，以保卫中立船只不被英国皇家海军所扣押。

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1705～1784），英国商人和外交家。他被罗金汉侯爵内阁任命为1782年巴黎和谈的英国政府代表，并在与美国人达成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理查德·豪（Richard Howe，1726～1799），第四代豪子爵（4th Viscount Howe），英国海军上将。1776年2月至1778年7月期间担任英国驻北美海军总司令。他（及其弟弟威廉）也是可以接受美国投降的英国特别授权代表。不过，他选择同美国那些起义者进行谈判，而且这种谈判经常超出了他的授权范围。

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1738～1775），美国将军。他以前是英军军官，而且个人一直保持着对英王的忠诚。在1775年的最后一天，他在魁北克带领美国军队参战时阵亡。

路易十六（Louis XVI，1754～1793），1774年即位为法国国王。他支持（尽管有一些犹豫）法国干预战争以便为美国人提供支持，首先是提供武器、弹药和金钱，后来则派陆军和海军直接参战。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1676～1745），英国政治家。他在美国危机发生很早之前就已掌权，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至少要为这场危机承担部分责任。他对美国事务的放任策略，导致这些英属殖民地在18世纪20至30年代发展出了相当程度的自治，这使得它们对于英国政府试图在18世纪60年代开始采取的强化控制的措施，更为抵制。

玛丽-约瑟夫-保罗-伊夫斯-罗-吉尔伯特·杜·莫提尔（Marie-Joseph-Paul-Yves-Roch-Gilbert du Motier，1757～1834），拉法耶特侯爵



（Marquis de Lafayette）。他是一名从1777年开始在大陆军中任职的法国军官。1781年，在华盛顿到来之前，拉法耶特侯爵指挥着弗吉尼亚的美国军队。

纳撒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1742～1786），来自罗得岛的美国将军。战争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普通民兵，后来成为大陆军负责军需的将军。从1780年开始，他担任南部地区的指挥官。

皮埃尔-安德烈·德·萨弗伦·德·圣-特罗佩（Pierre-André de Suffren de Saint-Tropez，1729～1788），法国海军上将。在这场战争中，萨弗伦于包括北美水域和加勒比海内的许多战区服役，但他的声名是从佛得角群岛 普拉亚港（Porto Praya）[注1](#)对英军舰艇进行的大胆进攻，以及在印度和锡兰海域与英国皇家海军的战斗中确立的。

乔治·奥古斯都·艾略特（George Augustus Eliott，1717～1790），英国将军。他在1779～1783年间的大围攻中担任直布罗陀驻军的指挥官，也因此于1783年被封为爵士，并最终于1787年成为直布罗陀希斯菲尔德男爵（Baron Heathfield of Gibraltar）。

乔治·布里吉斯·罗德尼爵士（Sir George Brydges Rodney，1719～1792），英国海军上将。他在1782年4月的桑特海峡战役中的胜利，使得牙买加免遭入侵，这很可能帮助了在巴黎的英国谈判人员，让他们可以争取到合理的和谈条件，而这也让他的贵族身份进一步提升，成为罗德尼男爵。

乔治·格伦威尔（George Grenville，1712～1770），英国政治家。1763～1765年间担任首席大臣，正是他第一次试图在七年战争之后对北

美殖民地收税。他对于自己制订的印花税计划尤为执迷，他认为这个计划执行起来简单，而且会被美国人接受。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1775～1783年间任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原是一位弗吉尼亚的绅士，后被大陆会议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这部分是因为他在七年战争中的经历，部分也因为他是一个南方人。他后来成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乔治·杰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1716～1785），英国政治家。他在1775年11月取代达特茅斯伯爵继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此后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1782年2月成为萨克维尔子爵（Viscount Sackville）为止。杰曼是负责这场战争的主要英国大臣。

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自1760年起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乔治支持诺斯勋爵内阁及其进行的这场战争，很不情愿地接纳了罗金汉侯爵内阁以及美国的独立。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往往被夸大，尽管在与德国诸王谈判向美国派遣援助部队的过程中，他的德国关系发挥了作用。

让-巴普蒂斯特·杜纳坦·德·维缪尔（Jean-Baptiste Donatien de Vimeur，1725～1807），罗尚博伯爵（Comte de Rochambeau），法国将军。1780年他带领法国远征军开赴美国，并率军直抵约克镇将其包围，就此基本上结束了北美的战斗。

让-巴普蒂斯特-查尔斯-亨利·德斯坦（Jean-Baptiste-Charles-Henri Estaing，1729～1794），法国伯爵，海军上将。他在1778年带领土伦舰队穿越大西洋，并在当年7月抵达了纽约海域。这一年晚些时候一直到

1779年，他分别对罗得岛的纽波特和佐治亚的萨瓦纳的英军造成了军事威胁。

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1719～1787），英国将军。他在1763～1775年间担任英国驻北美军队总司令，战争爆发时为马萨诸塞总督。盖奇的一些下属怀疑他非常不乐意使用武力。之后他被更为广受欢迎的威廉·豪取代。

托马斯·格雷夫斯（Thomas Graves，1725～1802），英国海军上将。1781年任英国驻北美舰队司令。当年9月他被格拉斯伯爵在切萨皮克战役中打败。

托马斯·佩拉姆-霍里斯（Thomas Pelham-Holles，1693～1768），第一代纽卡斯尔公爵（1st Duke of Newcastle），英国政治家。纽卡斯尔公爵在沃波尔任内阁首领时期担任国务大臣，而且一直认为应该避免与殖民地发生宪政冲突。他十分长寿，在他的努力运作下，《印花税法案》在1765年被废除。

托马斯·苏利文（Thomas Sullivan，1740～1795），来自新罕布什尔的美国将军。苏利文参加了围攻波士顿的战役，在北部战区作战，并参加了1776年的纽约战役。他试图在1778年从英国驻军手中抢占纽波特，但未能成功。之后，在1779年，他在与边疆地区土著居民的战争中遭遇惨败。

威廉·豪（William Howe，1729～1814），英国将军。1775～1778年担任北美英军总司令。豪在1776年10月13日因为在美国服役的经历而被封为爵士。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之后，他旋即辞职，并在随后的

几年中试图挽回自己的名誉。

威廉·亨利·拿骚·德·鸠勒斯坦（William Henry Nassau de Zuylestein, 1717~1781），第四代罗奇福德伯爵（4th Earl of Rochford），英国政治家。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担任南部国务大臣<sup>注2</sup>。他曾希望通过强调欧洲各帝国在镇压殖民地起义上有共同的利益这一点，来说服波旁王朝列强不要卷入这场冲突。

威廉·怀尔德曼·巴林顿（William Wildman Barrington, 1717~1793），第二代巴林顿子爵（2nd Viscount Barrington）。他担任英国陆军大臣（负责陆军）直至1778年12月。他对于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镇压美国反叛持怀疑态度，倾向于进行海上封锁。

威廉·莱格（William Legge, 1731~1801），第二代达特茅斯伯爵（2nd Earl of Dartmouth），英国政治家。战争开始的时候，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但在1775年11月被更为有冲劲的杰曼取代。

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 1737~1802），第二代谢尔本伯爵（2nd Earl of Shelburne），英国政治家。他是1782年罗金汉侯爵内阁的殖民地事务大臣，且在罗金汉侯爵去世之后成为首席大臣。他领导的内阁与美国人和美国人的波旁朋友们进行了和平谈判。

威廉·皮特，“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 1708~1778），第一代查塔姆伯爵，英国政治家。他是主导七年战争的掌玺大臣，在殖民地很受欢迎，当他赞同撤销《印花税法案》之时，就更受欢迎了。但是，他在1766~1768年间组建的内阁试图对美国人征税。1775年，他提出了一项旨在解决英国政府和殖民地之间纷争的计划。

威廉·皮特，“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英国政治家。他是老皮特的儿子，1782～1783年间在谢尔本伯爵内阁治下任财政大臣，并在1783年年末，年仅24岁时，成为首席大臣。

休·佩尔西（Hugh Percy, 1742～1817），佩尔西伯爵（Earl Percy），英国将军，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的儿子和继承人。他曾指挥救援部队成功使英军在1775年4月19日从康科德撤离。后来，他又在罗得岛指挥作战，但因为与豪将军不和而辞职，并于1777年返回英国。

约翰·安德烈（John André, 1750～1780），英国军官。安德烈被美国人以间谍罪处死，当时他参与了一个密谋计划，试图劝说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位于纽约西点的一处重要战略要塞交给英国军队。

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 1723～1792），英国将军。他从1775年开始在美国服役，当时他是和威廉·豪、亨利·克林顿一起来到被围困的波士顿的。他最为人所熟悉的角色是，英军1777年10月在萨拉托加投降时，他正好是英军指挥官。后来他成为议会反对派的支持者。

约翰·达林（John Dalling, 约1731～1798），英国军人和殖民地官员。达林曾在1777～1782年间担任牙买加总督，后来在印度任职，并于1783年被授予准男爵的爵位。

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 1732～1808），美国政治家，费城律师。他在《一位宾夕法尼亚州农场主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1767～1768）中，阐述了美国人对议会征税权的抵

制。在大陆会议上，他是一名温和派，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了反对独立的立场。尽管他自己不愿意美国与英国断绝关系，但是，他在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担任了公职。

约翰·杰伊（John Jay，1745～1829），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纽约人。杰伊是大陆会议主席和驻西班牙大使。他参加了1782年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

约翰·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1739～1800），美国政治家。在1779年担任南卡罗来纳总督的时候，他似乎愿意将查尔斯顿交给普雷沃斯特，作为交换条件，南卡罗来纳则可以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1718～1792），第四代桑威奇伯爵（4th Earl of Sandwich），英国政治家。桑威奇伯爵在战争中担任海军大臣，但在1782年辞职。他更倾向于将英国的海军力量集中在英国附近海域，以便保护英国诸岛不会遭到侵略，但又被迫与那些希望将海军部署在帝国范围内各个战区的同事达成妥协。

约翰·穆雷（John Murray，1732～1809），第四代邓莫尔伯爵（4th Earl of Dunmore），殖民地总督。作为弗吉尼亚最后一位皇家总督，在1775年11月，他试图召集该殖民地的黑奴们为英王效力。他后来成为巴哈马群岛总督，在那里，他曾表露出过对奴隶的同情之情。

约翰·沃恩（John Vaughan，约1731～1795），英国将军。他在北美服役，并在詹姆斯·格兰特之后继任西印度群岛英军司令官。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美国政治家。波士顿律师和大陆会议马萨诸塞州代表。亚当斯后来成了美国的第二任总统。

约瑟夫·约克（Joseph Yorke, 1724～1792），英国外交官。作为驻海牙的大使，他劝说英国政府，一旦爆发英荷战争，会强化亲英派的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力量。

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 1720～1806），英国将军。他于1775～1778年间在美国服役，在法国卷入战争之后，指挥被派驻到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军队。

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uart, 1793年去世），英国将军。他接替艾尔·库特爵士担任南印度地区的英军司令官，但他没能战胜迈索尔的统治者或其法国盟友。

# 序

所有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会欠下很重的文债。我也不能例外。在经年累月对美国独立革命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对美国独立革命的理解，被我所涉猎的其他历史学家的大量作品不断丰富着。本书的注释部分没能真正公平地体现他们对我的思想所作出的帮助。不过，我在文后以“延伸阅读”这一形式进一步表达了对他们的感谢。有一项文债值得特别提及，我从“跨国研究小组”（Contractor State Group）所提出的崭新视角中获得了极大的裨益。跨国研究小组是由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学者组成的一个组织，他们一直在研究18世纪各个欧洲国家战争开支的影响。跨国研究小组已经出版了好几卷论文集，这些论文都令我受益匪浅。更为重要的是，跨国研究小组的成员们在分享他们还未付诸文字的想法方面都很慷慨大方。我的同事和朋友，位于西班牙潘普洛纳市的纳瓦拉大学的拉法尔·托雷斯·桑切斯（Rafael Torres Sánchez），以及英国雷丁大学的乔尔·菲力克斯（Joël Felix），都特别向我详细地介绍了西班牙和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三个人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合写一本书，这本书将从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欧洲国家的视角来审视那场战争。我希望他们会认为我的这本小书将有助于我们实现那个目标。

在和参与编写《牛津美国独立战争手册》（*Oxford Handbook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历史学家们的接触中，我也获益良多。这本书



是由简·卡门斯基和爱德华·格雷（Edward Gray）编写的。2011年2月，我在白雪皑皑的芝加哥市参加了这两位编者组织的一个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我得以和研究美国独立战争的许多前沿美国历史学家进行了探讨。在那之后，简和爱德华还邀请我参加了一场名为“英国的美国战争”的会议。这场会议是在让人感觉非常惬意的加州亨廷顿图书馆举行的，它也激发了我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这场已经稔熟于心的战事的冲突。我感谢所有为那两次会议作出贡献的人，不论是知名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学后进。有这么多新人出席会议，本身就清晰地表明有才华的新一代学者正在重新审视美国独立革命和那场争取独立的战争。

与写作此类简明概要的历史著作的一般情形不同，我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许多档案资料是我在为更早的一些作品做研究的时候，在多年之前查阅过的，但也有一些是为了写作本书而新查阅的。我对以下这些机构的档案管理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位于贝德福德的贝德福德郡档案馆、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伯明翰市档案馆、位于伦敦的英国图书馆、位于艾尔斯伯里市的白金汉郡研究中心、位于梅德斯通市的肯特研究中心、位于伦敦的威廉博士图书馆、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赫尔大学图书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的亨廷顿图书馆、位于莱斯特市的莱斯特郡档案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档案馆、位于伦敦西南部邱园地区的联合王国国家档案馆、位于切尔西的国家军事博物馆、位于都柏林的爱尔兰国家图书馆、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位于阿伯里斯特威斯市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位于格林尼治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位于纽约市的纽约历史学会、位于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诺丁汉大学图书

馆、位于贝尔法斯特的北爱尔兰公共档案馆、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炮兵学院、谢菲尔德档案馆、位于汤顿的萨默塞特档案馆、位于斯塔福德的斯塔福德郡档案馆、位于吉尔福德的萨里档案馆、位于贝里圣埃德蒙兹的西萨福克档案馆、位于利兹的西约克郡档案服务馆、位于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威廉·L. 克莱门茨图书馆。我还要感谢私人藏书家，特别是允许我查阅他收藏在朗利特的文件的巴斯侯爵（Marquess of Bath），允许我查阅收藏在海因斯山庄的克乐敦、加斯和加德索家族文件的伊丽莎白·加德索（Elizabeth Godsal）女士，允许我使用收藏在阿尼克城堡的佩尔西家族文件以及安排我在巴林达罗奇城堡查阅麦克弗森·格兰特文件的奥利弗·罗素（Oliver Russell）。

我还想特别提及我欠下的另外三个文债。首先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历史系。我能够和如此出色的同事一起共事真是一种荣幸，他们的工作总是会激发我更加努力。这些年我教过的学生也激励我重新思考我内心早有定论的许多问题。在脑海中想象他们会对我写下的东西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对于我确定本书的结构和内容有极大的帮助。第二个是I. B. Tauris 的亚历克斯·赖特（Alex Wright），他委托我写作本书，并在我表示怀疑自己是否有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的情况下依旧坚持要我进行本书的写作。尽管我起初有所顾虑，但我很享受重新审视美国独立革命及其战争的整个过程。我要感谢亚历克斯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和儿子，表示感谢。多年以来，他们一直以无比的耐心和良好的心态“忍受”着我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痴迷。

# 导言

正如大多数读者所熟知的，自1775年英国在北美大多数殖民地的反叛所引起的冲突，至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是多重文化冲撞的结果。诸多文艺作品都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场战争：如詹姆斯·芬尼摩尔·库伯（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小说《间谍》（*The Spy*, 1821）和《莱昂内尔·林肯》（*Lionel Lincoln*, 1825）；如一些将事实与虚构杂糅在一起的作品，如肯尼斯·罗伯茨（Kenneth Roberts）的《暴民起义》（*Rabble in Arms*, 1939）；如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戏剧《魔鬼的门徒》（*Devil's Disciple*, 1897）；再如一些电影，比较知名的有罗伯特·迪伦（Robert Dillon）和休·哈德森（Hugh Hudson）编导的《革命》（*Revolution*, 1985），在这部影片中，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担纲主演纽约的毛皮猎人汤姆·达布（Tom Dobb），以及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和罗伯特·罗达特（Robert Rodat）编导的饱受争议的《爱国者》（*The Patriot*, 2000），在这部影片中，澳大利亚影星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饰演了全美英雄人物本杰明·马丁（Benjamin Martin）。

其实，这场战争也不缺乏严肃史学界的关注。战争一结束，相关作品就一直持续在出版，尽管只是在北大西洋的西岸这种作品的出版才真正成为一时的风潮。1976年，围绕美国独立200周年的主题举办了众多纪念活动，大量的相关作品也陆续出版。虽然有些仅仅是写一些陈词滥

调，但更多的意义是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角，尤其在女性和 非洲裔美国人<sup>注3</sup>的作用问题上。最近，史学家又一次聚焦这场战争，试图对它进行重新解读，主要原因是随着美国人口构成发生巨大变化，那些过去在旧有叙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忽略的人群，不论是印第安美洲原住民、非洲裔美国人，还是西班牙裔美国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对待。对很多美国人而言，独立战争这一话题具有永恒的魅力，原因显而易见：这场战争见证了美国这个国家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是如何诞生并存续下来的。而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在重塑世界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美国以外的很多人对这场著名战争也充满了好奇。

考虑到有关这场战争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同时，最近又上市了一些类似的简史类作品，<sup>1</sup>对这段历史进行进一步的探究，看起来就有一定的必要了。对我自身而言，要再进行这种探究需要更多的理由，因为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经出版过一本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通史，紧接着又对这场战争对英国和爱尔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sup>2</sup>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回过头来再次关注这场战争呢？在首次出版有关18 世纪历史的作品之后的许多年中，我对18 世纪历史的方方面面的研究、写作和教学，使我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美国独立战争，并体会认识到了一些事情的重要性，而这些事情，在20 世纪90年代被我自己（和其他历史学家）低估甚至忽视了。新近一些将英国视作一个与欧洲有重要关联的欧洲强权方面的研究，鼓励我重估并修正自己早年关于这场战争的认知。<sup>3</sup>同样地，最近几年学术界对地理，特别是地点、地形和距离的重视，也深刻影响了我。<sup>4</sup>总而言之，通过与致力

于研究18 世纪欧洲战争不同方面的“跨国研究小组”的国际学术同人共同协作，我获得了更多的见解。通过同事们的研究，我对美国独立战争对西班牙的影响亦有了不浅的认识。<sup>5</sup>因此，我很高兴有机会展示我思考的新成果。

在本书中，我采用了大部分历史学家刻意低估甚至忽视的一种写作框架。美国历史学家倾向于将那场战争称作“革命战争”。他们要么将它当作是一场争取独立的战争，因此，战争不过是这场革命的一个附属部分而已；或者，将它当作是一种变革体验，作为革命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不论是将这场战争看作是革命的保障，还是将它视为革命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们，除了极少数例外，都认为这场冲突基本上就是在美国、为美国而发生的。对于那些遵循这种思路的学者来说，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幕是1781年10月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上演的。当时，康华里勋爵率领的英国军队投降了，北美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了。<sup>6</sup>许多英国历史学家的思路同样如此，尽管通常他们更能理解，英国军事指挥官要在离国家这么远的一片地方赢得一场武装斗争是多么困难重重。<sup>7</sup>

只有一些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场战争，并强调这场战争的全球化视角。<sup>8</sup>我在20 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曾试图这么做，但现在我想更大胆地提倡这种全球化的视角，因为这种视角不仅显著地改变了这场战争的面貌，甚至挑战了这样一种传统观念——这是一场简简单单的、美国胜而英国败的战争。本书将这场冲突置于更为广阔背景下，并提出这是一场为美国未来而战的战争，但同样也是一场具有全球意义的战争。



# PACINO REVOLUTION

The war that won  
a nation its freedom,  
a woman her destiny,  
a young man  
his independence,  
and a father  
his son's love.



## *An American Epic*

WARNER BROS., GOLDCREST and VIKING present  
AN IRWIN WINKLER PRODUCTION A Film by HUGH HUDSON

AL PACINO  
REVOLUTION

Starring DONALD SUTHERLAND

NASTASSJA KINSKI

Music by JOHN CORIGLIANO Executive Producer CHRIS BURT Written by ROBERT DILLON  
Produced by IRWIN WINKLER Directed by HUGH HUDSON



Read the Revolution Book

EDITED BY WARNER BROS.  
A WARNER BROS. PRESENTATION



图1 由阿尔·帕西诺出演、休·哈德森导演的影片《革命》。这部影片给人们灌输了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许多神化了的故事。

从1778年开始，当时法国人开始卷入这场冲突，美国独立战争就变得不仅仅是为了美国而发生的战争了。这场战争蔓延到了英法两国发生接触并竞争的全部地域：加勒比海、西非和亚洲。英国和爱尔兰面临被入侵的威胁。在1779年夏天，西班牙人也卷入其中，这使得对手在不列颠群岛登陆的危险变大了，因为波旁王朝的全部战舰数量比皇家海军的要多。西班牙的卷入，进一步扩大了这场战争的地理范围。从那个时刻开始中美洲也成了战场。而英国政府则在不久之后开始野心勃勃地谋划将战争引向太平洋。同时，英国的大臣们也被迫从防御角度进行思考，英国在地中海的前沿阵地直布罗陀半岛和米诺卡岛（Minorca）暴露在了敌人的攻击之下。荷兰人在1780年末加入了战争，使得这场战争的地理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因为荷兰人在西印度群岛、西非、好望角和南亚各地散布的基地成了英国军队的攻击目标。这场全球战争在约克镇战役之后还在延续。1782年4月，海军上将乔治·布里吉斯·罗德尼（George Brydges Rodney）在桑特海峡战役<sup>注4</sup>中取得胜利，使得牙买加免遭法西联军的入侵。直至今日，在约翰·培根（John Bacon）的经典雕塑作品中，穿着军服的罗德尼上将还像罗马皇帝一样俯视着西班牙城广场，这提醒我们这场胜利对于这个岛国的种植园精英阶层是多么重要。在罗德尼的战舰成功保卫了牙买加的这一年，英国军队占领了荷兰在西非的奴隶贸易据点。当初步和平协议签署的时候，围攻直布罗陀的战役还在进行。在遥远的印度，战争持续了数月之久，直至在巴黎的谈判人员最终签署了条约为止。



当然，这里的全球化视角是从英国角度来说的。是英国人在广泛散布于各地的陆上和海上战区内进行着战斗。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场战争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全球战争。但我的意图并不是用一种纯粹的英国视角来反驳那种以美国为战争中心的视角。如果本书仅仅表现为是为英国政客、将军进行辩解，那可就南辕北辙了。<sup>9</sup>我的目标是，说服读者不仅仅要以英国政府的视角来审视那场战争（当然，这种视角是一种有益的视角，它给了人们看待这场纷繁复杂的冲突一个统一的角度），还要从欧洲大陆列强的视角来审视那场战争。对于英国的欧洲大陆劲敌来说，同样对于英国人自身来说，这场战争都大大超出了“在美国发生、为了美国而发生”的范畴。对于法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机遇，可以削弱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得到很大强化的英国强权，并恢复法国的领土和荣誉。如果英国丧失了北美殖民地，它的力量毫无疑问会被削弱。然而，法国的大臣们并不仅满足于此，他们还希望提升法国在西印度群岛、西非，以及或许最重要的，在亚洲的地位。对西班牙政府而言，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个夺回失去土地的机会。在七年战争后割让给英国的佛罗里达是首先要夺回的土地，同时还有诸如直布罗陀、米诺卡甚至牙买加这些地方，它们都是在1655年被英国吞并的。荷兰人不情愿地加入了这场战争，因为是英国迫使他们加入战团的，但他们也有全球野心，虽然这种野心是从防御角度出发的。他们在加勒比地区拥有岛屿，并在南美大陆有一个落脚点。他们的诸多贸易站形成一个大大的弧线，从非洲西岸一直延伸到好望角，并继续延伸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东印度群岛。荷兰人的目标是，尽最大努力在最大范围内保住这些分散的据点。



图2 位于牙买加西班牙城的约翰·培根的雕塑作品。这座雕塑塑造

的是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布里吉斯·罗德尼，他在1782年4月的桑特海峡战役中获得了胜利。

在采用一种全球化视角的时候，我并没有忽略美国视角。这场战争的国际维度，不仅对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十分重要，对于美国人来说也同样重要。美国人取胜了，因为他们从英国王室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了。尽管1775年春天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独立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但从1776年7月开始独立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了。当和平条约签署的时候，他们终于实现了目标，但这可不是轻而易举实现的。不过，如果就此认为美国人是凭借一己之力赢得了这场战争，是非常有误导性的。即使是在战争扩大、波旁王朝和荷兰人卷入之前，殖民地起义者就认识到他们需要外国援助。一开始，援助是以弹药和金钱的方式进行的。但如果要让欧洲列强继续提供更为实质性的援助，这些列强需要看到这样的证据：美国人不仅仅是为了在大英帝国统治下争取一个更高的地位而已。就美国内部而言，尽管《独立宣言》通常被视作一个直截了当的宣告，宣告美国与英国之间最后的关系断开了，但实际上它至少也部分是为了向欧洲列强证明美国对于自己的起义造反是认真的，而且不会再回到英国的怀抱中去了。法国政府一旦清楚了美国人是非常迫切希望独立的，就马上开始进行全面的军事和海上干预。这种在1778年春天终于开始的干预大大提高了美国人实现独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严重依赖远超美国自身的那些事件。克里斯托弗·马歇尔（Christopher Marshall），一位宾夕法尼亚的革命运动积极分子，对于这种发生在远处的事件的重要性可谓一清二楚。在1781年的日记中，他为迈索尔<sup>注5</sup>的海德·阿里汗王重新夺回了在战争

中被英国占领的法国在印度的所有据点进行庆祝（后来证明报道有误）。<sup>10</sup>马歇尔认识到，美国人民实际上卷入了一场全球冲突之中，欧洲国家的行动，甚至是诸如海德·阿里这样的印度王子的行动，都有助于左右英国大臣们决定在美洲安排多少兵力。即便是达成和平条约的具体时间和条款，包括美国巨大的领土范围，也得益于英国和欧洲敌国之间为权力平衡而进行的斗争。

如果说这场战争自1778年起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斗争的话，那么，这场斗争之下的美英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内战。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首先，这场战争让横跨大西洋的英国分裂了。美国殖民者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至少到1776年时还是如此。按照他们的看法，他们是在争取和英国本土公民同等的权利。英国本土的英国人，至少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也倾向于认为美国人是英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于那些同情北美殖民者的英国人来说，他们是大洋两岸的亲兄弟或表兄弟，对伦敦的威权统治政府有同等合理的怨恨。即便是那些反对殖民地行动并支持政府进行镇压的本土英国人，也倾向于将美国人看作是“造反者”。这当然不是什么正面的标签，但至少隐含着美国人依旧是国王子民的意思。令人感到些许意外的是，《独立宣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国人的态度。部分是因为对此大家很早就有了预期了，因此，它出来之后大家也就不感意外了。部分也是因为，有关《独立宣言》的消息马上被英国在1776年纽约战役中取得胜利的消息淹没了，这场胜利让许多英国人相信美国人的抵抗很快就将终结。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双方决定性的决裂并不是在1776年发生的，而是在1778年发生的。当时，美国人和法国人结盟，而法国长久以来一直是英国的对头，这样，美国人就主动离开了英国的怀

抱。<sup>11</sup>

这场冲突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被看作是一场内战。它不仅分裂了横跨大西洋的英国，也同时给英国内部和美国内部均带来了分裂。在英国，人们的观点激烈冲突。很难说到底有多大比例的英国人赞同诺斯勋爵的镇压政策，但可以肯定，在战争初期赞同的人，比战争末期赞同的人肯定要多一些。但在整个冲突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英国人是同情美国“反叛者”的。将这些英国人看作是亲美国的人是不正确的。其实许多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亲美国的；相反，他们只是政府的反对者，担心如果诺斯勋爵内阁成功镇压了美国殖民者，那么下一个被镇压的就轮到英国人民了。<sup>12</sup>美国也被这场战争撕裂了。很少有殖民者有什么要忠于英国议会的想法，因此，只要说的是议会的权利问题，再说什么美国人是忠于英国的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如果问题是殖民地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则有一大批人是忠于国王的保皇派（loyalists）。约翰·亚当斯曾经作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估计，他估计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反对独立的。<sup>13</sup>当代学术界认为这个比例要高一些（或许在五分之一水平）。但是，在所有内战中，忠诚都是不断流变的——可以想见的是，许多人都尽量避免和任何一边走得太近。因此，忠于英王的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数量随着战事进展的好坏而不断发生波动。<sup>14</sup>由于大家都意识到各自都有着相同的背景，因此参与这一事件的人都不大会像对待完全的外来者那样对待自己的对手。<sup>15</sup>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大量证据表明，在美国进行的斗争，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斗争，以及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斗争，有时候看起来就是那种内战中的兄弟残杀。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理、有节，保持着克制，但它依旧有着令人震惊的暴力与残酷。<sup>16</sup>



革命战争、独立战争、全球冲突和内战，所有这些标签，都可以轻松地贴到发生在1775年到1783年之间的那场斗争上去。在一本简史中把握这种复杂性和广度，是不容易的。对于任何试图写作一本简史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要进行取舍的。由于篇幅所限，这场战争中某些有意思的方面就只能一笔带过，而且有些方面则必须完全忽略。

本书基本上是按照时间脉络来写的，尽管并不是一直从头叙述到尾。首先介绍了战争的背景，特别是对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关系之所以破裂的长期和短期因素进行了解释。第二章则讲的是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775年春天直至1777年年末。这段时期，是一场纯粹的美国战争。虽然如此，两边都竭尽全力去向其他国家以及他们自己的人民表明自己事业的正当性。英国人试图说服法国和西班牙，说它们应该乐见美国反叛被镇压下去，因为它们也是两个帝国主义列强，但这种说服工作没有起到效果。英国的一支主力野战部队于1777年10月在上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战败并投降，这让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正式干预计划应该加快推进，以便为美国人提供支持，而美国人已经在1776年向巴黎单独派遣使节了。1778年2月法美联盟出现之前，伦敦的大臣们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从1777年12月开始，他们便为一场范围更大的、更艰苦的对付英国的波旁对手战争做准备，这两个波旁对手就是法国和西班牙。这场范围更大的战争将在第三章中讨论。这一章沿着美国战争的思路进行了探讨，但同时也考查了这场战争范围扩大、进入全球其他地域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波旁王朝及随后荷兰人的卷入、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英国人被迫进入防御态势。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也

在只要可能的情况下，扩大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伦敦当局甚至一度在制订野心勃勃的计划，要将战争延续到太平洋，目的是攻击西班牙在南美洲和菲律宾的防御薄弱的领地。

第四章集中讨论了这场战争对我们今天称之为“平民”的这类人的影响，也就是对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人的影响。当然，取决于一个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这场斗争带来的影响也是千差万别的。在这一章中，我们是按照地域来讨论的，首先考查一下居住在战斗区内的居民的情况，然后是会受到攻击但并不是战斗直接发生的地域内的非战斗人员，最后是那些远离战场的人。一些地方在某个时间属于其中某种情况，但在其他时间里又落入了另一种情形。而且这三种区域都有共通的地方。但这种将地域划分为三种的视角，极大揭示了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们的强烈感受。第五章探讨的是1782年到1783年间，英美两个国家之间，以及英国和它的欧洲大陆敌人之间的和平谈判，并且还概要性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虽然在美国失败了，但却在约克镇失利之后依然保住了整个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最后一章则探究了这场战争给不同的参战国家留下的遗产。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场冲突的后果，在一些地方出人意料的轻微，但在其他地方则非常显著。

此系列图书的编辑对他们这套丛书是这样定位的：为读者提供“有新锐观点的通识读本”。我把他们的“指示”铭记在心，写了一本反映我个人观点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当然，我确也受到了其他人著作的影响，并将他们的洞见整合进了我的论述当中，但我无意采用骑墙中立的态度统合现有的学术成果。为此，我尽力避免添加过多的有关他人史学著作的注释，免得给读者造成负担。大部分情况下，注释只在涉及直

接引用或者数字统计的时候使用。这个规则的一个重大例外是，当涉及不是我本人提出的特别新颖的观点的时候，或者对于我这里仅是简明扼要地提及的东西，而其他作者的作品有更为详细的专门论述的时候，我会进行注释。考虑到那些希望进行更深入探究的读者，或者希望将我的作品和其他作品作比较的读者（我大力劝大家这么做）的需求，本书后面还附上了一个重要书籍和文章的列表。我还列了一个概要性的大事年表，以便帮助读者快速地了解不同场景下这场战争的进展。我也列出了主要人物表，目的是向读者介绍本书中出场的各个主要人物。本书亦加入了一些插图，这些插图并不是过去的客观景象，我只是认为它们可以给读者诸君带来一个印象——与这场冲突处在同一时代，或者说基本上同一时代的人，是选择如何去描述这场战争的。

### 【注释】

1 Robert J. Alli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2011).

2 Stephen Conway,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1775–1783* (London, 1995) and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2000).

3 See, for example, Eliga Gould, ‘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Britain’s Counter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no. 154 (1997), pp. 107–41; Hannah Smith, ‘The Idea of a Protestant Monarchy in Britain, 1714–1760’, *Past & Present*, no. 185 (2004), pp. 91–118; Jeremy Black, *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 Britain, Hanover, and Interventionism, 1714–1793* (London,



2005); Andrew C. Thompson, *Britain, Hanover, and the Protestant Interest, 1688–1756* (Woodbridge, 2006); Nick Harding, *Hanover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700–1837* (Woodbridge, 2007); Brendan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1714–1783* (London, 2007); Brendan Simms and Torsten Riotte (eds), *The Hanoverian Dimension in British History, 1714–1837* (Cambridge, 2007); Tony Claydon,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England, 1660–1760* (Cambridge, 2007); Marie Peters, ‘Early Hanoverian Consciousness: Empire or Europ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ii (2007), pp. 632–68. My own contribution to this Europeanization of British history appeared as *Britain, Ireland, and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imilarities, Connections, Identities* (Oxford, 2011).

4 For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spatial turn’, see, for example, Barney Warf and Santa Arias (eds),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2008).

5 The Contractor State Group, as it is now known, has published four volumes of essays so far: H.V. Bowen and A. González Enciso (eds) *Mobilising Resources for War: Britain and Spain at Work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amplona, 2006); Rafael Torres Sánchez (ed.), *War, State, and Development: Fiscal-Military Stat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mplona, 2007); Rafael Torres Sánchez and Stephen Conway (eds), *The Spending of States: Military Expenditure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atterns, Organization, and Consequences, 1650–*

1815(Saarbrücken, 2011); and Richard Harding and Sergio Solbes Ferri (eds), *The Contractor St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1659–1815*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2012).

6 For American studies that concentrate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e American aspects of the war, see, for example, Willard M. Wallace, *Appeal to Arms: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51); Christopher Ward, *The War of the Revolution*, ed. John R. Alden (2 vols, New York, 1952); Howard Peckham,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 Military History* (Chicago, 1958); John R. Alde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69); Don Higginbotham,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Military Attitudes, Policies, and Practice, 1763–1789* (New York, 1971); Marshall Smelser, *The Winning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3); Robert Middlekauff, *The Glorious Caus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9* (New York, 1982); Harry M. War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ationhood Achieved, 1763–1788* (New York, 1995); John Ferling, *Almost A Miracle: The American Victory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2007).

7 See, for example, Eric Rob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1763–1783* (London, 1955); Christopher Hibbert, *Redcoats and Rebels: The War for America, 1770–1781* (London, 1990); Jeremy Black, *War for America; The Fight for Independence, 1775–1783* (Stroud, 1991); Richard Middleton,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1775–1783* (London, 2012).

8 Principally Piers Mackesy, *The War for America, 1775–1783* (London, 1964). See also N.A.M. Rodger, *The Insatiable Earl: A Life of John Montagu, 4th Earl of Sandwich* (London, 1993), Chapters 13–15; P.J. Marshall,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mpires: Britain, India, and America, c.1750–1783* (Oxford, 2005), Chapter 11; and Donald Stoker, Kenneth J. Hagen and Michael T. McMaster (eds),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Approach* (London, 2010).

9 Mackesy's *War for America* essentially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ritish ministers who were conducting the war; he is particularly positive about the role of Lord George Germain, who is presented rather more unflatteringly in other studies.

10 William Duane (ed.),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Christopher Marshall* (Albany, NY, 1877), p. 277.

11 See Stephen Conway, 'From Fellow-Nationals to Foreigners: 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Americans, circa 1739–1783',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ix (2002), pp. 65–100.

12 See, for example, James E. Bradley, 'The British Public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deology, Interest, and Opinion', in H.T. Dickinson (ed.),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98), pp. 124–154; Eliga H. Gould, *The Persistence of Empire: Britis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2000), Chapter 5.

13 Charles F.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10 vols,

Boston, 1850–1856), x. pp. 63, 87.

14 For the estimate of one fifth, see Paul H. Smith, ‘The American Loyalists: Notes on their Organization and Numerical Strength’,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xv (1968), pp. 259–277.

15 See Wayne E. Lee, *Barbarians and Brothers: Anglo-American Warfare, 1500–1865* (Oxford, 2011).

16 For more on this aspect of the struggle, a new book by Holger Hock,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ovisionally entitled *The Scars of Independence*, is eagerly awaited.

# 第一章 通往莱克星顿的漫漫长路

我们需要回溯多久的历史，才能解释为什么1775年4月19日马萨诸塞的民兵会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与英国士兵发生交火？大部分有关美国独立战争起因的描述，都合理地把视角锁定在冲突爆发前的最近几年。1773年12月在波士顿发生的毁坏一大批英国议会可以征税的茶叶的事件，导致英国议会作出了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1774年的《马萨诸塞政府法案》。由于修改了马萨诸塞的殖民地宪章，降低了公众的参与度，该法案成了起义的导火索。人们通常都将这一系列事件与18世纪60年代英国议会第一次试图对殖民地征税联系在一起，而英国议会的这种企图，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宪政危机的开始，这种危机最终导致了战争和美国独立。<sup>1</sup>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把目光投向这之前更早的时候，我们对这场革命的理解就能向上提升一个层次。

许多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到18世纪前几十年的长期发展上。许多研究者强调，随着最肥沃的殖民土地逐渐被瓜分完毕，经济活动更为商业化，早期殖民地的社会流动性与丰富机遇，逐步退化成了一个更为僵化的阶层秩序。他们还提到了城市中心的紧张态势，尤其是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这几个北部港口。根据这种理论，社会阶层中不断郁积的不满情绪导致美国人起来反抗社会等级制度和政治等级制度，并在这个过程中推翻了英国的统治。<sup>2</sup> 其他一些研究者则聚焦在大量非英格兰移民，尤其是爱尔兰新教徒和苏格兰高地人，还有许多德国人，在18世纪抵达

北美殖民地这个现象。到革命爆发前夜，大约十分之一的白人移民是德国人；在宾夕法尼亚，德国人则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些新移民，包括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宗教多元化，而这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开始造就了一个独特的美利坚民族，从而更有可能反抗外来权威。<sup>3</sup> 还有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间歇性地在殖民地爆发的福音派的宗教狂热，与革命年代所特有的对既有秩序的蔑视及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sup>4</sup>

殖民地社会的变化无疑在导致独立战争的诱因中占有一席之地，也肯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事态会朝着后来的方向发展。但是，殖民地拒绝英国统治权威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相反，恰恰是因为它们因循过去的老路，尤其是继续固守17世纪英国的政治文化。18世纪的殖民地人民，体认的依旧是殖民地刚刚建立时代的政治正统，他们认为，所谓的英国风格，就是高度社会自治。他们乐于承认自己对英国国王的效忠——“我们共同的首脑和父王”，马萨诸塞议会在1768年就是这样称呼乔治三世的，尽管当时他们正试图削弱英王委派的总督们的权利。<sup>5</sup> 他们从不承认威斯敏斯特议会有通过法案来约束他们的权利。出于实际需要，殖民地勉强同意议会的一些法案，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法案是互惠互利的。然而，尽管偶尔对议会虚与委蛇，他们也绝不会承认议会对自己享有主权。如果议会没有试图将其意志强加在殖民地人头上，尤其是如果没有试图在美国征税的话，危机当然能得以避免，但殖民地对它们拥有自治权这一点的静态认知，一再被闲不住的宗主国统治者挑衅，后者的目的就是要更多的中央集权。在七年战争后，出于新的帝国主义需要，英国要显著加强对美国的干预，而这便导

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实实在在地讲，美国革命就是——或者说至少开始是——为了维护现状而抵制英国的革新行动。<sup>6</sup>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到英国在北美殖民的早年时期去看一看。



美国人对自治的执迷，根植于殖民时代的早期经历。英国的普通法被第一批殖民者引入美国，每一个新殖民地不久就都有一个选举出来的议会，来代表和保护殖民者的利益。这个地方议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威斯敏斯特下议院的地方翻版。理论上来说，公众参与自治，应该有一个很强的行政首脑来制衡，这个首脑就是总督，总督则应由一个顾问委员会来支持。但在殖民的早期那些年，殖民地是由私人公司开拓而不是由王室开拓的，总督和市政委员会都是选举出来的，这就强化了殖民地人民希望自己掌控自己命运的倾向。因此，在英属美洲刚形成的时候，本地自治的制度框架就已经确立了。而且，最初殖民地很少受到伦敦的干预。除了发布一些宪章从而给殖民地以法律地位之外，英王将早期定居的事情交给了私人投资者团体去打理。

只是在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而且开始变得有利可图的时候，英王才开始对殖民地关注起来。1621年，詹姆斯一世要求弗吉尼亚烟草应出口到英格兰，这样可以提高英国的关税收入。三年之后，他将弗吉尼亚变更为一个皇家殖民地，总督由国王任命并向国王和他在英格兰的大臣们负责。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曾希望在他所有的领地上看到“一个统一的政府模式”，<sup>7</sup> 在17世纪30年代，他还曾试图限制清教新英格兰殖民地[注6](#)的自治权。为了限制马萨诸塞的扩张，查理一世建立一个新的皇家殖

民地——缅因，并任命费迪南德·戈吉斯爵士（Sir Ferdinando Gorges）为其第一任总督，而这位总督大人可是一位坚决反对清教徒的主教派教徒<sup>注7</sup>。查理一世甚至计划将整个新英格兰交给戈吉斯管理，只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危机——英格兰内战的到来——才导致他无法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sup>8</sup>

英格兰内战以及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短命的共和国，降低了伦敦在殖民地事务中的影响力。这一点毫不足奇，国内事务占据了当时那些英格兰大臣们的主要精力。然而，控制大西洋对岸的殖民地的欲望却从来没有消失。1651年，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了一项《航海法令》

（Navigation Ordinance），该法令的目的是将荷兰排除在与英属美洲之间的贸易之外。1660年斯图亚特家族复辟之后集权的冲动变得尤为强烈。查理二世和他的弟弟即继承人詹姆斯二世对殖民地自治发起了17世纪中最为系统的攻击。更多的新省份被确立为皇家殖民地，或者作为国王亲属或廷臣的专属领地，这些地方的总督都是由国王任命的，对国王和他在英格兰的大臣们负责。殖民地人民对威斯敏斯特议会借1660年、1663年和1673年《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对殖民地管理的抵制，导致马萨诸塞原来的宪章在1684年被撤销了，也导致英国政府开始着手重塑殖民地政府。自1685年开始，詹姆斯二世将所有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最后还有纽约和新泽西，都划入了一个大范围的“新英格兰自治领”（Dominion of New England）。这个自治领由王室委派的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管理，而且当地议会也不是经选举产生。<sup>9</sup>这个自治领不久就崩溃了，但这也是在詹姆斯二世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从英格兰被驱逐了之后才发生的。斯图亚特家族败落之



后，伦敦的新政府恢复了殖民地议会，但与此同时继续对殖民地进行更多的中央控制。1696年设立了贸易部来收集殖民地的信息，监督它们的发展并向大臣们提出政策建议。同年通过的另一个《航海条例》，强化了英国政府对殖民地海外贸易的监管。

在18 世纪上半叶，这种干预要少一些。没错，1702~1713年和1739~1748年的两场战争，促使英国政府重视殖民地及其在贸易上的价值，进而重新开始对殖民地施加更大的控制。不过，在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主导英国政治生活的18 世纪20 至30年代这个长时期的和平年代，殖民地很少受到干预。这不是由于疏忽或者不重视；相反，对殖民地进行有限的干预，看起来是一个刻意为之的政策。沃波尔认识到殖民地对国家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因此，尽量避免与殖民地发生任何可能有损于这种有益关系的争议。当殖民地总督发现自己与殖民地议会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沃波尔和国务大臣纽卡斯尔公爵鼓励总督们与议会和解，而不是对抗，哪怕这样做意味着对议会要求作出大幅让步。<sup>10</sup> 沃波尔时代也有一些立法干预，特别是在为了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但他很少认真施行那种限制性的法规。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殖民地享有很程度的自治。精力充沛而又意志坚定的贸易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Earl of Halifax），曾经试图在18 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将沃波尔时代扔给殖民地议会的东西给找回来。然而，他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或许，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英国和殖民地之间建立了定期邮轮服务，这使得美国总督们可以更方便地和伦敦的大臣们进行交流。<sup>11</sup>



18 世纪50年代中期与法国的新冲突，将英国和殖民地拉的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近一些，然而这场冲突最终还是让它们相互疏远了。一开始，英国政府打算按照既往的做法让各个殖民地提供当地招募的兵力，来抵御法国对俄亥俄谷的入侵。但殖民地的响应情况令人失望。1754年，在旨在协调各个殖民地军事行动的奥尔巴尼会议（Albany Congress）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各个殖民地议会都拒绝了这个协议，因为它们认为这是一种僭越它们权力的企图。<sup>12</sup> 奥尔巴尼计划的失败，俄亥俄谷早期战斗中殖民地军队的糟糕表现，加上一些殖民地议会无视国王要求他们投票支持为招募地方士兵而批准的预算，这些因素最终促使英国政府派自己的军队横渡大西洋而来。一开始这些军队和殖民地军队一样表现不佳，但大臣们对英军初期失利的第一反应是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到北美，目的就是将法国的威胁从加拿大永久地驱逐出去。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美国人接触到英军士兵的情况。

那些认为七年战争的经历是美国独立革命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美国人对英国正规军所作所为的反感。<sup>13</sup> 本土招募的士兵的信件和日记都显示，在两支武装力量之间有一个文化的鸿沟，美国士兵认为这些穿着红军衣的士兵傲慢、专横，对于殖民地那种更为平等的契约模式的从军文化一无所知。<sup>14</sup> 然而美国人的这种不满，基本上都仅限于从非常不成功的第一阶段到1775年年末的这一段时期。从1758年初开始，美国人有很好的理由对这种冲突形成积极的印象。这部分是因为劳登勋爵（Lord Loudoun）被召回国了，他当时担任英军总司令，他对殖民地士兵的刺耳批评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因为威廉·皮特作出了其他一些让步，威廉·皮特当时是负责这场战争的英国国务大臣。他提升了殖民地本地军官的地位，不再要求这些军官听命

于最低级的英军的海军少尉或陆军中尉。同时，他还给予地方议会大量的议会补贴，为的是弥补殖民地因在更大范围内动员本土力量而产生的成本。<sup>15</sup>

殖民地人民对皮特的新做法的热情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各个议会承诺总共派2.3万名本土士兵参加1758年的战役。<sup>16</sup> 由于大量殖民地士兵的加入，同样又有大量的英国正规军，法国军队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那一年，英国和美洲殖民地军队在卡里伦堡（Fort Carillon）遭遇了一次重大逆转，在那里，法军司令官蒙特卡姆侯爵（Marquis de Montcalm）开展了一场精巧的防御战。不过，布雷顿角（Cape Breton）的路易斯堡（Louisbourg）和安大略湖边的弗朗特纳克堡（Fort Frontenac）相继陷落，这让法属加拿大的腹地陷入了被英军东西夹击的境地。1759年，圣劳伦斯河谷的魁北克接着陷落。1760年，新法兰西[注8](#)的首府蒙特利尔也陷落了。美国人在战争开始阶段的不满，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胜利的喜悦。当北美的战争结束的时候，殖民地人看起来并没有因为和英军士兵并肩作战的经历而疏远英军；相反，他们因为自己的英国子民身份而热烈地庆祝着。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们宣布，位列“国王陛下最忠实的美国子民”之列，位列“大不列颠这个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强大国家的幸福的自由子民”之列，“是一种无上的荣耀”。<sup>17</sup>

如果我们要证明七年战争的经历，在美国革命到来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那么，我们就不能只将眼光局限在美国人对英国士兵的不满情绪上。或许，更重要的是，那一套用来鼓动新英格兰人入伍的反天主教的说辞，给新英格兰人带来了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并不需要太多的鼓动。这片地方的独特环境条件——土地贫瘠，植物的生长季节短，导致

这里的农作物产量低，农民总是费尽力气才能多种出一些可供售卖的农产品。由于农业生产无利可图，再加上都是大家庭，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年轻小伙子，但却没有什么财产可供继承，这就意味着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士兵供应量。<sup>18</sup> 但为了鼓动他们主动加入当地军队并让社区支持他们参军，教会人员和政治领袖们将在加拿大与法国的战争描绘成一场反抗“教皇制度”的新圣战。“教皇制度”这个词所指向的可不仅仅是天主教本身，而且还隐含了各种形式的专断和集权统治。传统上就对教皇制度抱有敌意的新英格兰人在战争中强化了这种敌意，对于战后出现的任何看起来有法国那种威权政府统治味道的东西很可能格外敏感。他们似乎坚信，议会征税是英国政府已经拥抱“教皇制度”的一个信号。<sup>19</sup>

然而，英国人对七年战争经历的反应，至少也同美国人的反应一样重要。殖民地人民在战争初期的那种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军官确实看起来对殖民地军队的贡献不屑一顾。1758年之后他们继续如此，只不过在第二阶段他们更好地掩饰了自己的这种轻蔑，但这种轻蔑情绪总是不断出现在他们的家书和私人日记之中。最常见的一个抱怨是，美国人冲向战场的速度像蜗牛一样慢。<sup>20</sup> 更糟糕的是，战争头几年那种传统的征召制度的失败（这种制度下，国王要求每个殖民地招募一定数量的军队，总督将这个要求提交给地方议会，地方议会再来决定是否派兵），让英国人在内心一直怀疑这种制度是否适合用来保家卫国。在战后有关美国的议会辩论中，威斯敏斯特的政客们特别提到各个殖民地对王室要求出兵号召的反应是参差不齐的。即使是纽约州议会也承认这个制度没有起到公平合理的效果。<sup>21</sup> 这场战争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一点伦敦的大臣们在战争期间就知道，只是在已经赢了战争之后觉得安全

了，才向广大的英国公众公开），那就是，美国殖民地和敌人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英国报纸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殖民地人不但没有和英国军队卓有成效地合作，反而帮助新法兰西坚持了本来无法坚持的更久的时间。<sup>22</sup> 除了极少数例外，英国的评论家们都将这场战争看作是英国的胜利：尽管有美国人掣肘而不是帮忙，英国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英国人的这种想法，即殖民地人应该对他们感恩的想法，在战后有关如何来管理一个变得大得多了的大英帝国的辩论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虽然如此，但实际上，这场冲突的结果，而不是这场冲突给英美关系带来的损害，是将七年战争看作是美国革命到来的重要起因之一的一个主要理由。英国政府保住加拿大的决定很可能就是错误的。事后来看，这个决定很可能减轻了美国人对英国的依赖，因为殖民地和英国有一个共同敌人，并且这个敌人原来就在美国人的家门口，而现在已被赶跑了。<sup>23</sup> 但未来两边关系紧张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大英帝国的体量变大了。它的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750年，北美殖民地是英国海外属地中人口最多的地方。到了1763年，英王在北美的土地扩大了，包括了法属加拿大、西属佛罗里达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广大的内陆地区。这些新增的大片土地，意味着非英国背景的许多人现在开始受英国管辖了。两年之后，在印度，比这里还要多得多的外国人被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当时，莫卧儿王朝的国王，将在孟加拉、比哈尔（Bihar）和奥里萨（Orissa）执行司法和征税的权利授予了东印度公司。这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英国政治家们在面对他们的新帝国并考虑自己的新责任的时候，可能下意识地降低了殖民地人的重要性。那些曾与大西洋对岸英国本土人享受同样的特殊地位的美国人，

现在却被置于法裔加拿大人、美国原住民，甚至是孟加拉人之列，不过是另一群受英国统治的人而已。<sup>24</sup>

伦敦那些大臣们的集权倾向由于他们的这种看法而被进一步强化了：在面对法国和西班牙旨在重新夺回失去权力和地位的挑衅之时，新帝国是脆弱的。尽管英国公众被不断灌输国王的军队和海军在战争中是多么多么成功，但将新大英帝国和旧大英帝国相比较，对于那些接受传统教育的政客和大臣们来说，是不那么让人舒心的。任何了解古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罗马帝国就是因为过度扩张而垮台的。<sup>25</sup> 那些负责新帝国事务的人担心，除非整个帝国可以比以前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不然那些在英国本土之外的省份将会成为法国和西班牙复仇行动下的牺牲品。沃波尔时代那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了，英国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正如南卡罗来纳在伦敦的代表于1764年1月所汇报的，贸易部计划“在整个北美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 and 政策体系”。<sup>26</sup>

英国军队要比过去承担更大的保卫帝国的责任。<sup>27</sup> 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及的，议员们很清楚老的征召体系在动员殖民地力量上面是失败的，或者至少说这个制度在战争第一阶段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但大臣们作出的和平时期在北美驻扎一支英国军队的决定——实际上这个决定在七年战争结束之前就作出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卫新占领的、可能会反叛的加拿大的需要。那些对于国王发出的派兵参战的征召作出了参差不齐的反应的殖民地议会，是不大可能会同意在圣劳伦斯河谷派驻一支和平时期的占领军的。只剩下让英国的常规军来完成这个任务了。大臣们同时设想这支军队还可以同时充当边境警察的作用，阻止定居者侵占原住民的土地。但他们希望在北美派驻一支较大的军事力量的主要原

因，很可能是为了在一般意义上保卫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和驻扎在爱尔兰的军队很像，一旦和波旁王朝再起战事，这支北美驻军可以迅速地被部署到海外其他地方。<sup>28</sup>将这支部队派到加勒比地区，甚至是中美洲，比从欧洲派一支军队要快多了。而且，和爱尔兰驻军一样，它的军费也不是由英国本土人民承担的（英国本土人民已经对继续保持战时的征税水平怨声载道了），而是由它名义上要保护的那里的人承担的。英国议会在殖民地管理上发挥更大、更有力的作用的阶段已经到来了。因为如果美国人要为这支军队承担军费的话，那么，进行征税以便支撑这支军队军费开支的唯一合宪的机构，就是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

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国和美国两边的预期出现了危险的偏离。那个时候，英国政治精英阶层倾向于认为伦敦应对殖民地进行更强的控制，而美国人则对与英国合作的美好前景充满期望。殖民地人民热情洋溢地庆祝着他们的英国子民身份，并期待着延续这种成功的战时合作关系。他们的希望和预期是，英国政府会承认他们在战争取胜中扮演的关键作用，并将他们看作是完全同等的英国人。但不久他们就从这种梦中彻底醒了过来。



七年战争之后的几年中，英国对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1763年10月的《皇家宣言》（Royal Prdamation）试图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外的内陆地区保留给原住民，并鼓励新教教徒在新吞并的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建立定居点。同一年，枢密院命令更为严格地执行《航海条例》。1764年的《货币法案》（Currency Act）则召回许多殖民地为了支付战争费用而发行的纸币，目的是为了防止英国商人收到贬值了的货币。

1765年《北美陆海军违纪惩治条例》（American Mutiny Act）则对新驻军的军纪作了规定，同时要求殖民地议会，对军队行进过程中为了给军队提供住宿而被征用的房屋的所有者进行补偿。议会通过战后两个最具争议的立法，希望殖民地对北美军队的费用作出更大的财政贡献。首先，1764年的《岁入法案》（Revenue Act）降低了外国糖蜜进入殖民地的惩罚性关税，并将之调整为一种增加收入的税种。其次，更为著名的，也更为臭名昭著的是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Stamp Act），该法案规定对所有法律文书和新闻报纸都征收印花税。

时任英国首相、被认为和这些法案有关的政治家乔治·格伦威尔，实际上几乎都不是这些法案的始作俑者。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以“格伦威尔计划”为写作题材的历史学家，夸大了他的作用。<sup>29</sup> 他并没有参与《皇家宣言》、枢密院有关改革关税的命令或《北美陆海军违纪惩治条例》，而《货币法案》是受到了商人的压力才出台的，政府并不想主动出台这个法案。不过，格伦威尔是征税背后的主要力量。1764年3月他向下议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后来被制定成了《岁入法案》。同时，他也表示他计划在第二年引入印花税。格伦威尔认为，《印花税法案》是对殖民地进行征税的最公平和最容易的方式。尽管他显得愿意就这个事情听取不同意见，但是，实际上他准备做的不过就是根据各地情况调整印花税税率和范围而已。<sup>30</sup>

一开始，格伦威尔是在财务角度来为自己的美国征税行为提供支撑依据的。英国纳税人压力很重，殖民地人对他们应该感激：“我们在美国已经投入巨大，”他告诉议员们，“让我们收获这种投入所带来的果实吧。”<sup>31</sup> 格伦威尔的财政大臣托马斯·沃特利（Thomas Whately）在1764



年11月与一位北美人士通信的时候，说法稍有不同，但大意是一样的：“国家深受负债和开支困扰，必须采取措施立即增加收入，殖民地必须承担它们应承担的份额。”<sup>32</sup> 只是在美国人拒绝承认英国议会有权对他们征税之后，格伦威尔和他的支持者才从宪政角度来论证这些新税种的合法性。他与绝大部分议员对于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毫不怀疑。自从光荣革命以来，威斯敏斯特议会每年都开会，它的权力也稳步地与日俱增。1707年，它实际上吸收了苏格兰议会，从而摇身一变成为大英帝国议会。1720年，虽然爱尔兰有议会，但威斯敏斯特议会依旧宣称有权对爱尔兰立法。威斯敏斯特议会的主权，在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英国法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得到了大力支持，而布莱克斯通是那个年代的最著名法学家之一。《英国法评论》的第一卷是在1765年出版的。实际上，布莱克斯通在那本著作中表达的不过是一些公认的观点而已。18世纪中叶，英国政治精英阶层的广泛共识是，威斯敏斯特议会和国王共享主权，所有国王的领地都受议会管辖。正如1765年3月康涅狄格议会派驻伦敦的代表在听了下议院有关印花税的辩论后所汇报的，几乎没有议员愿意否认“议会有权对我们征税”。<sup>33</sup>

殖民地对印花税的抗议在《印花税法案》通过之前就开始了。这种抗议，可能由于《货币法案》所加剧的那种战后经济衰退而变得更加强烈了。但美国人对印花税的反对主要是建立在宪政层面的。殖民地人认为，议会没有对他们征税的合法权利，因为他们在议会中并没有议员；而殖民地自己的议会——这些议会是代表他们的——是可以在美国征税的唯一立法机构。他们引述了他们各自的皇家特许状来支持自己的

观点，但更多的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他们的财产未经他们同意不应被剥夺这种天赋的自然权利上以及古老的英国宪法上，这包括里程碑式的1215年《大宪章》（Magna Charta）——用宾夕法尼亚议会1765年的话说，“它是英国自由的伟大宪章和源泉”——以及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他们认为这个法案保护国王的子民不被任意征税。<sup>34</sup>为了证明他们随时准备为帝国的防卫效力，这同时隐含着在北美保持一支常规军是没有必要的，几个殖民地议会还自豪地提到了北美在最近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他们很心甘情愿地响应了国王招募军队的征召，而招募军队的决定只能是由他们这种当地的民选议会作出的。<sup>35</sup>

作为一名优秀的辉格党人，格伦威尔并不否认征税权和议会代表权之间的关联。他的回应是，殖民地已经在威斯敏斯特得到了“代表”，这种“代表”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而是虚拟意义上的，因为国家议会的议员们，已经将殖民地人的利益考虑在内了。沃特利还将“虚拟代表”这个理论写成了一个小宣传册子。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和索姆·詹宁斯（Soame Jenyns）也作了类似的论述。<sup>36</sup>但这种主张未能说服美国人。美国人反驳说，“虚拟代表”这种东西在大不列颠内部，甚至说在殖民地内部，可能都是可以的，但这种东西无法跨越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这么大的地理距离。对于美国人来说，二者之间的长达3000英里的海上距离以及跨大西洋的交通是如此缓慢，使得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们在殖民地人民可以承受多高的税负这一点上，无法作出好的判断。只有他们自己的本地议会议员们，这些人是他们选举的，也知道本地的具体情况，可以对他们进行征税。<sup>37</sup>

如果这种分歧只是体现在不同观点之间的彬彬有礼的交锋上，那

么，《印花税法》可能可以存活下来。但美国人的抗议远不限于此，还体现在多种形式上。除了地方议会作出决议、学者发表的小册子（这种小册子经常引经据典为自己添光）以及在报纸上发表的论文之外，大部分的殖民地议会甚至同意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来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对于英国政客们来说，他们本来就对在刚过去的这场战争中几乎无法说服不同的殖民地同心协力地出力感到绝望，这种“印花税会议”看起来一定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英国面临的财政威胁，实现了法国的军事威胁在当时令人遗憾地无法实现的东西。许多北美城镇中发生的切切实实的暴动，或许就更令人担忧了。波士顿在1765年发生了第二起暴乱，这起暴乱尤其令人忧虑，因为它不仅仅是在抗议《印花税法》，而且还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挑战了英国的主权。暴乱分子攻击了关税官员的住所，并毁坏了马萨诸塞副总督的房子。一些评论家也注意到了这个暴乱的社会因素。总督带着不祥预感写道：“这是一场掠夺之战，一场推倒一切之战，一场彻底抹去贫富分野之战。”<sup>38</sup> 起初那种对英国议会试图改变殖民地现状举动的谨慎挑战，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对既有秩序的攻击，因为美国社会的底层人民不仅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英国对殖民地的干预之上，而且也发泄在殖民地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分配之上。

最终导致《印花税法》被撤销的，并不是美国人提出的各种论辩，甚至也不是殖民地城镇中秩序的崩溃，而是美国商人抵制英国货物的决心。撤销该法案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格伦威尔在1765年夏天被国王解职了。这与美国人的抵制其实没有关系。由没有经验的罗金汉侯爵主导的新内阁，在印花税问题上不像格伦威尔那样立场坚定。通过聚焦在殖民地之间不进口英国商品的协议给英国经济带来的损害，以及国内面

临的失业和社会稳定威胁（按年迈的纽卡斯尔公爵在试图说服坎特伯雷大主教支持新政府主张的时候所用的词语来说，就是“暴乱、暴民和起义”），<sup>39</sup> 新政府成功说服半信半疑的议会在1766年春天撤销了《印花税法》。美国人欢天喜地地庆祝着他们的胜利，但罗金汉侯爵内阁并没有在宪政层面作出任何退让。实际上，为了让这件痛苦的事情味道甜一些，议会通过了《北美宣示法案》（American Declaratory Act），该法案专门强调议会拥有“在任何情况下”为殖民地立法。而且，虽然格伦威尔提议的印花税没有了，但罗金汉侯爵内阁的财政大臣威廉·道兹韦尔（William Dowdeswell）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在北美筹集资金。他的1766年的《岁入法案》进一步降低了加勒比糖蜜进入北美大陆殖民地的关税水平，但是却将这个关税扩展到所有糖蜜之上，不论是来自英国的，还是来自外国的，都要征税。所有有关糖蜜关税是一种管理贸易手段的幌子都被抛开了：它就是一种税，简单而纯粹。而且，这种税所带来的税收被用在与当时印花税完全相同的目的上：为北美的英国军队提供经费。<sup>40</sup>

由于《印花税法》被撤销了，而且道兹韦尔的新税税率很低，美国人放松了警惕。1776年的《岁入法案》，实际上创造了比格伦威尔的印花税更高的税收收入，但美国人却没有对它提出什么异议。殖民地人对于英国引入的下一个税种的反应也很慢，这个税种是依循1766年的关税先例安排的。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已经接替了罗金汉侯爵。威廉·皮特在殖民地广受欢迎，这部分是因为他在七年战争中愿意照顾美国人的敏感神经，部分因为他最近强烈支持撤销《印花税法》。当时，他似乎说议会没有权利对殖民地征税。<sup>41</sup> 但是，如果美国人认为查塔姆伯爵

不会对他们征税，那就大错特错了。1767年，新内阁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获得了议会批准，对输入殖民地的纸张、铅、玻璃、颜料和茶叶征收关税。汤森德曾经就职贸易部，比任何其他英国政治家都更了解殖民地人。他的目的不是用这笔收入来支付北美驻军的军费，而是用来支付北美官员的薪资，特别是总督和法官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在经济上依赖殖民地议会了。换句话说，他的计划是改革殖民地政府，以便让他们更积极地执行伦敦的指示。在汤森德看来，强化行政权威，是进一步征税以便支付北美驻军军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sup>42</sup>

汤森德引入的关税，并没有引发针对《印花税法案》那样的大规模抗议风潮。或许，有关《印花税法案》的暴乱的记忆，让有产有业的殖民地人不愿意发动一场会把暴民鼓动起来的运动。美国精英阶层对当时似乎要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情景感到恐惧，不愿意再重新经历那样一种情况。发表反对汤森德关税的约翰·迪金森，一位宾夕法尼亚律师，强调要采用温和的、合法的手段来反抗。<sup>43</sup>或许，经济状况也使得大家进行暴力抵抗的热情降低了，在18世纪60年代后半段，战后的经济下滑已经过去，跨大西洋的贸易异常繁荣。那些在经济低谷期愿意抵制英国进口商品的商人，当 they 有大量未售出的库存而需求又很旺盛的时候，是不大愿意停止与英国贸易的。相对于那种会带来更大影响的印花税，美国人可能更加愿意接受对小范围内的、并非主要产品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他们甚至接受了宾夕法尼亚政治家和博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帮助罗金汉侯爵内阁撤销《印花税法案》的过程中所提出的这种观点：殖民地人民承认议会会有权对殖民地贸易征税。<sup>44</sup> 不论原因是什么，美国

人反对汤森德关税的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不冷不热的运动。特别说明问题的是，没有人像当年提议召开“印花税会议”那样，提议将所有殖民地统一组织起来。只有马萨诸塞州一直全力反对汤森德关税。1768年波士顿发生反关税的暴乱，英国政府派兵镇压。英军士兵的出现根本没有起到缓和紧张气氛的作用。波士顿人认为这些士兵是暴政的代表人，并且批评他们的罪恶倾向。或许更为重要的，波士顿海岸上的工人，感觉自己面临来自会去做兼职工作的士兵的竞争的威胁，因为这些士兵索要的薪水比一般通行的工资标准要低。1770年3月，在一场意外事件中，感到害怕的英军士兵对一群充满敌意的、威胁他们的人开枪射击了。而这个事件马上被反对英国军队的当地人称作是一场屠杀。<sup>45</sup>



图1-1 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的著名版画《国王街的血腥屠杀》，这幅版画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印象是不准确的——英军指挥官托马斯·普雷斯頓（Thomas Preston）上尉命令军队开枪射击。



巧合的是，英国军队在波士顿开枪的同一天，新任首相诺斯勋爵获得了议会有关撤销大部分汤森德关税的批准。有些人认为这是英国大臣们在对美国征税问题上的又一次退让，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诺斯继续推进着汤森德的计划，只是在更小的范围内而已。他保留了筹集资金最多的一个关税——茶叶关税。到了1772年，这个关税创造的收入已经多到可以用来支付公务员工资了，这正是当年汤森德所设想的。大部分殖民地人看起来对于茶叶关税没有什么意见，尽管他们中的有一些人也提醒，这种关税对于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议会的权力构成了威胁。这些年的相对平静——波士顿牧师萨缪尔·库伯（Samuel Cooper）在1771年1月曾说这是一个“政治停滞”时期<sup>46</sup>——被一个并不是在美国起源的危机打破了，而这场危机不久就要改变殖民地人对于唯一一个汤森德税关税以及这种关税所针对的对象茶叶的看法。

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一场严重的现金流问题。那一年，冲击欧洲金融中心的信贷危机使得这家公司在伦敦的仓库中堆积了大量无法售出的茶叶。这家公司的董事们请求政府帮忙。他们提出可以将茶叶在北美低价倾销，但由于又担心会被走私回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政府决定采取其他方法在北美低价销售东印度公司的茶叶。1773年的《茶叶法案》（Tea Act）将除了汤森德关税之外的所有针对英国出口到殖民地茶叶征收的关税都取消了。为了进一步降低美国消费者购买的茶叶的价格，这个法案规定只能通过指定的代理商销售茶叶，这样就消除了中间商的成本。现在很难去了解诺斯勋爵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了，但看起来他主要是担心东印度公司的未来。他让议会批准向东印度公司提供一笔巨额贷款，并试图通过《调整法案》（Regulating Act）来提高政府对这



家公司经营活动的控制。不过，诺斯肯定不会对一箭双雕的可能性视而不见。《茶叶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但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消费了英国茶叶，那么，汤森德关税所创造的收入也会增加。这样一来，以汤森德关税来支付殖民地当地官员薪水的计划就可以更快地全面铺开了。下议院在就后来成为《茶叶法案》的立法草案进行的一次辩论告诉我们，诺斯对这个立法可能带来的一箭双雕的效果可谓心知肚明。当道兹韦尔提出汤森德关税也可以取消以便提高在殖民地的茶叶销售时，诺斯回答说，他“不愿意放弃那个关税”。他继续解释说：“如果东印度公司将茶叶出口到北美，他们会大幅提高那个关税，从而可以大幅度地提高那里的政府管理水平。”<sup>47</sup>

诺斯关于大幅提高来自美国的收入的希望马上就破灭了。虽然《茶叶法案》降低了殖民地的茶叶价格，而且没有征收新的税种，但这给了那些对汤森德关税一直忧心忡忡的人一个将同胞们鼓动起来进行新的抵抗运动的机会。汤森德关税的目的，即降低殖民地议会的权力、提高总督们的权力，被重新提起来。而这一次，美国人听进去了。原因在于，就像之前的《印花税法案》一样，《茶叶法案》制造了一大批强有力的失意者：那些原来做茶叶贸易但未被选作指定代理商的商人，以及那些从倒卖走私的荷兰茶叶中赚取了巨额利润但现在在廉价英国茶叶的冲击下已经没有商业竞争优势的商人。原因更在于，茶叶这种产品很容易被与亚洲专制统治、奢靡和人们认为它可能带来的所有的恶联系在一起，这些恶包括：寄生、自私、软弱和缺乏保卫自己所在社区的担当。《茶叶法案》的敌人将它描绘为一项旨在奴役美国的“恶魔的计划”，并鼓动殖民地人民相信，抵制廉价茶叶的诱惑以便坚守他们的道德和维护他们

国家的自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sup>48</sup>反对茶叶登陆的运动非常广泛，但那个最受到纪念的事件，是1773年12月在波士顿发生的。大量的茶叶被波士顿人倒入了海中，这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印第安战士。他们之所以这么装扮，或许是为了强调殖民地人民拥有那种高贵的野蛮人所具有的白璧无瑕的品格。<sup>49</sup>

波士顿茶党将英国和殖民地引向了一条相互冲突的道路。或许本来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或许诺斯本应可以在1774年春天的议会会议中作出更有节制的反应。议会几乎全票支持了《波士顿港法案》，该法案禁止波士顿进行海外贸易，直至波士顿就被毁损茶叶向东印度公司作出了全额补偿为止。一些殖民地人也认为这种补偿是合理的。诺斯不大可能采取更缓和的措施。除非他可以成功地对波士顿的公开叛逆作出惩罚，否则，要通过汤森德关税征收到任何收入并用这笔收入来支付公务员薪资的可能性将会是非常低的。但他并没有就此打住。总体上来说，马萨诸塞，特别是波士顿，长久以来一直是英国政府身上的一根刺。正如诺斯在1774年3月对议会所说的，“波士顿在七年以来一直是暴动和骚乱的先锋”。<sup>50</sup>现在是对顽固的麻烦制造者杀一儆百的好时机，这样可以促使其他殖民地采取更为顺从的做法。他甚至还可能认为，新英格兰之外的其他殖民地可能对马萨诸塞不会有什么同情，因为新英格兰的民主传统同社会与政治制度更为等级森严的南方有很大的不同。<sup>51</sup>《马萨诸塞政府法案》修改了这个殖民地的宪章，以便强化总督的权力，并削弱公众的参与。一个更具威权的政府需要一支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支撑。不仅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更多的军队要被派往波士顿，而且，新政府的总督将变更为托马斯·盖奇将军，他是北美驻军的总司令。为了方便在波

士顿驻军，议会还通过了另外两项立法，即《司法管理法案》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和《驻军法案》（Quartering Act），这清楚地表明诺斯内阁随时准备动用武力。

如果说诺斯希望的是将整个英国团结在他的惩罚性政策之下，同时将好斗的马萨诸塞与其他更为温和的殖民地区分化开来的话，结果却与他的这种希望完全相背。英国在北美问题上的广泛共识——自从1763年以来的所有大臣都支持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并都曾试图行使这种权利——在诺斯试图修改马萨诸塞殖民地宪章的时候突然瓦解了。罗金汉侯爵，最大的反对党的领袖，担心诺斯走上威权主义道路，因为这可能会摧毁大英帝国。《马萨诸塞政府法案》之后紧接着1774年出台的《魁北克法案》加剧了反对党的这种担忧。魁北克当地的立法机关与那些老英国殖民地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立法机关是一种长期努力的结果：为不适应英国政治传统的天主教人群找到一个适当的政府治理体系。<sup>52</sup>这个法案确立了一个没有代议制议会的政府体系，并给了天主教准官方地位。这让诺斯在议会内外的敌人都感到震惊。按照一位不赞同这项立法的大臣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的说法，“通过我们的大臣们竭力想在新英格兰建立的政府，以及他们已经在……加拿大建立的政府，可以看出，他们到底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府”。<sup>53</sup>

美国人的担忧更加剧烈了。《马萨诸塞政府法案》根本没有孤立新英格兰殖民地，相反，它让美国团结起来了。其他殖民地为这个法案所确立的先例感到担忧，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允许诺斯改造马萨诸塞政府，那么，怎么可能阻止他对其他殖民地也这么做呢？他们认为《魁北克法案》是诺斯恶意的一个进一步的证据。尽管这个法案纯粹是

为了加拿大而制定的，但那些老英国殖民地认为，这个法案是对代议制度进行更大范围攻击的一种样本。宾夕法尼亚副总督在1774年9月写道，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坚信，“有一项旨在奴役美国的处心积虑的计划，而《魁北克法案》就是这种意图的无可辩驳的证据”。<sup>54</sup>《印花税法案》危机之后，各个殖民地第一次团结在一起，把他们的反对立场协调起来。1774年秋天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制定了一份有关殖民地所遭受的冤屈的全面宣言。这份文件还有一次强调了美国人的这种主张：他们应该和英国人一样拥有同等的权利和特权。它还呼吁撤销这项令人恶心的议会立法。更重要的是，大陆会议批准成立了“大陆联合会”（Continental Association），以及有关暂停与英国进行贸易的协议。这个联合会文件的条文很清楚，它的目的不仅仅是迫使议会退让，而且也要防止美国人民遭受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腐败的损害。<sup>55</sup>正如波士顿茶党一样，对议会征税的反对及对文化压迫的担忧，二者结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可怕的组合。将这个文件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同样令人瞩目。全部殖民地的每一个社区都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确保大家都遵守贸易抵制的规定。这些委员会不久就在美国革命基础架构的建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基础架构向殖民地人民提供了除王室权威之外的另外一个权威。这个架构保证了这场革命并不仅仅是局限在殖民地保守派精英阶层内的一种运动，而且也是一种带有民主色彩的、普通民众的起义运动。<sup>56</sup>

同时，在马萨诸塞，诺斯试图削弱民众参与、强化行政权力的努力，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总督所委派的顾问们由于感到害怕不得不辞职：法院也无法正常运转。在有英国驻军的波士顿以外的地方王室政府

已经荡然无存了。地方议会和各个地方委员会在马萨诸塞的大部分地方行使权力。盖奇起初还有信心能够利用手头的军队把局面控制住，但为了让自己在波士顿之外能够说了算，他要求派更多的军队。在英军一方军力逐步增强的同时，马萨诸塞民兵力量也在集结并开始公开对抗。由于担心英军随时会进攻，他们开始训练并储备武器。1774年9月初，盖奇得出结论：“安抚、调解和理性，已经终结。除了使用武力，已别无他法。”<sup>57</sup>10月，地方议会投票决定成立一支由1.5万名民兵组成的警戒部队，以抵御波士顿的英军。

随着马萨诸塞陷入反叛状态，诺斯和议会反对派在最后一刻提出了安抚措施。诺斯的提议在1775年2月得到了议会的支持，但他提议的主要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阻止战争发生，而是要为与马萨诸塞甚至是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冲突作好铺垫。议会在征税权这个核心问题上没有任何退让，但不会在那些已经为支付永久公务员职位薪水提供了资金并承担了国防成本的殖民地行使征税权。诺斯一定知道，马萨诸塞不会就此退让，但他可能希望利用这个提议引诱像纽约这样的更温和一些的殖民地。毫无疑问，他还考虑了国内舆论。如果新英格兰人看起来不依不饶的话，那么，当在新英格兰发生战争的时候，政府看起来就站在更有利的立场上。

查塔姆伯爵那时在反对党的位置上，他在诺斯的计划得到批准之后的几天后在上议院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认识到，殖民地人民是不会接受议会对其征税的权力的，他愿意停止那些殖民地人认为无法接受的立法，但只有在殖民地人认可议会有权为殖民地立法的情况下，他才会废除那些法案。为了让这些立法变得更可接受，他提议将大陆会议确

立为一个永久的立法机构，与国王和议会共享主权。代表罗金汉侯爵所在政党的埃德蒙·伯克，则在3月末在议会提出了他们的和解方案。他的计划对美国人来说是最为慷慨的。就其核心意思而言，他指出，尽管议会征税的权力在理论上是不容置疑的，但由于殖民地的反对，议会实际上不可能对殖民地行使这种权力。因此，唯一实际可行的方式是，议会停止对殖民地征税，同时殖民地回到1764年的那种为帝国防卫和政府提供经费的模式——也就是旧的征召模式。这个模式在七年战争中的效果可谓参差不齐。一些殖民地议会同意了被征召的全部内容，一些则只投票支持了部分拨款，甚至不同意拨款。但对伯克而言，所有其他的选择都失败了，因此，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回到1763年的状态。通过简单的议会人数计算，就可以看出不论是查塔姆伯爵还是伯克的提议都没有任何机会成为官方政策，但我们不能仅凭这一点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提议是微不足道的；相反，他们的提议很可能让美国人更加愿意以显示武力的方式进行对抗，这样他们就能够让诺斯内阁倒台，之后其他一些更加有同情心的英国政治家上台后就可能能够与他们达成某种和解。

尽管三个和解方案之间差别很大，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议会为殖民地立法的权力是不可能被放弃的。在自从《印花税法案》危机以来的几乎每一次有关议会征税权的辩论上，议员们都担心，如果殖民地人成功地否定了议会的征税权，那么，他们可能进一步挑战议会对殖民地立法的权力。<sup>58</sup> 他们最担心的是，殖民地人可能会不再承认《航海条例》（17世纪通过的贸易管制法案），而这些法案被广泛地看作英国繁荣和强盛的基础。按照总检察长在1766年的说法，这些法案“对于这个国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用伯克在1774年所说过的话来

说，则是“这个国家有关殖民地政策的基石所在”。<sup>59</sup>《航海条例》将有价值的殖民地商品导向了英国，并使得英国可以对这些商品征收关税。这些法案下的惩罚性关税还使得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生产商无法进入殖民地，从而使得殖民地成了英国商品的乐园。或许更重要的是，《航海条例》规定国王领地之间通过海上运输的产品必须由大部分是英国船员的船只运输。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有充分的熟练海员储备，这些人在战时可以征召到皇家海军服役。<sup>60</sup>因此，有太多的东西都建立在让美国人继续留在《航海条例》所创设的框架内这一点上。如果他们脱离了议会的贸易管理框架，英国的财富、国家收入和海上霸权可能都会受到威胁。对于查塔姆伯爵和伯克而言，只要殖民地人继续留在《航海条例》的框架内，在征税权上的让步就是一个小的代价。而对于诺斯而言，让美国人留在这个体系内是同样重要的，但他的结论是，就马萨诸塞而言，镇压比怀柔更有可能起到作用。

诺斯孤立马萨诸塞的想法在战略上可能是合理的，但到了1774年年底，新英格兰的其他殖民地也明显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了。那年12月，罗德岛人从一个皇家军事堡垒中抢走了大炮，并将这些大炮带到了宾夕法尼亚，采取防御的态势。毫无疑问，英国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将这种情况考虑在内了：如果在马萨诸塞采取治安行动，那么，这个湾区殖民地旁边的殖民地可能会向它提供援助。不过，如果他们发现新英格兰之外的其他殖民地也在为开战摩拳擦掌的话，大臣们可能就不会这么掉以轻心了。根据一位到访北美的英国人的说法，即使是在南方殖民地，人们“处处都在训练，就好像他们马上就要受到攻击一样”。<sup>61</sup>然而，有大量英国军事力量而且人数还在源源不断增加的马萨诸塞，注定会成为冲

突首先爆发之地。“那里的人民，”根据一位当时在马萨诸塞旅行的一位弗吉尼亚医生的说法，“为了自由的事业，怒火满腔。”<sup>62</sup>1775年2月，一支英国军队在搜查马萨诸塞民兵隐藏起来的军火，而要不是当时这支英军行为谨慎的指挥官应对得体的话，可能就已经和马萨诸塞的民兵在萨勒姆（Salem）爆发公开冲突了。<sup>63</sup>

并不是英国驻军中的每一名军官都这么懂得克制。盖奇的妻子是美国人，而且从个人秉性上来说，他本就不大愿意采取加剧紧张局面的行动，但他的下属给他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下属内心痒痒，很想痛快一战。盖奇提出希望将军队扩充到2万人，并一直在等大臣们对他的增兵请求作出回复。4月14日，他终于收到了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给他写的回信。达特茅斯伯爵拒绝了盖奇的请求，认为他不需要更多的军队就可以恢复秩序，并说已经派给他指挥的军队足以让他战胜一群“粗鲁的群氓”。达特茅斯伯爵命令盖奇不要迟疑，立即采取行动将地方会议的头头脑脑抓捕起来，将马萨诸塞的反叛镇压下去。<sup>64</sup>盖奇将军还是不大乐意逮捕马萨诸塞参加大陆会议的那些代表，并决定集中力量摧毁康科德的民兵武器库。

4月18日深夜，大概800名英军士兵在第10步兵团指挥官弗朗西斯·史密斯（Francis Smith）中校的指挥下，离开波士顿开赴康科德。由于要等待补给，这支英国军队在路上耽搁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抵达莱克星顿。就在那里，英军被集结在村外草坪上的一个民兵连挡住了去路。英军指挥官命令民兵放弃他们手中的火枪就地解散。民兵们拒绝了。这个时候枪响了——到底是哪里来的枪声，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的英军开火了，打死了8名民兵。英军继



续向康科德进军，在那里，他们摧毁了他们可以找到的一切军火。第二场冲突发生了：当时负责保卫康科德镇外一座桥梁的英军轻步兵向一大群民兵开了火，他们认为这一群民兵正准备攻击他们。毫无限制的敌对行动立即开始了。

当英军开始返回波士顿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受到越来越多的愤怒异常的群众的攻击。由于受到隐藏起来的敌人的不断骚扰，史密斯带领的分遣队遭受了很大的伤亡，火药也消耗殆尽，开始慌不择路地抱头鼠窜。要不是一支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并用火炮提供支援，史密斯带领的如困兽一般的士兵们可能早就彻底灰飞烟灭了。但英军的噩梦还没有结束。在他们返回波士顿的途中继续受到猛烈的攻击。参加增援的一位士兵写道：“我们受到四面八方的火力攻击……每一堵墙都安排了火力，每一个屋子中都藏满了恶棍，这些人根本不敢现身站出来。”<sup>65</sup> 一份文件还写道：“甚至连‘平原’本身也对英军开了枪。”<sup>66</sup> 带领增援部队将史密斯的队伍解救出来的佩尔西伯爵，对他们返回波士顿的过程作了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英军士兵“在15英里的路程中，基本上就是在不断的火力攻击下做缩头乌龟，这个火力圈包围了我们，而且，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sup>67</sup> 在这场后来发展为一场长期战争的第一天，英军士兵的伤亡人数——被打死的、受伤的和失踪的——达到了273人之多。

### 【注释】

1 For examples of histories of the Revolution starting in the 1760s, see Robert Middlekauff, *The Glorious Caus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

1789 (New York, 1982); R.W. Tucker and D.C. Hendrickson, *The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Origins of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Baltimore, 1982); Harry M. War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ationhood Achieved, 1763–1788* (New York, 1995); Samuel B. Griffiths,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from 1760 to the Surrender at Yorktown* (Urbana, IL, 2002).

2 See, for example, Staughton Lynd, ‘Who Should Rule at Home? Dutchess County, New York,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viii (1961), pp. 330–59; Rowland Berthoff and John M. Murrin, ‘Feudalism, Communalism, and the Yeoman Freehold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Accident’, in Stephen G. Kurtz and James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1973), pp. 256–88; Gary B. Nash, *The Urban Crucible: The Northern Seaport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79); Benjamin L. Carp, *Rebels Rising: Citie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2007).

3 See, for example, Jon Butler, *Becoming America: The Revolution before 1776* (Cambridge, MA, 2000), especially Chapter 1.

4 See, for example, Rhys Isaac, ‘Evangelical Revolt: The Nature of the Baptists’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 in Virginia, 1765 to 1776’,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xxi (1974), pp. 345–68; Patricia U. Bonomi, *Under the Cope of Heaven: Relig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Colonial America* (rev ed., New York, 2003).

5 Merrill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 1776* (London, 1969), p. 716. For the colonis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rown, see Brendan McConville, *The King's Three Faces: The Rise and Fall of Royal America, 1688–1776* (Chapel Hill, 2006).

6 For a recent account of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esistance to parliamentary authority, see Craig B. Yirush, *Settlers, Liberty, and Empire: The Roots of Early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675–1775* (Cambridge, 2011).

7 Quoted in Robert M. Bliss, *Revolution and Empire: English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1990), p. 19.

8 Ibid., pp. 42–3. See also W.A. Speck, 'The International and Imperial Context', in Jack P. Greene and J.R. Pole (eds),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 (Baltimore, 1984), pp. 384–407, for a helpful periodization of imperial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9 See Mary Lou Lustig, *The Imperial Executive in America: Sir Edmund Andros, 1637–1714* (Cranbury, NJ, 2002).

10 James A. Henretta, 'Salutary Neglect':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Duke of Newcastle* (Princeton, 1972); Jack P. Greene, *Peripheries and Cent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xtended Politics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07–1788* (Athens, GA, 1986), pp. 45–

7.

11 See Jack P. Greene, 'An uneasy Conne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reconditio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Kurtz and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 32–80.

12 Robert C. Newbold, *The Albany Congress and Plan of Union of 1754* (New York, 1955). For a modern account, see Timothy J. Shannon, *Indians and Colonists at the Crossroads of Empire: The Albany Congress of 1754* (Ithaca, NY, 2000).

13 See, for example, Alan Rogers, *Empire and Liberty: American Resistance to British Authority, 1755–1763* (Berkeley, 1974), Chapter 6; Douglas Edward Leach, *Roots of Conflict: British Armed Forces and Colonial Americans, 1677–1763* (Chapel Hill, 1986), Chapter 6.

14 See Fred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1754–1766* (New York, 2000), especially pp. 286–8 and pp. 412–14.

15 See P.J. Marshall,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mpires: Britain, India, and America, c.1750–1783* (Oxford, 2005), especially pp. 95–7.

16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p. 227.

17 Malcolm Freiberg (ed.),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Massachusetts*, xxxvii, Part i, 1760–1761 (Boston, 1965), p. 115.

18 See Fred Anderson, *A People's Army: Massachusetts Soldiers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 Years' War* (Chapel Hill, 1984), Chapter 2.

19 Nathan O. Hatch, 'The Origins of Civil Millennialism in America: New England Clergymen, War with France, and the Revolution',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xxi (1974), pp. 407–30.

20 See, for example, University Library, Nottingham, Galway Collection, Monckton Papers, Ga M 23, 38, 62, letters to Robert Monckton from James Cuninghame, 24 June 1758, Isaac Barré, 9 April 1759 and Jeffrey Amherst, 24 July 1760; Centre for Kentish Studies, Maidstone, Amherst Papers, U 1350 C 84/2 Barré to William Amherst, 18 April 1758, and O 38/6, Jeffrey Amherst to Lord Barrington, 19 May 1760.

21 Edmund S. Morgan (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 Documents on the Stamp Act Crisis, 1764–1766* (New York, 1959), p. 62.

22 See P.J. Marshall, 'The Thirteen Colonies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the View from London', in Julie Flavell and Stephen Conway (eds),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The Impact of War and Warfare in Anglo-America, 1754–1815* (Gainesville, FL, 2004), pp. 82–4.

23 For a recent restatement of this old argument, see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1992), p. 135.

24 Stephen Conway,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Ireland* (Oxford, 2006), pp. 237–8.

25 Anthony Pagden, *Lords of All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1500–c.1800* (New Haven, 1995), especially

pp. 103–7; Bob Harris, “‘American Idols’: Empire, War, and the Middling Ranks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Past & Present*, no. 105 (1996), pp. 128–9.

26 Haines Hill, Berkshire, Colleton, Garth, and Godsall Family Papers, Box 23, transcripts of the Letter-books of Charles Garth, Garth to the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of the South Carolina assembly, 21 January 1764.

27 See John L. Bullion, “‘The Ten Thousand in America’: More Light on the Decision on the American Army, 1762–1763’,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liii (1986), pp. 646–57.

28 See especially Charles Ivar McGrath, *Ireland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688–1770* (London, 2012), Chapter 6.

29 See P.D.G. Thomas,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tamp Act Crisis: The First Phas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67* (Oxford, 1975); John L. Bullion, *A Great and Necessary Measure: George Grenvil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Stamp Act, 1763–1765* (Princeton, 1982); Philip Lawson, *George Grenville: A Political Life* (Oxford, 1984).

30 For the consultation with colonial agents, see Morgan (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 pp. 27–8, 33–4.

31 P.D.G. Thomas (ed.), ‘The Parliamentary Diaries of Nathaniel Ryder, 1764–7’,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Camden Miscellany*, xxiii (Camden 4th series, vii, London, 1969), p. 234.

32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lifornia, Stowe Collection, Grenville Papers, Letter–book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Whately and John Temple, STG Box 13 (6), fos. 6–7.

33 Quoted in Stephen Conway, ‘Brita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Crisis, 1763–1791’, in P.J. Marshall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 328.

34 Morgan (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 p. 52.

35 Ibid., pp. 9, 14, 15, 17, 51, 56 and 61.

36 Thomas Whately, *The Regulations Lately Made concerning the Colonies and the Taxes Imposed on them Considered* (London, 1765); William Knox, *The Claim of the Colonies to an Exemption from Internal Taxes Imposed by Authority of Parliament, Examined* (London, 1765); Soame Jenyns, *The Objections to the Taxation of Our American Colonies by the Legislature of Great Britain briefly Consider’d* (London, 1765).

37 See Daniel Dulany,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riety of Imposing Tax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for the Purpose of Raising a Revenue, by Act of Parliament* (Annapolis, MD, 1765).

38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678.

39 British Library (BL), London, Newcastle Papers, Add. MS 32, 973, fo. 343, Newcastle to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2 February 1766 (copy).

40 See Paul Langford, ‘The Rockingham Whigs and America, 1767–

1773', in Anne Whiteman, J.S. Bromley and P.G. M. Dickson (eds), *Statesmen, Scholars, and Merchants: Essays i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 Presented to Dame Lucy Sutherland* (Oxford, 1973), p. 147.

41 Chatham's position was widely misunderstood; he was nowhere near as conciliatory as Americans imagined: see Thomas,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tamp Act Crisis*, p. 292; and Marie Peters, 'The Myth of 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Great Imperialist Part II: Chatham and Imperial Reorganization, 1763–78',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xxii (1994), pp. 397–9.

42 See P.D.G. Thomas, *The Townshend Duties Crisis: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7–1773* (Oxford, 1987).

43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768), Letter III.

44 Morgan (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 pp. 145, 146.

45 See Richard Archer, *As If an Enemy's Country: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Bost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2010), Chapters 10–11.

46 Leonard W. Labaree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38 vols to date, New Haven, 1959–), xviii. p. 3.

47 BL, Egerton MS 246, p. 6, parliamentary diary of Henry Cavendish, 26 April 1773.



48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776.

49 For a recent account, see Benjamin L. Carp, *Defiance of the Patriots: The Boston Tea Part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Haven, 2010).

50 William Cobbett and John Wright (eds),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36 vols, London, 1806–20), xvii. p. 1164 (14 March 1774).

51 See Julie Flavell, ‘British Perceptions of New England and the Decision for a Coercive Colonial Policy, 1774–1775’, in Flavell and Conway (eds),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pp. 95–115.

52 See Stephen Conway,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Quebec and British Politics, 1760–1774’, in Phillip Buckner and John G. Reid (eds), *Revisiting 1759: The Conquest of Canad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ronto, 2012), pp. 141–65.

53 W. Bernard Peach and D.O. Thomas (eds), *The Correspondence of Richard Price* (3 vols, Durham, NC, 1983–94), i. p. 189.

54 K.G.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0–1783: Colonial Office Series* (21 vols, Shannon, 1972–81), viii. p. 186.

55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p. 813–16.

56 See T.H. Breen, ‘Where Have All the People Gone?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n the Eve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in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ster (eds), *War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75–*

1815 (Cambridge, 2010), pp. 263–84.

57 Cobbett and Wright (eds),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xviii. p. 97.

58 See, for example, R.C. Simmons and P.D.G. Thomas (eds),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s respecting North America, 1754–1783* (6 vols to date, Millward, NY, 1982– ), ii. pp. 127, 340; iv. pp. 64, 76, 172; v. pp. 238, 295, for speeches in debates in the Lords and Commons in 1766, 1774 and 1775.

59 Ibid., ii. p. 282; iv. p. 209.

60 See Daniel A. Baugh, ‘Maritime Strength and Atlantic Commerce: The Uses of “a grand marine empire”’, in Lawrence Stone (ed.), *An Imperial State at War: Britain from 1689 to 1815* (London, 1994), pp. 185–223.

61 Ted Ruddock (ed.), *Travels in the Colonies in 1773–1775* (Athens, GA, 1993), p.75.

62 Huntington Library, HM 818, Robert Honyman’s Journal, p. 82.

63 See G.R. Barnes and J.H. Owen (eds), *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 Earl of Sandwich* (4 vols, London, 1932–8), i. pp. 61–2, John Pitcairnto Sandwich, 4 March 1775.

64 Dartmouth to Gage, 27 January 1775,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x. pp. 37–41.

65 Huntington Library, HM 66, ‘Richard Pope’s Book’, 1775–7, p. 12.

66 City Archives, Sheffield, Rockingham MSS, R 150–2, Anon. to Dr Rogers, 23 April 1775.

67 Alnwick Castle, Northumberland, Percy Family Papers, vol L, Pt. A, fo. 53, Percy to Gen. Edward Harvey, 20 April 1775.

## 第二章 为美国而战

现在，盖奇的部队发现自己被一支愤怒的民兵队伍包围了。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斗的新闻在飞快地传播，激发其他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涌向波士顿，增强了包围波士顿的民兵力量。新英格兰地区人民的动员，毫无疑问由于有关4月19日的英军暴行的传闻而被进一步强化了。尽管英军对殖民地民兵的野蛮行径（这包括割去一位在康科德受伤的英军士兵的头皮并对他进行其他肢体残害）进行指控，<sup>1</sup>但美国人在这一场战争舆论的初步交锋中轻松获胜。这表明美国人特别清楚，有必要赶在敌人将故事宣传出来之前将自己这一方的故事付诸新闻报纸。<sup>2</sup>刚刚战败的羞辱还未远去，英军士兵已经发现自己的补给不足了，他们与周围地区的联络被切断了。他们不安因为周遭地形的情况而加剧了。波士顿北部和南部都是高地，如果叛军从任何一个高地用大炮对他们轰炸的话，他们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尽管在4月19日发生了公开战斗，盖奇还是不愿意让事态升级。直至6月12日他才宣布戒严。但是，约翰·伯戈因将军、亨利·克林顿将军和威廉·豪将军从英国抵达了美国，这让他觉得可以占领波士顿南部的多切斯特内克地带（Dorchester Neck）。然而，包围他们的民兵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并采取了反击措施。新英格兰民兵力量指挥官阿蒂马斯·沃德命令军队在6月16日和17日这两天的晚上在布利兹山（Breed's Hill）构筑了一个碉堡，以加强北部查尔斯城半岛、（Charlestown Peninsula）的防御。

第二天早上，叛军向波士顿北部地区发射了几发炮弹，以宣示自己的存在。英军放弃了向多切斯特内克地带进军的计划，转而开始攻打在布利兹山布防的民兵。当时是豪将军担任英军进攻的指挥官，他将大部分兵力都用在对美国人的防御工事的正面进攻上。让他感到极为吃惊的是，英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在得到增援之后，豪再一次发起了进攻。到底英军士兵是在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进攻才拿下民兵的堡垒的，不同的报道有不同的说法。但毫无疑问，如一位英军军官刻意轻描淡写地写道的，英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夺取了堡垒，而且代价巨大。<sup>3</sup> 英军士兵总共有226名阵亡，828名受伤，这相当于整个参与进攻的力量的40%。一位惊愕不已的英军军官在一封家书中写道：“那一天发生的可怕伤亡永远也不可能从我的心头抹去。”<sup>4</sup> 豪将军本人也很可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以至于他后来再也不敢从正面进攻有防备的美军阵地了。但让英军指挥官们不安的不仅仅是巨大的伤亡，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美国人的抵抗会如此坚决。盖奇将军不无抱怨地拿七年战争进行了比较，他说道：“在与法国人进行的任何战斗中，他们从来没有显示出有如此强大的专注力与坚韧不拔。”<sup>5</sup>

英军在这场后来被（不准确地）称作邦克山战役（Battle of Bunker Hill）中所遭受的重大伤亡，使得盖奇将军无法在短期内开展任何进攻作战。而且，波士顿暴发了痢疾，这使得军队变得更为虚弱了。但是围困英军的民兵，现在是由大陆会议上被推举为总司令的弗吉尼亚绅士乔治·华盛顿指挥，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亦深受痢疾暴发的影响。

华盛顿将军，一位在七年战争中赢得尊敬的殖民地军官——他当时

对不听指挥的士兵进行严厉的惩罚——对于现在由他指挥的这支新英格兰军队也格外忧心忡忡。他认为组成他的“大陆军”的民兵们实践的民主选举制度，完全和军纪无法相容。尤其是马萨诸塞军队的军官们，他认为他们“完全和普通士兵处在同一水平上……不可能指望这样一批军官来执行作战命令”，因为他们是被选举出来的，他们希望继续得到选举他的那些士兵的青睐。<sup>6</sup> 华盛顿不想以这样一支不可靠的力量来进行任何有风险的作战尝试，他甚至还担心，这样一批新英格兰人可能根本无法抵挡住英军发起的新进攻。



图2-1 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于1786年完成的画作《邦克山战役》，表现了1775年6月那种复杂的气氛。在这幅画作中，一名

英军军官阻止士兵不要用刺刀去刺杀受伤倒地的美军军官约瑟夫·沃伦（Joseph Warren）。

由于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发起新的攻击，波士顿围城战役由此陷入了僵局。英国驻军中的沮丧的军官们，考虑过解决他们所处困境的各种极端方案。和盖奇一样对叛军的坚定决心感到惊讶不已的詹姆斯·格兰特，渴望军队可以逃离“这种压抑、可耻的处境”，并要求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海岸线地带夷为平地；同时，费城，这座举行大陆会议的城市，应被彻底摧毁。<sup>7</sup> 其他一些军官则盼望土著对反叛各州的边境地区开展进攻，一些人甚至还设想过鼓动南部的奴隶起义。<sup>8</sup> 盖奇向伦敦的政治头脑们建议，英军应该从波士顿撤离并转移到纽约去，因为他和他的高级将领们都认为纽约人对他们更加友好，在那里开展作战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在10月份得到政府同意后，豪取代盖奇成为英军总司令。豪认为，要在冬天到来之前组织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决定在那里坚守，等春天来了再说。



图2-2 1772年担任弗吉尼亚军队上校时的乔治·华盛顿。此画绘作



者为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

与此同时，军事作战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上纽约地区和加拿大。那里的英国驻军很少，因为一些军队已经在两军公开交火之前的几个月中转移到波士顿去增援盖奇了。美国人已经在5月占领了防御薄弱的英军大要塞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9月中，美军开始围攻圣约翰堡（Fort St John），英国驻军在那里一直坚持到11月初。他们在那里的坚守很可能拖延了美军进军的步伐，从而挽救了英属加拿大。不过，由于圣约翰堡陷落没几天叛军就攻入了蒙特利尔，因此，当时是很难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就在圣约翰堡陷落之时，第二支美国军队穿越缅因的森林地带抵达了圣劳伦斯河谷。于是，这两支美国部队联合起来之后，开始对魁北克市展开进攻。魁北克是英军在加拿大的最后一个据点。在那一年的最后一天，英国驻军成功打退了美军的进攻。在这场战斗中，叛军指挥官理查德·蒙哥马利（他以前曾是英军指挥官）被打死了。但到1775年结束的时候，英军在北美的情况看起来依旧令人绝望。所有老的英国殖民地都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叛军手中，而英军在波士顿和魁北克的坚守看起来也脆弱不堪。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大陆会议一直对于和解保持开放态度。实际上，正是美军在早期取得的胜利，让大陆会议认为达成一份可接受的协议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是，在4月19日和6月17日英国军队遭受惨败之后，英国政府真的准备好与美国人进行和谈吗？约翰·迪金森说服了自己在大陆会议的伙伴们，同意在1775年7月向国王递交一份橄榄枝请愿书（Olive Branch Petition），这份请愿书强调殖民地继续对国王效忠，

并希望能够实现某种和解。大陆会议还向英国人民发表了一篇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可能的和解方案：如果议会放弃对美国征税的权力，殖民地可以接受议会对殖民地海外贸易的监管。甚至，如果他们的贸易不受限制的话，他们还愿意承担一些帝国防卫开支。大陆会议在7月31日正式拒绝诺斯勋爵的和解方案的时候，似乎也提出了同样的说法。<sup>9</sup>



图2-3 约翰·特朗布尔于1786年的画作《蒙哥马利将军之死》，大幅借用了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1770年创作的更为著名的画作《沃尔夫将军之死》中的场景。这两幅画作中的英雄主角都阵亡在了魁北克的城墙之下。

英国政府没有响应美国人表达的这种和解意愿。相反，国王在8月

发表了一份宣告，宣布殖民地处在叛乱状态，并呼吁他所有的忠实子民，包括那些在殖民地的子民，一起来扑灭这场叛乱。<sup>10</sup> 乔治三世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已经开始组织一支很大的增援部队，准备于来年部署到殖民地去。这支部队将与从波士顿撤出的英国军队联合起来，剿灭叛乱。负责陆军事务的陆军大臣巴林顿勋爵对于是否能够及时组织起一支足够强大的陆军表示怀疑，他更倾向于通过海军封锁美国海岸线来迫使美国人屈服。一些陆军军官——有一些在国内，有一些在波士顿——都和他持相同的观点。<sup>11</sup> 然而，国王固执地认为，快速扑灭叛乱的唯一方式就是组织一支庞大的陆军力量；而有效的海上封锁，即便这种封锁是可以做得到的，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殖民地屈服。而且，海上封锁还可能会刺激法国，法国可能担心，英国在大西洋上部署这么多的战船会对法国人在加勒比地区的领地构成威胁。此外，还需要考虑那些忠于国王的保皇派。殖民地总督们，特别是南方那些总督，认为大部分美国人还是忠于国王的，只要英国军队出现，他们就会为了国王而行动起来。正如南卡罗来纳总督在1775年8月写到的：“这个南方地区有数以千计的忠实的子民……只要得到任何一点支持，就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捍卫宪法。”<sup>12</sup> 北卡罗来纳的总督也指出，只需要派英国正规军中的“一小支部队”，就可以打通与“居住在这个殖民地内陆地区的大量受影响的人们之间的沟通渠道”。<sup>13</sup>

然而，对于在1776年在北美部署一支很大的陆军所起的作用上，巴林顿勋爵的悲观看法是正确的。快速征到必要的士兵不容易，特别是在国王不愿意建立新的军团的情况下，而建立新军团是进行大规模力量动员的最佳方式。乔治国王没有选择建立新军团这个思路，因为他觉得这

种军队在短期内的战斗效率会比较低。相反，他更倾向于使用已经训练有素的、可以立即投入战斗的外国军队。利用他的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乔治国王将超过2000名汉诺威士兵借给英国政府，将驻守在直布罗陀和米诺卡的部分英军替换出来。他试图向凯瑟琳大帝借调一个俄罗斯军团，但没有成功。他还试图将苏格兰旅（Scots Brigade）调回英国，但也失败了（苏格兰旅是一支在荷兰服役的军队，指挥官都是苏格兰人，但士兵的身份则多种多样）。不过，国王成功利用自己与德意志之间的关系与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黑森哈瑙（Hessen-Hanau）、沃尔德克（Waldeck）和布伦瑞克（Brunswick）进行了协商，借调了不少的德国的辅助部队。1776年，大约有1.8万名德意志辅助兵被派往北美。

英国政府试图将北美冲突欧洲化的企图，则更谈不上取得了什么成功了。这不奇怪，因为诺斯勋爵及其同僚们特别注意要防止波旁王朝的强国，也就是法国和西班牙，利用英国面临的困境趁火打劫。法国和西班牙派驻伦敦的大臣们传达的友好表示，让人觉得放心。作为国务大臣之一的罗奇福德勋爵甚至认为，有可能可以说服这两个国家来帮助英国镇压叛乱。因为如果美国人叛乱取得成功的话，也不符合任何欧洲帝国的利益。<sup>14</sup> 罗奇福德的这个观点当然有道理，但他同样也非常清楚，法国尤为可能是仅仅为了削弱英国的目的而去帮助美国人的。9月，他将法国人已经向叛军供应武器的情报传递给了达特茅斯伯爵。<sup>15</sup> 事实上，法国官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分歧。法国财政大臣杜尔哥不愿意再发生新的战争，而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则非常希望利用这个黄金机遇来打击英国。实际上，韦尔热讷伯爵已经向美国人伸出了试探的触角，

他批准向美国派出一位代表在8月份与大陆会议进行会谈。第二年的春天，韦尔热讷伯爵在与杜尔哥的内部争斗中终于胜出。1776年5月，路易十六同意向美国人提供秘密财政援助。<sup>16</sup>

与此同时，诺斯勋爵政府则非但不与大陆会议谈判，反而似乎下定决心要让冲突加剧。尽管政府已经决定陆军是镇压叛乱的最主要的武器，但同样打算让皇家海军起到一个辅助作用。1775年11月，议会通过了《美国禁运法案》（American Prohibitory Act），依据该法案，所有来自叛乱殖民地的商船都成了皇家海军的攻击目标。在此之前，许多美国人还坚持认为他们是与英国政府及其议会，而不是国王，发生了争吵。正如理查德·蒙哥马利在7月初向他的一位以前在英军时候的同僚所说的，英国人应该“从他们的孩子身上学习，抵制一个邪恶的政府——同时确保国王的神圣。”<sup>17</sup> 美国人认为他们所抵抗的军队并不是国王的军队，而是‘正规军’，或者说是‘政府军’”。<sup>18</sup> 他们所盼望的是国王会进行干预从而挽救他们，他们盼望国王解除诺斯勋爵的职务并任命新的内阁，盼望国王更愿意与殖民地达成妥协。但这种渴盼在8月份遭受了打击。国王宣告殖民地处在叛乱状态，这清晰地表明乔治国王是支持内阁的。国王在1775年10月议会开幕时宣布他将派驻外国军队到北美殖民地去，这也让殖民地感到失望。<sup>19</sup> 但或许，给殖民地对乔治三世的信心带来最严重的打击的是《美国禁运法案》。这个法案将皇家海军——国王的海军——同美国人民对立起来，这一举动破坏了古老的政府契约：人民对国王效忠，以换取国王的保护。正如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所说：“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已经勾结在一起，将我们这个国家从那个契约割裂开来了，而且我认为，是永远割裂开来了。”他认为，这个法

案“促使我们独立，尽管我们曾不断地发出恳求”。<sup>20</sup>



1776年前几个月，当英国政府持续为那一年的战事做着准备的时候，美国人也为即将到来的进攻做好了准备。强大的皇家海军的到来意味着反叛各州的整个海岸线都暴露在攻击之下。用另外一位在大陆军的前英国军官查尔斯·李的富有煽动性的话来说，就是“（装着帆布翅膀的）敌军，可以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sup>21</sup> 当英军登陆之后，李认为，美国人能够获胜的唯一出路就是采取激进措施。他认为，没有作战经验的叛军是无法在常规战争中与英军抗衡的。相反，他建议，美国军队应该继续作为民兵力量形式而存在，不能与英军正面对抗，而应与英军开展游击战。而华盛顿则决心建立一支欧洲式的军队，并开展正面作战。在早年生活中他就曾渴望成为一名正规军军官。他的个人秉性和社会背景决定了不喜欢那种分散式作战，因为他以及其他高级将领对这种作战没有太多的掌控力。游击战在华盛顿的作战计划中会有一席之地，但只是大陆军常规作战的一种补充。美国革命及其伴随的武装冲突，毫无疑问让民主力量获得了解放，而且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重大改变，但只要诸如华盛顿这样的精英阶层掌握权力，那么，美国社会秩序的彻底重构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sup>22</sup>

3月，豪终于将军队撤离了波士顿。由于他必须将一大群忠于英国的保皇派平民带走，这些平民还带上了大量的财产，因此，他决定按原来的计划到纽约去，于是改道去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哈利法克斯，这个地方依旧牢牢掌握在英军手中。在那里，他等候着英军和德国雇佣兵坐船穿越大西洋抵达哈德逊河谷南部地区的消息，这些军队将在

那里与他并肩作战。英国政府的设想是，豪的主力部队往北进发，最终与沿着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走廊从加拿大抵达上纽约地区的军队会师。这支加拿大军队主要是由英国士兵和德国士兵组成的，他们将会转移到圣劳伦斯河谷地区，去支援被围困在魁北克的英军。一旦将美国军队从这个地区赶出去之后，他们将继续开拔，来与豪会师。第三支英军将被派到南方各州去，与北卡罗来纳的一小支军队会师。北卡罗来纳的这支军队是在英军从波士顿撤退之前从波士顿坐船抵达北卡罗来纳的。英军在南方地区作战的任务是向南方地区大量忠于英国的保皇派提供支持。据说，定居在北卡罗来纳地区的苏格兰高地人特别愿意表现出对王室的忠诚。大臣们和军事指挥官们也可能特别考虑过南卡罗来纳地区的大量奴隶人口。在前一年，弗吉尼亚的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就已经试图征募黑人军队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威了。而南卡罗来纳奴隶起义的可能性可能足以说服该殖民地的白人居民与其他叛乱州决裂，与英国达成妥协。

要执行这样一项庞大的计划绝非易事。为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可是英国政府派往海外的最大一支军队——有效地提供补给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军队补给这一点上还不能依赖本地资源，除非英国军队已经控制了大片的肥沃地区。因此，需要将大量的食品，包括人吃的和马喂的，通过大西洋运输过来。爱尔兰提供“湿”粮，比如肉和黄油，这些粮食储存在科克（Cork）的一个大仓库中。而“干”粮，主要是指谷物类食品，则是在英格兰，特别是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采购的。<sup>23</sup>1775年年末接替达特茅斯伯爵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乔治·杰曼勋爵，在确保英军补给和装备的充分上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同时也指挥

着北美的战事，实际上扮演了政府战争大臣的角色。但以前也是行伍出身的杰曼，非常清楚对3000 英里以外的战事进行微观指导是不可能的。他负责制定战略，但具体的执行则需要仰仗身处战争现场的将领们。1776年，英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但最终没有能够按照杰曼及其同僚所设想的那样将美国人彻底打败。

从英国的角度而言，最不成功的战役发生在南部地区。从波士顿撤离并于3月12 日抵达恐怖角（Cape Fear）的那一小支英军的将领亨利·克林顿，发现他们来得太晚了，已经无法给北卡罗来纳的保皇派提供什么支持了。这些英国人过早地发动了起义，并在2月末的摩尔小溪桥战役（Battle of Moore's Creek Bridge）中被镇压了。从爱尔兰漂洋过海抵达的查尔斯·康华里伯爵指挥的英军主力部队在4月中与亨利会师，但是，由于那里不再有可能有什么忠于英国的人起事了，于是这两位将军决定从北卡罗来纳撤离，到南卡罗来纳去。他们发现那里的殖民地叛军正在面对大海方向在通往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道路上构筑防御工事，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开展进攻，而是试图让军队在临近的长岛（Long Island）登陆，以对苏利文岛（Sullivan's Island）上的美国军队展开攻击。由于对当地地形所知甚少，英军无法通过那些根本无法通过的小溪，卡在那里进退两难。按照一位低级军官的说法，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只好干瞪着眼看着叛军在我们眼前构筑防御工事”。<sup>24</sup>6月末，舰队司令皮特·帕克爵士（Sir Peter Parker），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海上力量的指挥官，认为自己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他对苏利文岛上的美军工事展开了鲁莽进攻。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帕克的战舰根本没有办法打掉岛上的大炮，这些大炮对他的舰队造成了很大损伤。英军两次试图登



陆，都被打退了。查尔斯·李将军原来对于美国军队在传统战斗中抵御英国正规军的能力有极大的怀疑，却因为“新招募的一群人”居然显示出了“如此的冷静和勇敢”而非常高兴。<sup>25</sup> 由于越来越多士兵生病，克林顿和康华里判定他们已经丧失了取胜的机会，于是决定重新开拔，到纽约去与豪会师。

与此同时，在加拿大，英军并没有遭遇类似的失败，但却也没有能够抓住大部分机会。圣劳伦斯河上冰层在5月初终于融化了，这使得约翰·伯戈因将军带领的英军和德军抵达了魁北克市。在那里，他们与盖伊·卡尔顿指挥的一小支英国驻军会师。这一小支英国驻军在1775年最后一天抵挡住了美国军队的一次进攻。卡尔顿接过了英军的指挥权，指挥英军对叛军开展反攻。1776年6月8日，英军在三河城（Trois Rivières）打败了叛军。叛军指挥官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下令从蒙特利尔撤军。6月18日，英军抵达了纽约边境地区的圣约翰堡。然而，这个时候，卡尔顿浪费了扩大胜利战果的大好机会。他没有继续追击情绪低落的美国军队，重新占领克朗波因特（Crown Point）和提康德罗加的军事堡垒；相反，他选择停下来并组建一支小舰队，以便在尚普兰湖上开展战斗。直至10月11日他才指挥英军重新开始追击，在瓦尔古岛

（Valcour Island）附近打败了阿诺德指挥的一支小舰队。阿诺德放弃了克朗波因特，撤退到了提康德罗加，但卡尔顿又一次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他要求提康德罗加的驻军投降，但他似乎对如果驻军拒绝投降的话该怎么应对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让美国人惊讶的是，卡尔顿认为，提康德罗加的防御太强大，无法在一年中这么晚的时候开始对它展开围攻。于是他带领军队撤回到了加拿大的冬季兵营中，

放弃了在上纽约地区原已抢夺过来的那些据点。

豪的军队是最成功的，但也没有能够扑灭叛乱。离开波士顿来到哈利法克斯的军队在6月份坐船向纽约进发，并于当月29日抵达了纽约港南部的桑迪胡克（Sandy Hook）。自4月以来一直在等着豪的华盛顿，已经在当地做好了防御。豪的军队7月初登陆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岛上居民看到英军似乎很高兴。根据一位军官的说法，居民们对英军的到来感到异常满意。<sup>26</sup> 这肯定让豪更有信心认为纽约的居民对英军会抱有好感。但这位英军指挥官依旧不愿意对华盛顿立即展开攻势，他要等跨越大西洋的克林顿和康华里的军队到来之后再说。

在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那种异常的平静之中，大陆会议宣布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这可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迪金森和其他温和派直到最后一刻都一直在反对独立。这场战争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人不再是在大英帝国内争取一项更好的交易了，而是为了争取完全的政治独立。独立给他们带来的分裂比战争头几个月给他们带来的分裂要大得多。许多热情地抵制议会权威的美国人无法接受最终与英国国王断绝关系，佐治亚的种植园主大卫·祖布利（David Zubl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年之后他回忆说，在1775年，他曾在一个革命委员会任职，并参加了民兵组织，但在1776年4月他辞职了。他认为大不列颠没有权利对北美征税，但他并不赞同采取武力来对抗，也不希望独立。<sup>27</sup> 7月4日正式发布的《独立宣言》似乎意识到对乔治三世国王继续效忠的力量还很强大，因此，通过将过去那些年中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推在国王身上的方式来败坏国王的声誉。不到一年之前大陆会议还表示效忠的乔治，现在被宣布为是一场“绝对暴政”的阴谋的策划者。<sup>28</sup> 尽管

《独立宣言》的目的是为了给美国人拒绝王室权威找到合理理由，但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国内的，而是国际的。大陆会议领导人们知道他们需要外国援助，而如果美国人看起来还会回到英国的怀抱的话，是没有哪个欧洲强权会真的助他们一臂之力的。《独立宣言》宣布一个新的政治体——美利坚合众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它可以与任何准备提供帮助的欧洲国家缔结相应的条约。<sup>29</sup> 大陆会议在寻求可能的盟友上一点也不拖沓：9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瑟·李（Arthur Lee）就搭船向巴黎进发，进而向法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条约草案。然而，当这两个大陆会议代表抵达法国首都的时候，在法王路易十六的那些大臣看来，美国人看起来还远不具备合格伙伴的资格，因为那个时候大陆军刚刚遭遇了一次重大失败。即使是韦尔热讷伯爵都肯定怀疑过自己到底是否赌对了。

直到8月中旬整个英国军队才完成集结。豪的想法是占领纽约市，但他同时希望打垮华盛顿的军队。华盛顿军队的主力都驻扎在长岛的西端。在构筑于布鲁克林高地上的防御工事中，大陆军可以掌控邻近曼哈顿岛南端的纽约市。8月22日，英国军队开始在长岛登陆。对美军的先锋部队进行试探之后——这支先锋部队在布鲁克林防线前大约两英里的地方——豪认为美军非常强大，无法通过正面进攻击败他们。他决定用黑森部队在美军正面防线的中心地带和美军纠缠，同时格兰特将军将从美军右侧佯攻，而豪和克林顿则带领一支英军主力向美军暴露的左翼发动猛攻。英国和德国军队之间的协作堪称完美。8月27日早晨，英军的侧翼进攻华盛顿的军队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没有经验的美国军队混乱地向布鲁克林防线撤退。正如克林顿所描述的那样，美军“四散溃逃；慌不择路地穿过海湾、沼泽和小溪”。<sup>30</sup> 结果大量的美军士兵被俘。

中午时分，英国和德国军队已经抵达了布鲁克林的防御工事附近。然而，在那个时候，英军总司令下令暂停进攻。我们现在只能猜想，如果他让军队立即开展攻击的话，情况会怎样。看起来，如果他抓住了那个时刻——当时美国军队还处在混乱之中——华盛顿的大陆军，作为一支战斗力量，很可能就被消灭了。但是，或许是由于之前进攻布利兹山防御工事的血腥战况留下了阴影，豪决定不立即展开进攻，而是开始构筑攻城工事。华盛顿一开始计划留下来与英军战斗，他甚至请求驻扎在纽约市的军队提供支援。但8月29日，他听从了同僚的意见：如果豪的哥哥理查德·豪子爵指挥的英国军舰驶入长岛和曼哈顿之间的狭窄水域的话，就无路可逃了。那天晚上，遭遇挫败的华盛顿军队的残余部队搭乘小型船只组成的船队回到了纽约市。

这个时候，海军上将豪认为，他和弟弟应该邀请美国人过来进行商谈。相对于大部分英国人来说，豪兄弟有很好的理由对美国人更友好一些，因为马萨诸塞议会拨款为他们俩1758年在美国战死的哥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被安放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sup>31</sup> 不过，在他哥哥到来之前，威廉·豪并没有对美国人显示出过多的热情。实际上，4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在哈利法克斯——他就对英国政府未能争取到俄罗斯军队参战感到失望，因为他认为俄罗斯的军队肯定会大力绞杀叛军。但子爵是他兄长，他很可能接受了兄长的劝说，采取了一种对美国人进行安抚的思路。不过，豪兄弟这么做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权限了。他们俩都被任命为和平谈判代表，同时也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指挥官。但英国政府的要求是，他们仅向表示臣服的美国人提出诺斯勋爵的和解方案。即使是在长岛战役之前海军上将豪也曾经和他的老朋友本

杰明·富兰克林联系，不过，他被告知已经不再可能实现和解了。“时机已过。”富兰克林直截了当地回复道。<sup>32</sup>在长岛战役即将开始之前，豪勋爵的秘书写道，兄弟俩“内心最希望的是充当促使两个国家和解的桥梁”。<sup>33</sup>现在，在英军占据了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海军上将豪想再试一试。他提出可以和大陆会议代表见面，并且，可能是受了查塔姆伯爵和解方案的影响，他提出美国人所受的冤屈可以被纠正，甚至暗示大陆会议都有可能被承认。颇犹豫了一番之后，大陆会议任命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与豪勋爵会谈。正如亚当斯所预料到的，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豪勋爵根本未能说服美国代表放弃他们的“独立制度”。<sup>34</sup>

这样，军事行动就重新开始了。长岛战役胜利之后，英军很自信——或许是过于自信了。豪将军认为长岛战役胜利的原因之一是英军使用了刺刀，这个武器似乎令美国士兵感到恐惧，甚至是在林间战斗中也是如此。<sup>35</sup>在海军上将豪的战舰的炮火掩护之下，一支英军先遣队在曼哈顿岛的基普湾（Kipp's Bay）登陆。不过，由于一直忙于站稳脚跟，登陆的英军没能阻止美军从纽约市撤离并重新在曼哈顿岛的北端集结。第二天，英军在啥莱姆高地（Harlem Heights）遭遇了挫败，这正好让情绪低落的美军重新振奋起来，或许同时也让豪将军更为谨慎。他和他哥哥在9月19日再一次试图让美国人和他们进行和谈。当时，他们发布了一份告示，邀请美国人进行谈判并实现和解，并且，在未得到伦敦授权的情况下，说国王将会允许美国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或许豪兄弟认为，他们向美国人提出的东西，并没有超出诺斯勋爵的和解方案的范畴。但我们要记住，政府的想法是，只有当美国人表示服从英国权威的

时候才与他们展开谈判，而在表示服从之前是不能进行谈判的。一位研究这场战争的著名历史学家认为，豪兄弟的这种把战争与和谈搅和在一起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位历史学家作出的下面这个论断是很难被挑战的：豪兄弟不愿意掐住美国人的咽喉，这对英国人取得胜利的<sup>36</sup>希望有致命的影响。

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曼哈顿北部地区构建了两条平行的防御工事。为了打破僵局，10月12日，豪将军派部队登陆到大陆上去，这迫使华盛顿用自己的主力部队来阻挡豪的军事行动。华盛顿的军队驻扎在白原（White Plains），豪对那里发动了攻击，并在当月的28日占领了美军位于查特顿山（Chatterton Hill）的最右翼的防御工事。但是，就像在长岛和基普湾一样，这位英国将军还是没有抓住时机最大限度扩大战果。相反，他决定掉转身来对付依旧困在曼哈顿岛上的美国军队。这些叛军现在被困住了，英军从南面、北面和东面对他们形成了合围，而皇家海军又将他们从哈德逊河撤退到新泽西的路线切断了。11月15日，豪要求美军投降，但被拒绝了。第二天，英军从南面、北面和东面发动了全面进攻。美军的外围防线马上就崩溃了。剩下的美军都龟缩在华盛顿堡中。由于再进行抵抗徒劳无益，美军投降了。叛军失去了超过3000名的军官和士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了俘虏。对于叛军来说，这是一次和三个月前在长岛遭遇的那次失败一样的惨败。

这个时候，豪派遣克林顿和佩尔西伯爵指挥一支英军去占领罗得岛的纽波特（Newport）。这个地方可以为海军提供一个安全的栖息港，并可以成为在新英格兰发动军事行动的基地。12月1日，克林顿实现了作战目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成功地将大陆军海军的大部主力封锁

在了普罗维登斯港（Providence）。不过，豪的主要目标是占领位于新泽西的哈德逊河西岸并追击华盛顿。在曼哈顿陷落之前，华盛顿带领部分美军来到了新泽西。11月20日，康华里带领的一支英军在新泽西的克罗斯特（Closter）登陆。康华里立即进发，奋力追击华盛顿的军队。在登陆一周之后，英军抵达了纽瓦克（Newark），那个时候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康华里又一次差一点在12月1日在新布伦瑞克抓住了华盛顿。逃跑中的美军的情绪自然很低落，军队也开始瓦解。服役期在11月30日已经届满的士兵开始回家，绝望的华盛顿只好向新泽西的民兵求援。英军差一点又在普林斯顿追上了队形不整的华盛顿军队余部，但美军那个时候刚刚在特伦顿（Trenton）渡过了特拉华河，抵达了相对安全的宾夕法尼亚。惶惶不安的费城人努力做着豪带领的英军到来的准备。费城指挥官以色列·普特南（Israel Putnam）命令每一个士兵以及“所有居民”都要动员起来加强费城的防御工事。<sup>37</sup> 然而，豪将军找不到船只，因此对华盛顿的追击只能停止。

对英国人来说，纽约和新泽西的战役非常成功，按照一位军官的说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sup>38</sup> 就好像给胜利的蛋糕再加上一层甜蜜的糖衣一样，12月13日，英军的轻龙骑兵发动了突袭并抓住了查尔斯·李。当时，查尔斯·李正带领华盛顿留在下纽约地区的军队来到北新泽西。第二天，豪命令军队回到营房休整。但英军所抱的那将是一个“安静的冬天”的期望，不久就破灭了。<sup>39</sup> 华盛顿撤退得非常仓促，他没来得及为他带领的这支摇摇欲坠的军队动员好什么本地支持。尽管如此，武装起来的居民让那些离开豪军队主力的英军和黑森士兵的日子很不好过。当地人的反抗，看起来是被英军和黑森军队的行为激发起来的。他们所

到之处，可谓寸草不生，盗窃横行，骚扰和强奸盛行。按照一个美国人的说法，“最胆小的人都拿起了武器”。尤其是黑森士兵，他们被指责“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抢走他们的所有东西，甚至身上穿的衣服，并以最为残酷的方式殴打和虐待男人、女人和孩子”。<sup>40</sup> 早在12月12日，英国军指挥官就威胁要就地处死“对他的军队开火的、任何不穿士兵服装且没有军官带领的美国人”。<sup>41</sup> 但当地人并未因此害怕，反而继续抵抗。按照一位英国军官在12月23日的牢骚满腹的记载，当地人利用“树林和灌木丛”的掩护，逐一消灭他们的敌人。<sup>42</sup> 英军和德军虽然因为胜利而情绪高昂，但遭到这种抵抗的士兵们开始认识到，仅仅是战斗胜利，还可能不足以让反叛的美国人安分下来。

英军在1776年战役中的胜利战果，在12月25至26日晚上，遭遇了更为全面的损失。当时，完全出乎英国人的意料，华盛顿带领军队大胆地重新渡过特拉华河，并在第二天早上攻击了驻扎在特伦顿的黑森旅。刚刚从圣诞热烈气氛中回过神来的德国军队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根本没有办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有超过100名黑森士兵被打死、受伤，有近1000人被俘虏。美军则只有4名士兵受伤。在过去5个月中遭遇一个又一个失败的华盛顿发现，没有什么比取得胜利更有号召力了。当他撤退的时候他很难赢得更多的士兵来帮助他，但他现在发现，补充兵员源源不断地涌来。他决定不去宾夕法尼亚了，相反，他决定深入新泽西作战。豪命令几个星期之前在新泽西追击华盛顿的康华里对美军的侵袭进行反击。但华盛顿刻意避开了康华里的锋芒，转而在普林斯顿附近攻击了两支正在行军的英国军团。美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其中一支英军第17步兵团勇猛地击退了华盛顿的攻击，并最终在特伦顿与康华里会



师。第二支英国军团快速地撤退到了普林斯顿，并试图与留在城内的第三支英国军团撤退到新布伦瑞克去。英军损伤惨重，大部分死伤的人员都来自第17步兵团，而其他两个团的士兵则以被俘为主。<sup>43</sup>



图2-4 伊斯特曼·约翰逊（Eastman Johnson）在19 世纪创作的这幅著名画作，描绘的是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去进攻特伦顿的黑森军队的场景。这幅画作根据埃曼纽尔·劳以柴（Emmanuel Leutze）的画作进行绘制。但实际情况跟画作中所表现的可谓千差万别，而且，华盛顿是在夜里渡过特拉华河的。

华盛顿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胜利，终结了英国人取得连胜的局面。而且，这些胜利或许确保了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存活下来。在美国发动反击之前，1777年招募新的军队的前景，看起来非常渺茫。甚至通常都保持冷静的华盛顿，在特伦顿战役之前，都坦白地说，“游戏快要结

束了”。<sup>44</sup> 在他取得胜利之后，美国人的运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军将领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曾酸溜溜地预测说，这回华盛顿可以征集到大陆会议夸下海口的86个军团了。<sup>45</sup> 对于豪的军队而言，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为其带来了更为苦涩的后果。在整个冬天剩下的时间中，新泽西的英军持续受到骚扰，士气低沉。一位军官说，这种骚扰是“一小群一小群叛军偷偷摸摸地进行的”，<sup>46</sup> 另一位军官的说法则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被骚扰”。<sup>47</sup> 而根据詹姆斯·格兰特的说法，“这是我经历的最令人不舒服的处境”。<sup>48</sup> 战争会快速结束的任何想法都被抛弃了。此时，另一场战役急需开始。

英国政府对豪未能镇压叛乱很不满。根据一项报告的说法，英国政府私下认为他在指挥战争上过于拘谨了。“根据大臣们的说法，他们似乎希望华盛顿堡被摧毁，驻军被处死。”<sup>49</sup> 豪将军的一些下属则倾向于阴谋论。他们认为豪故意拖延战争的步伐，为的是提高军队供应商的利润。<sup>50</sup> 对他这种谨慎行为的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在离国内本土这么遥远的地方维持一支军队有许多困难。豪似乎非常注意不要发生大的伤亡，因为一旦如此，要得到补充兵源将十分不易。这一点，再加上他希望将外交手段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的想法，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有一些放不开手脚。但不论英国大臣们多么不满意，他们并没有作出什么改变。豪继续担任指挥官，英国在1777年的作战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1776年作战计划的翻版。考虑到查尔斯顿的惨败，南方作战没有包括在内就毫不奇怪了。但这种想法，即派一支军队从加拿大向南部进发，并让这支军队配合在下纽约地区的英军主力作战，一直占据了整个作战计划的中心位置。

1776年在卡尔顿手下任职的约翰·伯戈因在那年冬天回到伦敦，为自己谋划加拿大军队的指挥职务。他认为，北方军队应该占领提康德罗加，之后可以在下面两条路线中进行选择：往南进发到哈德逊河谷，或者往东南进发到新英格兰，并与从纽波特进发的英军配合作战。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之后，豪减少了罗得岛的英军力量，增强了新泽西的英军力量，这使得要在新英格兰进行一场联合作战更加困难。但杰曼支持伯戈因提出的进军到哈德逊河谷的思路，这可以将新英格兰这片反叛的核心地带与其他各州隔离开来，从而使得美军的抵抗崩溃。1777年3月，杰曼指示卡尔顿从他麾下的加拿大军队中分出两支军队来，主要的一支由伯戈因带领，向南进发与豪会师。另一支规模小一点的军队，则由巴里·圣·烈治（Barry St Leger）中校带领，从安大略湖沿着莫霍克河谷（Mohawk Valley）向东进发，这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以便让伯戈因那边可以顺利推进。但对计划中的两军联合作战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与豪之间的协调，从来没有好好地确定下来。

1776年11月末，豪曾说他会派1万名士兵沿着哈德逊河到奥尔巴尼去，同时留8000名士兵守卫纽约和新泽西，并迫使华盛顿将大陆军主力用在保卫费城之上。但英军在新泽西的成功使得豪减少了支持伯戈因行动的兵力。那个时候豪认为应该优先进攻华盛顿并夺取费城。12月20日，他给杰曼写信说不会派一支1万人的军队，而是会派一支3000人的军队为“从加拿大来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支持。<sup>51</sup> 看起来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并没有让他放弃将重点放在西南部的想法，相反，反而让他下定决心要集中精力捉住华盛顿并攻陷费城。1777年4月2日，他告诉杰曼，伯戈因不要指望从他的军队那里获得太多帮助，因为他会忙

于在宾夕法尼亚开展战斗。豪进一步说，他计划从海上进攻费城，而不是穿越新泽西从陆地上去进攻费城。4月20日他说，他很可能没有办法按时完成在宾夕法尼亚的军事行动，从而没有办法为北方军队提供任何支持。<sup>52</sup>

我们或许可以说杰曼应该确保豪更加配合才是。毕竟，对这场战争进行战略把握是他的责任所在。他看起来没有作什么努力来说服豪，让他看到有必要向伯戈因提供适当的支持。5月18日，在知道豪准备在宾夕法尼亚开展军事行动之后，杰曼回信说，他希望“您所考虑的任何计划都能够按时完成，以便您可以与从加拿大过来的军队协同作战”。但他看起来没有对豪将军施加更大的压力。杰曼的一位政治对手后来曾撰文说，杰曼实际上准备了一个更长的指示，但最终没有发出去。这种可能性看起来微乎其微。杰曼的副手之一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解释说，克里斯托弗·多利（Christopher D'Oyly），杰曼的另一位副手，将伯戈因的要求发给了豪。<sup>53</sup> 即使如此，杰曼个人看起来没有作什么努力来确保豪与伯戈因合作。从现代观点看来，他不愿意施加更大压力的做法有些难以理解。他的政治不安全感可能是他不愿意向豪施加压力的部分原因所在：他不到两年前才升入高级职位，而且，他还没有从这样一种指控中完全脱身——在七年战争中，在德国服役期间，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高级军官。<sup>54</sup> 但杰曼不愿意给豪施加压力，更可能是因为他认识到跨大西洋的沟通很困难。他认为，在距离这么远的情况下，他不需要对战役的具体进行作出精确指示。他相信必须给现场的指挥官们足够的自由度。

豪决心同华盛顿一战，因此他在1777年6月进军到了新泽西，但又

不得不退回来，因为华盛顿很明显不想和他硬碰硬。7月23日，一支由英国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大舰队离开纽约港，沿着海路向费城进发。但英军行进缓慢。而由于豪决定不沿着特拉华河前进，而是走一条通向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更长的路线，行进就变得更为缓慢了。最终，英军在8月25日在马里兰的麋鹿河头（Head of Elk）登陆。华盛顿快速地向南进军，穿过费城，来阻挡英军的前进。他计划在宾夕法尼亚的布兰迪维因小溪（Brandywine Creek）拦截豪的军队，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防御阵地。1777年9月11日，豪采用了去年在长岛所采取的特别成功的战术。德国辅助部队在美军的正面防线的核心地带纠缠美军，同时豪和康华里率领主力部队长途奔袭，包抄华盛顿的右翼。然而，美军没有像在长岛那样被打个措手不及，因为当豪的军队抵达之前，他们有时间做好了准备。英军最后获胜，但大陆军的撤退有条不紊，豪没能将美军一举击溃。

10天后，英军取得了一个更具决定性的胜利，尽管这个胜利的规模要小一些。在没有发生新战斗的情况下，主力部队进行了不断的调动。这之后，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将军率领的轻骑兵在费城西部的保里（Paoli）对美军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夜间突袭。睡梦中的美军几乎没有抵抗，格雷的军队用刺刀杀死了许多美国士兵。被杀死、刺伤的美国人超过了300人，只有100人被当作俘虏抓了起来。尽管豪的正规作战有节制，甚至是过于节制了，但保里之战却是美国革命战争中不那么受节制的那一面的写照。或许它还是英军由于无法扑灭叛乱而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沮丧情绪的一个反应。在豪的军队向费城进发之前，卫队指挥官之一的理查德·菲茨帕特里克（Richard Fitzpatrick）就写道，他的

同僚们“极度沮丧，极度愤怒，觉得结束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整个美国夷为平地并消灭所有居民”。<sup>55</sup> 有必要指出的是，菲茨帕特里克对于在美国发生的战事不满意，因此，可能倾向于通过夸大其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如此，他的话，与其他军官的记述中越来越强烈的强硬派路线是吻合的。<sup>56</sup> 9月26日，在血腥的保里之战之后，豪实现了第二目标：他占领了费城，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优势。他的主要目标——将华盛顿的大陆军彻底击溃——依旧没有实现。

实际上，华盛顿的军队马上就显示出他们依旧是一支能够发动反击的部队。就好像他在重复他在特伦顿取得的胜利一样，10月4日，这位美军将领对驻扎在费城北部的日耳曼城（Germantown）的英军进行了攻击。浓雾让这场战斗难解难分，美军一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邱屋（Chew House）被顽强的英军抵挡住了。最后，豪的军队集结起来，打退了华盛顿的军队。但同样，豪并没有从这场胜利中占到什么便宜。现在，他的军队龟缩在费城之内，周边地区向费城的供给被切断了。通往费城的海路依旧是封闭的，因为河流下游掌握在美军手中。为了打通特拉华河，以便纽约来的供应船只可以抵达费城，10月11日英军试图通过炮轰泥岛（Mud Island）上的米夫林堡（Fort Mifflin）迫使那里的美军屈从。但美军拒绝投降。特拉华东岸的梅塞堡（Fort Mercer）则在10月22日遭到了由冯·多诺普伯爵（Count von Donop）带领的黑森军队的进攻。德国军队因为“极为勇敢和坚定”而受到了美国对手的赞赏，但他们的进攻除了带来了很多的人员伤亡之外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战果。<sup>57</sup> 有接近400名黑森士兵战死或受伤。多诺普伯爵也因受伤不治身亡。直到11月美国人才开始撤退，而那个时候，英国人根本无法感到轻

松，因为北方的坏消息使这一切都失去了光泽。伯戈因在6月份开始军事行动，那个时候豪还在进攻华盛顿部署在新泽西的防御力量。北方军队大约有8500名军官和士兵，大部分都是英国和德国正规军，同时还包括650名忠于英国王室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以及约400名印第安士兵。圣·烈治带领的用于分散美军注意力的军队大约有1600人，包括正规军、保皇派和印第安人。起初，伯戈因进展顺利。他的军队在7月初占领了提康德罗加。之前，美国驻军已经在亚瑟·圣·克莱尔（Arthur St Clair）的指挥下放弃了提康德罗加。之后，英军往南追击圣·克莱尔的军队，并在7月7日在哈巴顿（Habbardton）追上了他的断后部队。双方立即激烈交战，德国军队增援之后英军才占据了上风。但追击圣·克莱尔让英军偏离了原来计划好的南进路线，这导致伯戈因现在必须穿越难以通过的一些地区——这片地区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才能够抵达爱德华堡和哈德逊河谷。伯戈因带领的英军行进得非常缓慢，供应开始出现短缺。7月31日，他们在爱德华堡驻扎。在那里，伯戈因认为有必要派一支分遣队到康涅狄格河谷，为现在已经开始徒步行军的布伦瑞克龙骑兵军团搜集食物和马匹。那支分遣队总共大约有600名德国人、保皇派人士和印第安人。8月16日，这支分遣队在本宁顿（Bennington）惨败给了人数比他们要多得多的新罕布什尔民兵部队。几天之后，为了将美军的注意力从伯戈因军队的行进上吸引开，圣·烈治的小规模部队开始撤退。不过，一个月前在安大略湖岸上的奥斯威戈堡（Fort Oswego）登陆的圣·烈治，由于需要占领莫霍克河谷的史坦威克斯堡（Fort Stanwix）而被耽搁了。当一支美国增援部队赶到史坦威克斯堡的时候，圣·烈治麾下的印第安人决定撤退。由于士兵数量大大减少，圣·烈治认为他必须放弃围攻史坦威克斯堡并返回加拿大。伯戈因现在已经得

不到支持了，不仅得不到圣·烈治的支持，而且更严重的是得不到豪的支持。





图2-5 1777年的一幅描绘英国将军威廉·豪爵士的版画作品。

相反，美军的境况则在稳步改善。8月19日，另一位在大陆军任职的英军前军官霍雷肖·盖茨接过了驻扎在萨拉托加的美军的指挥权，阻止伯戈因的军队前进。他取代了富有但不受欢迎的纽约人菲利普·斯凯勒。和英军这边的盖奇将军一样，斯凯勒被一些下属怀疑对敌人抱有同情心，而且他很容易陷入悲观论调。<sup>58</sup> 盖茨接手的是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他麾下的大陆军得到了大量新英格兰民兵的支援，这些民兵主要是由于看见伯戈因使用印第安士兵而被激发来支援大陆军的。伯戈因的军队士气依旧不错，正如一位低阶军官后来写道的，由于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拿下了提康德罗加，这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不可阻挡的”。<sup>59</sup>9月13至14日，英军渡河来到了哈德逊河西岸，几天之后开始接近美军在比米斯高地（Bemis Heights）的防御工事。盖茨手下的高级将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带领了一支规模很大的美军去拦截英军。9月19日，双方在弗里曼农场（Freeman's Farm）附近的一片林间空地遭遇。双方都坚决果断地投入了战斗。虽然阿诺德的军队最后撤退了，英军占领了这片战场，但要说这是一场英军的胜利是极不恰当的：伯戈因的军队现在已经太虚弱了，已经无法前进了。正如一位英国军官所写到的：“尽管胜利的光荣依旧在我们这一边……真正取得优势的……是另一边的美国人。”<sup>60</sup>

伯戈因依旧认为他随时可以得到支援。被豪将军安排留在纽约的克林顿，确实一直在努力救援受困的北方军队。9月21日，伯戈因了解到克林顿许诺会从纽约市对上游的美军防御力量展开一次进攻。毫无疑问，伯戈因认为这样一种行动会将越来越壮大的盖茨军队吸引走一部分，这样可以减轻他又累又饿的士兵们面临的压力。他甚至还可能认为

原来设想的在奥尔巴尼会师的计划可能还是可以实现。克林顿遵守了自己的诺言。10月3日，他带领3000人（其中一半是纽约市及其外围驻军）沿着哈德逊河往上游进发。两天之后他占领了弗普朗克（Verplanck's Point）。10月6日，他又占领了皮克斯基尔（Peekskill）北边的蒙哥马利堡和克林顿堡。第二天克林顿抵达了宪法堡（Fort Constitution）。他派约翰·沃恩将军带领2000名士兵给位于奥尔巴尼的伯戈因军队运去了补给物资。但10月15日，由于河流领航员拒绝再前进了，沃恩无法继续执行他的任务。沃恩非常沮丧，一把火把伊索普斯（Esopus）给烧了，他极度夸张地将伊索普斯描绘成“一个几乎滋生了这个国家每一个恶棍的温床”。<sup>61</sup> 但有一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这次旨在拯救伯戈因受困于美军的行动已经失败了。

这个时候伯戈因已经到了投降的边缘。10月7日，他对美军进行了最后一次进攻，但由于美军数量比自己多很多，他的进攻被击退了。这场在现在被称作比米斯高地战役的战斗最后使伯戈因确信，他必须放弃进军计划并返回加拿大。但他撤退得太晚了。10月12日，盖茨切断了英军逃跑的路线，伯戈因只好不情愿地与美军进行谈判。美军人数几乎是英军的两倍，因此，盖茨占据了全部的主动。但由于盖茨对克林顿和沃恩沿着哈德逊河往北进军的行动感到担心，因此，这位大陆军将领给伯戈因的条件要比伯戈因自身处境所能得到的优厚得多。两位将军签订的协议规定，伯戈因的军队可以向波士顿进发，并从那里到欧洲去，条件是这支军队不能再介入这场战争。大陆会议没有批准盖茨签订的协议。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大陆会议认识到大部分伯戈因的军队将会重新被部署到英国来执行防卫任务，这样就等于解放了数量相等的英军，而

这些英军又可以被从大西洋对岸运过来，对豪的军队进行增援。这样，伯戈因的士兵——现在双方之间官方文件都称呼他们为“协议士兵”——就成了俘虏。一开始他们被关押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Cambridge），后来又被关押在弗吉尼亚。

对于英国人而言，伯戈因的命运是一种极大的灾难。毫无疑问，这个灾难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伯戈因的过于自信和急躁。他极度低估了美军，而且，在他的一支分遣队在本宁顿失利之后，他本应该认识到他获胜的机会已经不大了。他也对克林顿沿着哈德逊河往上游进军抱有过大的期望。一位更为谨慎的将军应会认识到，他很快就要陷入很大的危险之中。伯戈因在已经太迟的时候才试图转身。

豪或许应该为这场灾难承担更大的责任。他清楚地知道英国在1777年战役中的战略就是要他与伯戈因配合。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的朋友多利已经将伯戈因的要求寄交给了豪。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而原谅豪：他身边没有人建议他应该将他自己的军事行动同从加拿大往南进发的伯戈因的军事行动结合起来。1777年年初在英格兰休假的克林顿了解到了政府的战略，曾强烈要求豪必须为北方军提供支援。然而豪却被华盛顿和费城迷惑住了。原来计划的对叛军毕其功于一役的一场战役后来变成了两场战役，而这两场战役之间的协调还是零零碎碎的。

对于这种缺乏协作的局面，杰曼负主要责任。考虑到跨大西洋的沟通是很慢的，他不愿意对现场的指挥官们过多进行微观干涉看起来是合理的，但他毫无疑问应该花更大的力气促使豪遵守既定的战略。而实际上，杰曼基本上让豪完全自作主张。让人注意的是，杰曼的心腹密友、时任爱尔兰总司令的约翰·欧文爵士（Sir John Irwine），在秋天还对豪

的意图完全不知情。他在9月29日在伦敦写道：“没有收到威廉·豪爵士的任何消息……到底他往北走了，还是到费城去了，众说纷纭……大西洋此岸没有人知道。”<sup>62</sup>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月之后，在10月28日，在萨拉托加战败的消息抵达英格兰之前，诺斯勋爵依旧“在随时等候”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威廉·豪爵士的“好消息”，他似乎看起来完全忘记了伯戈因。<sup>63</sup>

伯戈因战败的消息在10月20日传到了豪那里。这个时候，毫无疑问很清楚自己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豪在两天后辞职了。英军占领之下的费城的气氛很自然非常阴郁。海军上将豪的秘书安布罗斯·瑟尔（Ambrose Serle）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些本地军官有一种倾向……将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瑟尔伤心地写道：“所有的一切都有蒙上了阴郁的色调。”<sup>64</sup>不久之后，一位在费城英军中服役的英国军医对整个战役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英国政府（他轻蔑地将政府大臣们称作“那些内阁将军们”）认为让伯戈因和豪在哈德逊河谷会师是一个好主意？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认为，毫无疑问，派到大西洋对岸去的、最后由伯戈因带领的那支军队，如果部署在纽约作为豪军队的增援力量，是否会更好一些？<sup>65</sup>

如果说英国人情绪低落的话，美国人则因为胜利而欣喜异常。一支正规的野战部队被迫向一支叛军投降，而英国军官和士兵上下都轻蔑地认为这支叛军是训练无素的、没有经验的、业余的队伍。结果，英国正规军丧失了引起叛军分子恐惧的能力——一个重要的心理障碍被克服了。“高傲的英国人整装走出来，并向一支刚建立不久且被他们蔑称为胆小鬼的军队缴械投降。”一位目睹了伯戈因失利的美国士兵这样写

道：“这真是一个辉煌的时刻。”<sup>66</sup>

这一结果对法国政府的影响也很重要。萨拉托加战役不是法国干预的原因所在。路易十六的大臣们已经决定要进行干预了，只是他们希望在正式参战之前做好战争准备而已。萨拉托加战役则加速了这一进程。1777年12月，伯戈因投降的消息一抵达巴黎，法国政府就向美国代表承诺会承认美利坚合众国。至关重要的是，路易十六的大臣们也许诺会与美国人结盟。在知道伯戈因的悲惨遭遇之后，诺斯勋爵和他的同僚们立即着手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法美结盟。他们派人接触在法国的美国代表，看看他们是否愿意谈判达成协议。他们甚至还派出了代表去试探是否可以从欧洲帝国之间的团结这个角度来说服法国人。<sup>67</sup>但美国人不愿意放弃独立——这是乔治三世愿意与美国人谈判的前提条件——而法国政府则认定（虽然路易十六还是有一些犹豫的），支持殖民地叛军所带来的削弱英国强权的机会，超出了这种做法所带来的风险。最后，法国和美国之间在1778年2月签署了条约。诺斯勋爵及其大臣们完全清楚，这场“美国叛乱”将演变为一场范围更大、更为棘手的冲突。

### 【注释】

1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Loudoun Papers, LO 6483, James Abercrombie to Lord Loudoun, 4 May 1775.

2 See the account sent to their ‘Friends and Fellow-Subjects’ in Britain by the Massachusetts Provincial Congress, 26 April 1775, in Merrill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 1776* (London, 1969), pp. 828–9. See also Troy Bickham, *Making Headline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Seen Through the British Press* (DeKalb, IL, 2009), pp. 71–2.

3 Centre for Kentish Studies, Maidstone, Amherst Papers, U 1350O80/13, James Abercrombie to Lord Amherst, 20 June 1775.

4 City Archives, Sheffield, Spencer Stanhope of Cannon Hall Muniments, 60542/8, Francis Bushill Sill to John Spencer, 6 July 1775.

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 Kew,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2, fo. 187.

6 J.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39 vols, Washington, DC, 1931–44), iii. pp. 450–1.

7 Ballindalloch Castle, Grantown on Spey, Macpherson Grant Papers, Letter-book, Grant to Edward Harvey, 10 August 1775.

8 See, for exampl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Ann Arbor, MI, Clinton Papers, James Robertson to Clinton, 13 January 1776. Robertson went on to be an advocate of much milder methods; that even he should recommend threatening to ‘set free’ the slaves and ‘let loose’ the Indians is a sign of his desperation.

9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841.

10 Ibid., pp. 850–1.

11 For Barrington, see Shute Barringt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William Wildman, Viscount Barrington* (London, 1814). See also the views of

the adjutant-general,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3/5, p. 37, and of a captain in the Boston garrison, Stephen Rumbold Lushington (ed.), *The Life and Services of General Lord Harris GCB, during his Campaigns in America, the West Indies, and India* (London, 1840), pp. 58–9.

12 K. G.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0–1783: Colonial Office Series* (21 vols, Shannon, 1972–81), xi. p. 97.

13 British Library (BL), London, Martin Papers, Add. MS 41,361, fo.289, Josiah Martin to Samuel Martin, 9 September 1775.

14 Longleat House, Wiltshire, Thynne Papers, Bath MSS,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E5B1, parcel N-Y, Rochford to Viscount Weymouth, 28 November 1775.

15 Staffordshire Record Office, Stafford, Dartmouth MSS, D(W) 1778/II /1523.

16 the debate within the French government is described in Jonathan R. Dull,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1985), Chapter 7.

17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Miscellaneous MSS (unbound), Montgomery to Perkins Magra, 2 July 1775.

18 See, for example, ‘Journal of Ensign Nathaniel Morgan’, *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vii (1899), p. 105; Richard B. Morris (ed.), *John Jay: 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 (New York, 1975), p. 181.



19 See, for example, ‘The Journal of William Humphrey’, in Nathaniel N. Shipton and David Swain (eds), *Rhode Islanders Record of the Revolution* (Providence, 1984), p. 41.

20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864.

21 ‘Lee Papers’,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v (1872), p. 18.

22 See John Shy,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6), Chapter 6. For a recent reappraisal of the role of the militia, see Matthew C. Ward, ‘The American Militias: “The Garnish of a Table”?’, in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ster (eds), *War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75–1815* (Cambridge, 2010), pp. 159–75.

23 R.A. Bowler, *Logistic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British Army in North America* (Princeton, 1975), Chapters 3–4.

24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Northern Ireland, Belfast, Hart Papers, D 3077/B/1/2, George Vaughan Hart to his father, 7 July 1776.

25 ‘Lee Papers’,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v (1872), p. 93.

26 BL, Haldimand Papers, Add. MS 21,680, fo. 122, Francis Hutcheson to Frederick Haldimand, 10 July 1776.

27 TNA, Loyalist Claims Commission, Audit Office Papers, AO 12/5,

fo. 35.

28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878.

29 See, for example, 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ix (2002), pp. 39–64; Norman A. Graebner, Richard Dean Burns and Joseph M. Siracusa,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From Confederation to Constitution, 1776–1787* (Santa Barbara, CA, 2011), Chapter 1.

30 University Library, Nottingham, Mellish of Hodsock MSS, Me 171-110/4, Clinton to Charles Mellish, 25 September 1776.

31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Howe to Clinton, 12 April 1776.

32 Leonard W. Labaree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38 vols to date, New Haven, 1959–), xxii. p. 575.

33 Somerset Record Office, Taunton, Strachey MSS, DD/SH, C.1165, box 34, draft of Strachey to — [26 August 1776].

34 Labaree et al (eds) *Franklin Papers*, xxii. pp. 604–5. For Adams's view, see Robert J. Taylor et al. (eds), *Papers of John Adams* (16 vols to date, Cambridge, MA, 1977– ), v. p. 20.

35 Huntington Library, HM 615, Order-book of General Howe's army, After Orders, 13 September 1776.

36 See Ira D. Gruber, *The How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2), especially p. 363.

37 Huntington Library, HM 39953, Israel Putnam's Orders, 14 December 1776.

38 Public Library, Boston, MA, Stanley Letters, MS Am. 228.4, Thomas Stanley to —, 23 December 1776.

39 W.E. Harcourt (ed.), *The Harcourt Papers* (14 vols, Oxford, 1880–1905), xi. p. 180, William Harcourt to Viscount Nuneham, 19 December 1776.

40 G.H. Ryden (ed.), *Letters to and from Caesar Rodney* (Philadelphia, 1933), p. 152.

41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New York City, Order-book of the 17th Foot.

42 National Army Museum, Chelsea, Maitland Papers, 7902-12-47, Alexander Maitland to his father, 21 December 1776.

43 See David Hackett Fischer, *Washington's Crossing* (New York, 2004), for a vivid account of Washington's counterattack.

44 Fitzpatrick (ed.), *Writings of Washington*, vi. p. 398.

45 Centre for Kentish Studies, Amherst Papers, U 1350 O79/14, Robertson to Amherst, 7 January 1777.

46 Huntington Library, Loudoun Papers, LO 6556, David Cuninghame to Lord Loudoun, 2 May 1777.

47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 Edinburgh, Gilchrist of Ospisdale Muniments, GD 153, box 1, bundle 4, William Sutherland to Dugald Gilchrist, 30 May 1777.

48 Ballindalloch Castle, Macpherson Grant Papers, bundle 2, Letter-book, Grant to —, 15 January 1777.

49 Bedfordshire Record Office, Bedford, Lucas of Wrest Park Collection, Robinson Papers, L 29/214, memo. 13 January 1777.

50 See, for example, ‘Bamford’s Diary: The Revolutionary Diary of a British Officer’, *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xxvii (1932), p. 312.

51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xii. pp. 265, 268.

52 Ibid., xiv. p. 66.

53 Edward Barrington de Fonblanqu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pisode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rived from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Right Hon. John Burgoyne, General, Statesman, Dramatist* (London, 1876), pp. 232–3. For Knox on D’Oyly, see ‘Knox MSS’ i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Report on Manuscripts in Various Collections* (8 vols., London, 1901–13), vi. p. 277.

54 On this episode, see Piers Mackesy, *The Coward of Minden: The Affair of Lord George Sackville* (London, 1979).

55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Richard Fitzpatrick Papers, Fitzpatrick to his brother, 5 July 1777.

56 For conciliatory and hardline attitudes in the British military, see Stephen Conway, 'To Subdue America: British Army Officers and the Conduc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liii (1986), pp. 381–407.

57 Jeanette D. Black and William Greene Roelker (eds), *A Rhode Island Chaplain in the Revolution* (Port Washington, NY, 1972), p. 53.

58 For an instance of Schuyler's negativity, see 'The Heath Paper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7th series, iv (1904), p. 135, Schuyler to William Heath, 28 July 1777.

59 S. Sydney Bradford (ed.), 'Lord Francis Napier's Journal', *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lvii (1962), pp. 324–5.

60 Sydney Jackman (ed.), *With Burgoyne from Quebec* (Toronto, 1963), p. 175.

61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Vaughan to [Clinton], 26 October 1777.

62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Dublin, Shannon Papers, MS 13,301.

63 Huntington Library, HM 25800, North to Lord Howe, 28 October 1777.

64 Edward H. Tatum (e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mbrose Serle* (San Marino, CA, 1940), p. 263.

65 Huntington Library, HM 20932, John Mervin Nooth to Henry Nooth, 22 May 1778.

66 'Journal of Oliver Boardman', *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vii (1899), p. 235.

67 See BL, Auckland Papers, Add. MS 34,420, fo. 352, for the subsequent recollection of William Knox, who claimed to have suggested the approach to the french.

## 第三章 世界之战

在法美条约签订之前的很久，英国的大臣们就在为与法国和西班牙开战做着一定准备。在规模上，这场战争比与反叛的殖民地之间的战争要大得多。英国和波旁王朝及西班牙和法国在每一个帝国竞争地域，包括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有可能发生冲突。英国在地中海的据点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可能会被攻击，本土诸岛也可能会遭到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甚至考虑过彻底从殖民地退出，并将力量集中在与波旁王朝的对抗上。这样的行动可能会让国内团结起来。议会反对党和他们在国内的支持者，从一开始就对在北美发生的冲突不满。结束在叛乱殖民地的战争，可能会降低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但实际他们并没有放弃在美国开战，诺斯勋爵及其同僚觉得对保皇派有一种持续的义务。英国大臣们习惯性地夸大了在美国的“政府的朋友”于帮助英军上的意愿和力度。不过，他们对保皇派抱有这种希望并不是没有根据的。1778年保皇派一度复兴，因为有不少美国人发现很难和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联合在一起。对于信奉新教和共和理论的美国人来说，信奉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法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盟友。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伦敦的大臣们认为，如果英国无法至少做到保住南方大陆，以便为西印度群岛供应食品和其他关键物资的话，那么，西印度群岛的糖业就会崩溃。<sup>1</sup> 然而，现在在于美国的战争，即将成为一个范围更大、更为复杂的斗争的一部分，而对于诺斯勋爵内阁而言，美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这场新全球冲

突中最为重要的战场。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大臣们很自然地开始寻找新朋友。2月，英国政府第二次接触俄罗斯的凯瑟琳大帝。然而，只有在诺斯勋爵及其同僚承诺一旦俄罗斯和土耳其发生战争英国会向其提供军事帮助的情况下，凯瑟琳大帝才有兴趣与英国结盟。很自然地，伦敦的大臣们害怕被拖入另一场冲突之中。<sup>2</sup>于是，他们转向了普鲁士。普鲁士是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主要盟友。英—普轴心重新确立，这在1778年4月显得尤为有可能，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正因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争议走向战争的边缘。腓特烈大帝认为，与奥地利的冲突很容易就会升级为一场与法国之间的新战争。法国自从1756年以来一直都是奥地利的盟友，如果法国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对付普鲁士，那么，腓特烈大帝会寻求与他的英国朋友重叙旧好吗？或许是渴望重返上一次战争中的那种简单关系，英国媒体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了腓特烈大帝身上，似乎要重新点燃公众对这位普鲁士国王的热情。<sup>3</sup>但对于腓特烈大帝自己而言，当法国很清楚不会为了支持奥地利而卷入中欧战争的时候，与英国结盟的吸引力马上就消失殆尽了。这样一来，英国政府就只能在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支持的情况下为一场范围更大的冲突做好准备了，本来它还指望这些欧洲盟友可以迫使法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保卫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利益之上的。





图3-1 亨利·克林顿爵士当年的一幅画像。在豪将军回到国内之后，他接过了北美英军的指挥权。

英国大臣们认为，如果说不打算放弃美国的话，他们也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这场战争了。1778年3月初，杰曼命令接替豪担任总司令的克林顿，从英军在纽约和新斯科舍的英军据点，在北美开展一场以海战为主的战斗。克林顿还被命令从费城撤出，并组织力量在南方开展一场战役。<sup>4</sup>3月21日，当法美结盟确认之后，杰曼发出了新的指令，强调在西印度群岛对法国作战，并增强佛罗里达的驻军力量，因为佛罗里达很可能马上就会遭到西班牙的进攻。<sup>5</sup>向加勒比地区进军的逻辑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几乎和七年战争中一样确定。英国政府认为，法属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蔗糖给法国提供了支撑着其战争机器的收入。如果这些法国岛屿上运出去的蔗糖可以减少甚至被阻断的话，法国的战争资金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法国政府就被迫要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杰曼对于克林顿应该安排其余军队做什么说得很清楚：放弃费城，将兵力集中在纽约。为了分化法美新联盟，卡莱尔伯爵带领一个和平谈判代表团，试图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这场全球战争下美国部分的战事。

在任命和平谈判代表的同时，议会同意放弃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而征税是双方争执的起因所在。诺斯勋爵及其同僚依旧希望保住议会管理贸易的权利，他们依旧认为这种权利对于英国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sup>6</sup>然而，卡莱尔伯爵不久就发现，与大陆会议进行谈判是不可能的。他带来的条款，或许在1775年会令美国人满意，但到了1778年情况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时，就无法令美国人满意了。许多大陆会议议员们在战争开始之前还对英国抱有的那种持续的好感，在三年的战争之后基

本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已经流了太多的血，毁坏了太多的财产。正如一位弗吉尼亚绅士所说：“木已成舟，时局已定，要再与大不列颠和解并回到英国政府的怀抱已绝无可能了。”<sup>7</sup> 而且，现在美国人已经获得了新盟友法国的帮助，根本没有必要妥协了。现在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其他东西，只会接受英军从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上完全撤离，并且英国要承认它已经完全独立了。由于作为和谈代表的卡莱尔伯爵并没有获得同意此种条件的任何授权，所以他根本没有被接见。大陆会议通过报纸将自己不接待任何和谈代表的立场公之于众。<sup>8</sup>

与此同时，克林顿决定，向加勒比和佛罗里达分兵的计划要推迟到他带领军队撤离费城并安全抵达纽约之后再执行。1778年6月，英军开始撤离费城，随行的还有大约3000名保皇派人士，他们不愿意继续待在费城。考虑到希望跟随英军撤离的保皇派人士的数量庞大，克林顿认为，通过海上撤离是不可能的。而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难民加上行李在陆地上行进，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仅是抵达离费城35英里的阿伦镇（Allentown）就花了整整6天的时间。华盛顿的军队在整个冬天都驻扎在宾夕法尼亚的福吉谷（Valley Forge）休整，当克林顿的军队穿越新泽西的时候他们开始了追击。刚刚通过交换而重新回到大陆军的查尔斯·李将军，不那么愿意袭击克林顿带着撤退的部队，但华盛顿感觉这是一个攻击暴露出来的敌人的好机会。6月28日，在热浪之中，李带领美军的先锋部队在蒙莫斯法院（Monmouth Court House）附近与康华里带领的英军后防部队短兵相接。由于担心英军的主力部队会掉头来增援康华里，李没有继续进攻，而是决定撤退。华盛顿当时正带领其余的美军在前进，他接过指挥权，令军队做好对抗英军反击的准备。在两

军分开之前，他成功打退了英军的几次进攻。双方都宣称获得了胜利。美国人认为自己获胜了，是因为他们打退了英军的反扑；而英国人认为自己获胜了，则是因为在他们比较虚弱的时候华盛顿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很大的伤亡。6月29日，克林顿的军队继续缓慢前进，在7月1日抵达了桑迪胡克，并于5天后抵达了纽约。

尽管克林顿自己事先并不知道他来得正是时候。7月11日，法国干预的严峻性，在以下这个事实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国海军上将埃斯坦伯爵率领16艘军舰抵达了纽约附近的海域。他的目标是直接将英军彻底击溃，并快速地终结这场战争。<sup>9</sup> 法国人曾经劝说西班牙人作为他们的盟友一起携手作战。毕竟，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一样，有很好的理由希望重新获得在七年战争中丧失的土地和荣誉。如果西班牙舰队和法国舰队合在一起的话，波旁王朝的战舰数量就超过了英国。但西班牙政府或许是因为担心如果帮助反叛的美国会给它自己在美洲的殖民地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所以在那个时候拒绝卷入这场战争。马德里的大臣们更倾向于等等看，看到底哪一方给他们的条件最佳。由于未能说服西班牙也来助阵，法国人要是在1778年春天决定再等一等也是合理的。在西班牙人不助阵的情况下，法国人取得成功的机会就大打折扣了，因为他们当时只有52艘大型军舰，而英国则有66艘。然而，法国政府却选择了大胆地行动。

埃斯坦伯爵是在4月份率领法国地中海舰队从土伦港（Toulon）出征的。英国海军上将和海军大臣桑威奇伯爵认为埃斯坦伯爵的目的是与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汇合，然后再进入英吉利海峡。桑威奇伯爵对于皇家海军的首要职责是保卫国家免遭侵略这一点尤为在意，因此，在他确

信埃斯坦伯爵是在穿越大西洋而不是与布雷斯特舰队汇合之前，不愿意给海军上将豪派增援部队。<sup>10</sup> 即使是那个时候，桑威奇伯爵也正确地认识到，英国的海军力量应集中在国内水域，而不是散布在全球各地。法国军队在布列塔尼（Brittany）和诺曼底大规模集结，似乎要准备入侵英国。1778年7月13日，埃斯坦伯爵抵达北美两天后，布雷斯特舰队在海军上将德奥维利埃（d'Orvilliers）的率领下来到了怀特岛（Isle of Wight）海域。之后，法国舰队顺着英吉利海峡南下，去追击英国海军上将凯佩尔（Keppel）指挥的英国西部舰队。7月27日，两支舰队在阿申特岛（Ushant）海域交战。这场战斗难分胜负，但法国舰队的表现足够好，动摇了英国人对自己海上优势的信心。根据一位海军军官的说法，“大家一致认为，在组成各种不同的战斗队形方面，没有哪支舰队能同法国舰队相比”。<sup>11</sup>

埃斯坦伯爵带领的法国舰队出现在纽约海域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场战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那之前，在北美作战的英国军队没有必要真正地去担心自己背后的大西洋。虽然美国的武装民船偶尔也取得一点成功，但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漫长的供应线基本还是安全的。英国皇家海军掌控着海上霸权，可以将英国军队运送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而法国人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切。这条跨大西洋的供应线变得脆弱起来。克林顿在1778年11月抱怨说，自从他接过指挥权以来，他的军队至少发生了4次“在三个星期内忍饥挨饿”的情况。<sup>12</sup> 由于担心补给跟不上，这毫无疑问妨碍了克林顿开展大规模的攻势。更为严重的是，被孤立起来的海岸线上的英军据点现在要遭受美军从陆地上和法军从海上开展的联合进攻。埃斯坦伯爵在7月中并没能在纽约成功地将英军一

举击溃，但在那个月月末，他的舰队驶入了纳拉甘西特湾（Narragansett Bay），对驻扎在罗得岛纽波特的英军构成了威胁。

在纽约，华盛顿根本没有能力向埃斯坦伯爵提供支援。但在罗得岛，情况就不同了。8月初，美军在约翰·苏利文（John Sullivan）的指挥下在纽波特附近登陆。苏利文不久就集结了大约1 万名大陆军士兵和民兵。当法美准备联合发动进攻的时候，海军上将豪带着刚从英国抵达的增援舰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罗得岛海域。埃斯坦伯爵出发去拦截英国舰队，但苏利文决定不等法国舰队掉头回来，而要在没有法国海军支援的情况下继续进攻。美国人对英国守军的进攻被打退了，由于遭受了挫败，民兵开始溃散。埃斯坦伯爵的舰队中有几艘战舰在与豪的舰队交战的时候受了伤，因此他不愿意再停留在罗得岛海域，而是往波士顿驶去。当美国人开始撤退的时候，英国驻军集结力量开始追击，但由于美军抵抗坚决，只好重新撤回来。不过苏利文可没有什么理由值得庆贺，将英军包围在纽波特并迫使他们投降的目标没有实现。许多美国人从本能上来说就觉得与他们之前的敌人合作心理上不舒服，于是立即着手指责他们的新盟友：“法国先生抛弃了……正处在困境中的我们。”在提及埃斯坦离开罗得岛去波士顿这个事情时，一位新英格兰人如此尖刻地说道。<sup>13</sup>

在了解到纽波特驻军的危险处境之后，克林顿立即开展了一次救援行动。9月1日，他从纽约带来的4000 名士兵抵达了罗得岛外围。由于太晚了，不大可能追上苏利文了，于是克林顿决定扫荡新英格兰海岸线，甚至还计划在波士顿攻击法国舰队。克林顿知道不久就要分派很大一部分兵力去西印度群岛和佛罗里达，因此，他很想充分利用接下来的

几个星期展开战斗。海军上将豪推翻了他的波士顿作战计划，这样，克林顿只好集中精力去吸引华盛顿的军队与他决一死战。但有英军进入新泽西还不足以让华盛顿愿意出来交战。印第安人和保皇派士兵对反叛各州边境地区的不断骚扰，给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一直到第二年，华盛顿才愿意分派一些士兵来抵御这种骚扰。而克林顿于11月被迫将他麾下的许多军队派往加勒比和佛罗里达之前也没有取得多大战果。而他在海岸线上进行的那些破坏性的扫荡行动反而让美国人更加增长了敌对情绪。尽管克林顿抱怨说他的军队实际上被分解了，失去这么多士兵，“很难在未来有什么大力作战的能力了”，<sup>14</sup>但他还是服从了杰曼之前提出的要求，将战争的焦点放到了南方去。他决定派3000名士兵，由阿奇博尔德·坎贝尔中校带领，去夺取佐治亚。坎贝尔在1778年12月末抵达了泰碧岛（Tybee Island），离萨瓦纳（Savannah）仅有15英里。那里的美军在象征性地抵抗一阵之后就从萨瓦纳撤离了，这样英军就在那一年的最后几天占领了萨瓦纳。

这个时候，英军和法军的第一次冲突已经在加勒比地区发生了。法国人主动出击，在1778年9月进攻了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岛在七年战争结束之前一直都是法国的。它的防御很薄弱，马上就陷落了。从克林顿麾下分出来的士兵在12月抵达了西印度群岛，并立即开始在圣卢西亚（St. Lucia）登陆，这是杰曼在春天确定的目标。此时，埃斯坦伯爵已经在马丁尼克（Martinique）的罗约尔堡（Fort Royal）海军基地了。几天之后，他派了一支很强大的法军开赴圣卢西亚。12月18日，法军试图将入侵的英军击退。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英军展现了在美国战争中取得的长足进步。英国轻步兵持续不断地向法国的先锋部队开火，根据一

位参与作战的英军士兵的说法，参与进攻的法国士兵一下子就“被打蒙”了。<sup>15</sup> 法军三次试图抢占英军的防御阵地，但每次都被打退了，伤亡惨重。此战，法军总共有1500名士兵阵亡或受伤，这相当于他们战力的30%。按照一位研究这场战争的著名历史学家的说法，法军在那一天的失败可以称作是“加勒比地区的邦克山战役”。<sup>16</sup>12月29日，法军从海上撤退，30日，多米尼加总督正式向英军指挥官詹姆斯·格兰特将军投降。

如果说英国和法国在1778年的西印度群岛战争中互有胜负的话，那么，英军在那一年蔓延到印度的战争的第一回合中则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身兼军事和领土强权，以及贸易实体多重身份——已经开始与印度诸王联合在一起组成的马拉地帝国

（Maratha confederacy，1674~1818）战斗了。东印度公司投入了该公司的孟买军队，最后还投入了孟加拉主力军队的大部分兵力。那场战斗一直持续到1782年5月。不过，东印度公司虽然要进行这种重大的战斗，但看起来它也似乎很愿意同时与法国人展开另一场战争。东印度公司的军队迅速占领了法国的贸易据点，这些据点中的大部分防御都非常薄弱。防御最强大的据点本地治里（Pondicherry），则只能通过围城的方式来解决。让围困它的英军指挥官由衷佩服的是，这个据点居然一直坚持了77天之久。<sup>17</sup>但到了1778年10月末，法国在印度只剩下位于马力巴（Malibar）海岸线上的马埃岛（Mahé）这一个据点了。



如果说在这场更大范围的战争的第一阶段，英国获得了比预期更为有利的形势的话，那么1779年对于英国而言则是困难得多的一年。西班牙



牙在4月与法国签署了一份友好条约，而且，两个月之后加入了战争。西班牙在支持美国叛军上的疑虑一直还在，因此它不可能与美利坚合众国结成联盟。但是西班牙的介入，使得英国在北美取胜的希望比当初法国开始介入的时候变得更为渺茫了。或许，英国政府拒绝通过放弃直布罗陀或者米诺卡来让西班牙保持中立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法国人更愿意妥协。虽然韦尔热讷伯爵抱怨说“西班牙的眼光和野心很大”，但他却答应了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帮助西班牙夺取直布罗陀、米诺卡和西班牙在美洲失去的土地。<sup>18</sup>

在北美，1779年1月，坎贝尔中校率领的军队巩固了他们对佐治亚的控制。“我把美国叛乱旗帜上的一块条纹和一颗星星给拿掉了。”坎贝尔这样不无道理地夸口说。<sup>19</sup>3月，该地恢复了平民政府，奥古斯丁·普雷沃斯特准将从东佛罗里达过来与坎贝尔会师之后，接过了佐治亚那支小规模英军的指挥权。他认为，除非异见分子无法从邻近的南卡罗来纳得到支持，否则新成立的皇家政府不可能稳固地存续下去。因此，在普雷沃斯特看来，对南卡罗来纳进行进攻是必需的。他此前已经派一支分遣队到了博福特（Beaufort），但2月3日这支军队被要求撤回来。3月，普雷沃斯特进入南卡罗来纳，并在布莱尔小溪（Briar Creek）击败了美军。当地美军指挥官本杰明·林肯并没有因为普雷沃斯特的胜利而退缩，他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因此他在4月末进入佐治亚，而普雷沃斯特也没有退缩，而是继续进军。看起来每一方都试图压制对方，让对方放弃进攻，转而对自己的领地进行防御。普雷沃斯特抵达了查尔斯顿，而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州长约翰·拉特里奇则准备投降，条件是在这场战争的剩下时间中南卡罗来纳能够被宣布为中立州。但普雷沃斯

特要求其无条件投降。最后，这位英国将军没有见好就收，反而等来了对自己不利的局面：林肯往北向查尔斯顿进军的消息迫使普雷沃斯特在5月12日取消了围城行动。

同月，克林顿派了一支部队到弗吉尼亚去，为普雷沃斯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英军摧毁了他们看到的任何商店和船只，希望这样可以阻止弗吉尼亚为林肯的南方军提供补给。他们或许还希望能够困住当地军事力量，阻止他们向南进军去对抗普雷沃斯特。但是当地的抵抗非常有限，这让英国士兵们认为当地的老百姓对英军的存在是欢迎的。<sup>20</sup> 指挥海军力量为陆军行动提供支援的乔治·科利尔爵士（Sir George Collier），甚至考虑停下来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但陆军指挥官爱德华·马修（Edward Mathew）少将则坚持遵守克林顿的指令，在破坏工作做完之后立即离开了。5月24日，这支英军回到了纽约。这一次出征行动表明，即使是法国已经介入了，皇家海军还是可以为英国陆军提供很大的机动性。但是，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了这一点，在法国海军从西印度群岛北上为在佐治亚的美军提供支援的时候马上就被凸显出来了。

普雷沃斯特费了不少力气让自己的军队从查尔斯顿的外围撤离。6月，他的军队在斯多诺渡口（Stono Ferry）击退了林肯军队发动的一次进攻。为了防止英军对南卡罗来纳发动新的进攻，美国人请求法国人帮助。埃斯坦伯爵在9月1日抵达了佐治亚海域。他派了5000名法国士兵登陆，来帮助林肯占领萨瓦纳，但糟糕的天气减缓了联军围城准备工作的速度，让英国驻军有时间增强他们的防御工事。普雷沃斯特拒绝投降，埃斯坦伯爵的围城大炮开始对这个小镇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轰炸。法

国工程兵认为，英国工事非常坚固，因此必须长时间围城作战。但是埃斯坦伯爵考虑到海军士兵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以及恶劣的天气给战舰带来的损害，认为必须派陆军对萨瓦纳进行强攻。他的军官们警告他说，这样一种进攻的代价是很高昂的，但埃斯坦伯爵不听。在这场不成功的攻城战中，大约有900名法国和美国士兵战死或受伤，而普雷沃斯特方只有54名士兵战死。10月18日，法美联军取消了围城战。<sup>21</sup>

1778年8月，在纽波特，法军和美军没有将他们联盟的威力发挥出来。现在，在萨瓦纳，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他们再一次未能给一支暴露在他们的攻击之下的英国驻军造成致命打击。纽波特战役之后，海军上将詹姆斯·甘比（James Gambier）曾写道：“美国人和法国人相互之间都看不起，相互之间都充满敌意。”<sup>22</sup>但在萨瓦纳之战后，克林顿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幸灾乐祸的，因为他太清楚这一点了：法国人和美国人迟早能够进行更有效的协作。他对法国海军和美国陆军之间的协同作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萨瓦纳保住了，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同样也值得反思。不久之后，克林顿命令纽波特的驻军回到纽约。

1779年，北方的战事没有按照克林顿的计划发展。他一次又一次试图迫使华盛顿与他开展一场阵地战，但这种企图一次又一次地落了空。华盛顿派了一部分大陆军去进攻在1778年骚扰殖民地边境的原住民。带领这支美军的苏利文在8月和9月进行了严厉的报复行为。首先是将印第安人一直驱赶到英军在尼亚加拉的据点那里去，之后又毁坏了他们在莫霍克河谷的土地。但华盛顿不愿意把他的主力部队从新泽西带出来与克林顿率领的英军主力交战。从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进发的一支英军在6月占领了位于今天缅因州的佩诺布斯科特（Penobscot），英军这么做

的目的至少部分是想牵制大陆军主力部队的一部分力量。但此地太偏僻了，华盛顿根本不以为意。他在7月份安排了马萨诸塞的军队来驱逐英军，但失败了。

华盛顿甚至在英军更接近他的基地之时也拒绝被英军牵着鼻子走。6月，当佩诺布斯科特陷落到了英军手中的时候，克林顿一直沿着哈德逊河往上游进军，威胁到了华盛顿与新英格兰之间的联络。克林顿的意图是以这种方式将这位美国将军从新泽西引诱出来，但没能将他的对手从其防御基地中诱出。之后，他派了一支军队去扫荡康涅狄格的海岸线地区，希望以此来激将华盛顿出兵。纽黑文、费尔菲尔德（Fairfield）和诺沃克（Norwalk）都相继被英军付之一炬。然而，这位美国将军并没有如克林顿所期望的那样向新英格兰进发，反而带领军队开始攻击克林顿不久之前刚夺取的位于哈德逊河边上的军事堡垒。克林顿将部队从康涅狄格召回来并往北进发去与华盛顿交锋之时，叛军却又撤退了。美国这只军鼠，依旧躲着英国这只军猫。<sup>23</sup>

由于无法迫使华盛顿与他发生正面的阵地战，克林顿变得越来越沮丧。8月份他提出要辞职返回国内，英国政府拒绝了，但这么决定或许是错误的。克林顿对于自己必须以比他前任更少的军队来勉力支撑目前局面已经很不满意了，而且，他对于可能被法美联军击败很是焦虑，这使得他已经不再是一位最理想的指挥官了。<sup>24</sup> 当他知道在佛罗里达的英军（他在1778年从他的主力部队中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巩固佛罗里达的防御）过于脆弱，根本无法抵挡西班牙的进攻时，他的心情肯定无法好起来。重新夺回佛罗里达是西班牙政府的优先目标。而且，一得到西班牙参战的消息，路易斯安那的总督伯纳多·德·加尔韦斯，在得到来自古巴

的西班牙军队的增援之后，就对西佛罗里达英军基地展开了快速进攻。9月，加尔韦斯通过突袭的方式占领了在曼查克（Manchac）、巴吞鲁日（Baton Rouge）和纳切兹（Natchez）的英军据点。<sup>25</sup>

在加勒比地区，法军在西班牙参战之前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一直坚守圣卢西亚的格兰特不大愿意将兵力分派出去，这意味着大部分防守薄弱的英国岛屿很容易遭受攻击。圣文森特（St Vincent）在6月陷入了法国人之手，格林纳达则是在7月陷入法国人之手。对英国人而言，西班牙的介入使得情况变得明显恶化了。英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岛屿牙买加进一步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了。8月，牙买加“每天在等待”突袭的到来。<sup>26</sup> 总督约翰·达林不愿意对着波旁军队的进攻坐以待毙。他决定主动出击。早在5月末的时候，他就恳求杰曼允许他进攻并吞并海地岛。<sup>27</sup> 9月，他派了一支军队对伯利兹（Belize）的英国居民提供支援，并夺取了巴卡拉尔（Bacalar）的西班牙基地。但在牙买加军队抵达之前，西班牙人已经在9月15日占领了在圣乔治礁（St George's Cay）的英军基地。于是牙买加军队转而去进攻西班牙军事堡垒奥莫阿（Omoa），这个地方属于现在的洪都拉斯。在当地英国居民和土著居民的帮助下，奥莫阿在10月20日被攻陷。但这支新到来的英国军队在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得不放弃这个据点返回了牙买加，因为士兵们生病了，这使得他们无法继续驻守在那里。

西属中美洲并不是唯一一个新的战场，战争甚至延续到了西非。在那里，各个欧洲强权均建立了武装据点，它们在这些据点购买奴隶并把奴隶贩运到加勒比和美洲的种植园去。1779年1月，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了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斯。第二个月，英军在詹姆斯岛的基地也被迫投

降。往南，一艘法国军舰在5月进攻了位于黄金海岸的瑟康迪（Secondi）的英军基地，给这个基地造成了重创。当年晚些时候，英军占领了位于戈里（Gorée）的一个已经被法军放弃的军事堡垒，这个地方位于冈比亚河河口附近，但这个收获，完全无法弥补英国在奴隶贸易上遭受的损失。占领戈里的英国海军是从赶赴印度的一支英军中分出来的一支兵力。在印度次大陆，法国唯一剩下的位于马埃岛的据点在1779年3月陷落了。英军如果让法国保留这个据点可能会更加明智一些，因为迈索尔的海德·阿里认为马埃岛是处在他的保护之下的。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和他儿子蒂普成了英军最为强大的对手，同时也是法国最为牢固的盟友。

欧洲也陷入了大规模的军事和海军行动之中。西班牙参战伊始，就封锁了直布罗陀。直布罗陀的英军据点防御坚固，易守难攻。但在8月末，直布罗陀总督乔治·奥古斯都·艾略特汇报补给已经不多了。<sup>28</sup>救援船队直到第二年的1月才抵达。然而，从英国的角度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个发展是，法国和西班牙海军联合起来了，对英格兰本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778年，法国佯装准备登陆英格兰本土，以便阻止英国军舰尾随穿越大西洋开赴北美的埃斯坦伯爵的舰队。1779年，法国和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在虚晃一枪了。作为参战的一个条件，西班牙坚持开展一次联合行动，以便迫使英国政府屈服。8月16日，法西联合舰队大概有66艘主力战舰来到了普利茅斯港海域。而海军上将哈代（Hardy）指挥的英国英吉利海峡舰队只有区区39艘战舰，而且还部署在离那里比较远的西部海域——之所以布置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敌人从爱尔兰登陆。

英国人担心敌人在爱尔兰登陆是有道理的。当地以天主教居民为

主，天主教领袖们倒是表示会忠于英国国王，但许多新教徒则担心，如果法国和西班牙在爱尔兰登陆的话，可能会激起当地的天主教农民群体趁机起义。对于四面受敌的诺斯勋爵内阁而言，爱尔兰的新教徒本身也不是那么可靠，特别是那些在阿尔斯特（Ulster）的长老会教徒

（Presbyterians）更是如此。当法国参战之后，那里的新教徒成立了一些志愿者组织。表面上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震慑天主教徒并帮助国家抵抗侵略，但不久它们就有了政治诉求。他们与都柏林议会的爱国者反对派联合起来，先是在贸易问题上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继而又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宪法关系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sup>29</sup> 正如爱尔兰总督所写的：“狮子挣开了链子到处游荡，尽管它俯首帖耳地摇着尾巴，但它那尖利的牙齿仍是很危险的。”<sup>30</sup> 所以，哈代的军舰被部署在爱尔兰海域以便防备法西联合舰队在爱尔兰登陆作战，就毫不奇怪了。

当哈代意识到敌人并没有开赴爱尔兰而是进入了英吉利海峡的时候，由于风力太强了，他的舰队无法启航赶来与法西联合舰队交战。这样法西联合舰队就得以停留在普利茅斯海域。在陆地上，英国人在为抵抗入侵而紧张地准备着。普利茅斯地方长官组织人们加强防御工事，而一位海军军官甚至考虑过将武器分发给当地的锡矿工人，尽管他觉得他们“是一群无法无纪、不受任何管束的人，武器一旦在他们手中，他们就可能会带来最大的混乱”。<sup>31</sup> 在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整个海岸线上，当地志愿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根据一位民兵军官的说法，几乎每一个村庄都组织了一个连的兵力。<sup>32</sup> 哈代因为无法用他的舰队保卫这个国家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按照一位反对派议员的说法，“英国海军的怯战，在欧洲的海军系统中是一种革命”。）<sup>33</sup> 但是，即便哈代的

舰队与法西舰队交战，英国肯定也很难取胜。幸好，法西之间发生了不和，而疾病也损害了他们的战斗力。9月末，西班牙无敌舰队离开了。但是至少在非常关键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内，皇家海军实际上失去了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敌人的入侵在那几个星期内看起来真是有可能发生的。<sup>34</sup>

到了1779年年末，诺斯勋爵内阁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这部分是因为英国在夏天差点遭遇敌人的登陆入侵。在最严峻的时候，这场危机不仅差点将诺斯勋爵及其同僚赶下台，甚至也威胁到了18世纪所有英国政府都赖以生存的整个政治体系。在战争中鲜有胜绩、税很高（却明显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对公共资金可能被滥用的忧虑，以及部分由于政府高息借款而引发的信贷危机，这一切混合在一起，引发了极大的不满情绪。12月，约克郡的地主们组成了一个联合会，要求压减公共开支，要求下议院更具有独立性，以便让它可以对内阁形成制衡。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英格兰所有的郡县都效仿约克郡，许多城市都开始提出一套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sup>35</sup>



在大西洋彼岸，克林顿由于无法在北方与华盛顿开展一次决战，最终决定将力量集中在南方战场。1779年12月26日，他率领7600名士兵坐船开赴南卡罗来纳。他的目标是回到查尔斯顿，1776年夏天英军曾在这里吃了败仗。但是，当普雷沃斯特在1779年早期对查尔斯顿开展进攻的时候，查尔斯顿显得特别脆弱。1780年1月，英军抵达了萨瓦纳附近的泰碧岛。在寒冷的冬季风暴中进行了一次艰难长途跋涉的英军在那里就地休息，并对军舰进行维修。2月10日，英军坐船往北向查尔斯顿进



发，并在第二天抵达了离该市30英里远的北埃迪斯托岛（North Edisto Inlet）。林肯指挥的美国防御部队紧张地等候着这股从北方过来的英军增援力量。克林顿稳步地向该市推进，并在3月初占领了海港南岸地带。在接下来的那个月的开始阶段，英军开始在查尔斯顿北部挖攻城壕沟。当一支英军分遣队在几天后占领了蒙克角（Monck's Corner）的时候，林肯的军队基本上被完全围困了。4月21日，当他意识到自己处在完全没有指望的局势之中之后，林肯决定投降，但条件是他的军队能够和平离开，而不是成为战俘。克林顿拒绝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中，英军继续围城并对城里进行了密集轰炸，林肯最后在5月12日投降。

当攻陷查尔斯顿的消息抵达伦敦的时候，诺斯勋爵内阁面临的压力明显减轻了。在此前的几个月中，改革的呼声一路高涨，诺斯勋爵自己则在3月被迫同意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检查公共开支。在克林顿夺取查尔斯顿的消息抵达英格兰之前，改革的呼声已经开始减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天主教的戈登暴乱（Gordon Riots）在1780年6月震动了整个伦敦。当发现首都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之后，绅士阶层中的许多人失去了改革的热情。但是查尔斯顿被英军占领的消息进一步巩固了内阁的地位，因为当时有关这次胜利所带来的被夸张的后果广为流传。根据一位伦敦牧师约翰·吉本斯（John Gibbons）的记载，查尔斯顿这座南方城市的陷落，使得“整个北美”都服从了英国统治。<sup>36</sup> 那一年年末，乔治·萨维尔爵士（Sir George Savile），一位主要的反对党政治家，认为公众对于任何形式的议会改革都失去了兴趣。<sup>37</sup>

如果说诺斯勋爵因为英军在南卡罗来纳的胜利而压力减轻的话，克林顿自己则可谓欣喜若狂。甚至，连西佛罗里达的莫比尔（Mobile）

陷落的消息，也没有影响他欢快的心情。克林顿对莫比尔的英军指挥官的回复基本上没有表露出什么安慰和同情，而是大作周章地描述了自己查尔斯顿取得的胜利。当然，这位英军总司令有理由感到高兴。他的军队占领了南方的这座主要城市，而且还俘虏了2500名大陆军士兵。在之后的日子里，当地人蜂拥而来表示他们的忠诚。5月29日，巴纳斯特·塔尔顿中校带领的一支英军在沃克斯华（Waxhaws）击退了大陆军，这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印象：整个南卡罗来纳马上就要回到英国人手中了。但即使在这种乐观时刻，克林顿对于法国人的担忧依旧对其有着巨大的影响。6月8日，他带着4000名士兵坐船回到纽约，目的便是去强化纽约的防御（他觉得纽约的防御变弱了）。

克林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罗尚博伯爵的带领下，一支法国远征军正赶赴北美。7月，这支法军在罗得岛的纽波特登陆。<sup>38</sup> 克林顿担心，法军会和华盛顿会合，这样他们就有力量攻击纽约了。美军总司令华盛顿确实很想和罗尚博伯爵一起联合作战，但是法军不愿意。罗尚博伯爵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法国舰队提供支援，而不是对华盛顿的大陆军提供支援。因此，这支法军只是待在罗得岛无所事事。克林顿依旧受着查尔斯顿胜利的鼓舞，一时间抛开了他一贯的谨慎，考虑对新法军基地展开进攻。但当华盛顿对纽约市的外围防御圈构成威胁时，英军进攻法军基地的想法就被抛诸脑后了。9月，年富力强的英国海军上将罗德尼带领的海军援军抵达了，这是另一个攻击法军的好机会，但此时克林顿却认为纽波特的防御过于强大，不能冒险进攻，相反，他希望占领哈德逊河边上的主要美军据点，因为这些据点控制着新泽西和新英格兰之间的通讯联络。西点的指挥官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已经和英军开始谈判，

要将西点交给英军。阿诺德这么做的动机很复杂。他负债累累，毫无疑问，这使得英军作出的给他一大笔钱的许诺变得格外诱人，但他同时也强烈反对与法国人结盟，而且他夫人一家都有保皇派倾向。不论原因为何，他的叛变行为被发现了：美军意外抓住了约翰·安德烈，他随身携带了暴露阿诺德的文件。之后阿诺德逃到英军中，而美军以间谍身份处死了不幸的安德烈。<sup>39</sup>

当克林顿在6月初坐船回到纽约的时候，康华里被留下来指挥南方战事。尽管军队数量减少了，但他属下的军官都依旧信心满满。一位军官6月10日在卡姆登（Camden）写道：“整个州都被彻底征服了。”<sup>40</sup> 但英军的乐观情绪马上就受到了南卡罗来纳偏远地区重新兴起的抵抗活动的打击。向南卡罗来纳内陆地区进军的英军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在1776年末在新泽西的所作所为同样恶劣。至少在一位历史学家看来，他们的残暴和放肆激起当地人进行武装反抗。<sup>41</sup> 或许更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新成立的保皇派民兵，在这支民兵队伍中的许多人都急于清算旧账。但是，即使英军和民兵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问题几乎注定还是会出现，因为英军那个时候挺进的地区已经由于在前几个月需要给查尔斯顿的大陆军提供食物而变得食物匮乏了。因此当地人自然会对英军在那里的搜刮行为进行抵制。有关南卡罗来纳人不久就要被强迫参加黑森军的谣言也大肆盛行。<sup>42</sup> 克林顿试图让美国人选边站的做法也不利于平息事态。就在他出发北去之前，他命令取消那些投降的叛乱民兵的缓刑。从6月20日起这些人必须宣誓效忠英王——消极的默认是不够的——否则就被认为是英国公开的敌人。根据一位英军军官7月7日在卡姆登所做的记载，结果是“这些人中十人有九人被判定为是反叛分子”。<sup>43</sup> 最为重要的是，

内陆地带的反叛行动得到了北卡罗来纳的支持。正如另外一位英军军官早在6月16日就写到的，驻扎在邻州的美军“震慑着很大一大片的地方，并使反叛之火继续燃烧”。<sup>44</sup>

取得萨拉托加大捷的霍雷肖·盖茨带领美军将要抵达的消息，无疑也进一步激发南卡罗来纳人起来反抗。但是，即使康华里在8月16日在卡姆登以少胜多大败盖茨，英军也无法让南卡罗来纳消停下来。康华里抱怨说，内陆地带的大部分地方对他取得的胜利一无所知，“任何敢于提到这场胜利的人，都会立即受到死亡的威胁”。<sup>45</sup> 更可能的情况是，有关更多的美军正在开赴南卡罗来纳的消息是当地人继续抵抗的原因所在。康华里认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向北卡罗来纳进军。康华里的逻辑是，除非南卡罗来纳得不到其邻居的物质及精神支持，否则，别想让南卡罗来纳恢复正常秩序。他也受到了北卡罗来纳有许多保皇派人士这一情况的鼓舞，这些人对英军的帮助可能比南卡罗来纳的“政府之友”更为坚决有力。

康华里在9月开始向北卡罗来纳进军，次月他停止进军，因为10月7日他带领的一支主要由保皇派当地人和民兵组成的分遣队在国王山（King's Mountain）被摧毁了。在这场战斗之后，南方战场变得尤为残酷。根据一位保皇派军官的记录，叛乱分子“假模假样”地进行了审判，并处死了好几名俘虏。<sup>46</sup> 克林顿派亚历山大·莱斯利（Alexander Leslie）少将带领一支军队到弗吉尼亚去，向康华里提供支援。他们破坏物资供应，并牵制了一些本可能对北卡罗来纳进行增援的美军。在国王山战役之后，莱斯利的军队被命令往南与康华里会合。入侵北卡罗来纳的计划被放弃了，至少暂时如此。康华里人数不多的军队退回了南卡罗来纳的

温斯伯洛（Winnsboro），住进了冬季营房。英军马上就发现，和1776年冬至1777年初在新泽西一样，他们不断受到同样的骚扰。内陆地带的战争看起来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暴力和破坏之中。美军南方战区新任司令官纳撒内尔·格林在12月末写道：“这个地方很大部分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而且极有可能退化成一片荒漠。”<sup>47</sup> 因此，康华里急于尽快恢复向北卡罗来纳的进军行动就毫不奇怪了。

对于北美地区之外的英军而言，1780年也是好坏参半的一年。杰曼认为西班牙是敌方联盟中的薄弱环节。他制订了野心勃勃的在太平洋上进攻西班牙帝国的计划，从印度往西并从中美洲往东夹击西班牙。1762年马尼拉的陷落基本上将西班牙排除出七年战争了。杰曼似乎希望给西班牙一个会带来同样效果的类似的打击。牙买加被派驻了更多的军队，以便执行这个计划中的中美洲部分的行动。但是，在这些援军抵达之前，约翰·达林或许是由于特别急于抢夺西班牙的战利品，所以派了另外一支军队到中美洲大陆地区去。他的目标是控制圣胡安河（San Juan River），并控制通往太平洋的一个通道。一旦抵达西岸，就可以在那里建立军事堡垒，并从那里对太平洋沿岸以及内陆地区开展掠夺式的攻击。史蒂芬·肯布尔（Stephen Kemble）中校带领的英军，在4月29日占领了位于尼加拉瓜湖岸附近的圣胡安城堡（San Juan Castle）。但是，正如1779年在奥莫阿一样，热带环境成了西班牙人最为有力的武器。疾病削弱了肯布尔的军队，使得他们不可能再开展进一步的行动了。当他们退回到加勒比海岸的时候，西班牙人基本不费吹灰之力就从肯布尔留下的一小支英国守军手中夺回了圣胡安城堡。<sup>48</sup>

在加勒比地区，海军上将罗德尼在4月和5月与法国舰队交战。但在

6月，他未能成功拦截一支将1 万名士兵送到哈瓦那的西班牙舰队。西班牙舰队上正在流行的疾病，意味着这支西班牙的援军亦无力进攻牙买加或者任何其他英属岛屿。这样的疾病环境同样意味着英军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休养生息。接替格兰特担任当地英军司令官的约翰·沃恩曾设想在3月份占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但他的军队变得非常虚弱，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这座岛上的疾病几乎摧毁了从美国转移到这里的为数不多的军队，”一位军官7月份在圣卢西亚这样写道，“新招募的士兵也很快都病倒了。”<sup>49</sup> 仅圣卢西亚一个地方，就有568 名英军士兵在为期3个月的夏季中死去。9月，沃恩报告说，疾病带来的“大量士兵死亡，只能让人放弃开展积极作战的任何希望”。他甚至怀疑他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战斗力守住他们应坚守的阵地。<sup>50</sup>

英军在印度的情况几乎一样危险。1780年7月，迈索尔的海德·阿里开始了他计划了很长时间的进攻。这次进攻是为了对英军夺取法国在马埃岛的据点进行报复。海德的大军进入了卡纳提克地区（Carnatic），包围了阿尔果德（Arcot）。

英军迎头赶上来抗击海德，但9月，威廉·贝利（William Baillie）中校率领的一支近4000 名士兵的军队，在波利勒（Pollilur）遭遇了彻底的惨败。根据一位东印度公司军官的说法，“这是英军在印度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sup>51</sup> 英军主力急匆匆地撤退到了 马德拉斯（Madras）<sup>注9</sup>。如果法军愿意在这个时候介入的话，马德拉斯可能也已经陷落了。法兰西岛（Isle de France）<sup>注10</sup>的法国总督已经开始和海德进行谈判，而且法国舰队也随时可以帮忙，因为法国政府在1778年12月已经向法兰西岛和 波旁岛（Isle de Bourbon）<sup>注11</sup>增派了战舰。不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

因，当地的法军指挥官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投入战斗。因此，错过了这个在南印度给英军致命打击的绝佳机会。

到了1780年年末，英国政府应该已经意识到战事有一些不利。在北美，由占领查尔斯顿所点燃的希望，基本上被南卡罗来纳随后陷入的无政府状态浇灭了。在北方战场，克林顿依旧无法让华盛顿与他决一死战，而法国远征军的到来，使得纽约遭到进攻的危险更大了。早期虽然在中美洲取得一些成功，但不久就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遭遇了失败。而在加勒比地区，疾病也限制了英军进行主动出击的能力。在1779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之后，西非于1780年一直很安静，但在南印度，英军似乎处境不妙。大臣们未能在年初的时候成功阻止西班牙和法国的结盟。当英国很清楚不会放弃直布罗陀的时候，英国与西班牙的秘密谈判就破裂了。不过，让人惊奇的是，英国大臣们选择在他们的敌人名单上再增加一位——他们对荷兰共和国宣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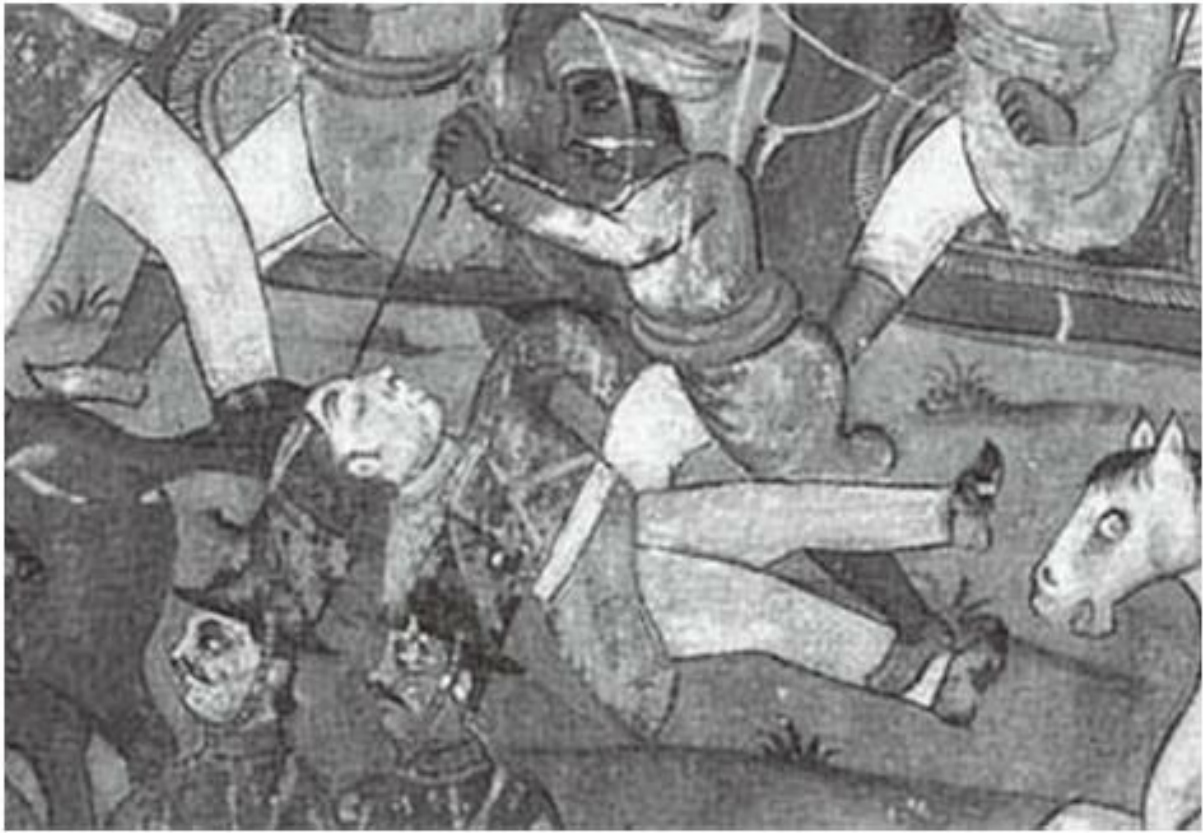


图3-2 当时一幅描绘海德·阿里在波利勒击败英军威廉·贝利中校的印度画作。

诺斯勋爵内阁对荷兰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特别是对荷兰通过加勒比海岛的圣尤斯特歇斯岛（St Eustatius）与美国之间进行的贸易，心怀不满。而荷兰人则对皇家海军重新开始拦截并搜查荷兰商船很愤怒。皇家海军这样做违反了1674年缔结的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允许中立船只运送任何交战国拥有或运输目的地是交战国的任何物品（一些范围作了严格限定的违禁品除外）。当法国卷入冲突的时候，英国的焦虑感加剧了。伦敦的大臣们认为，法国的战争活动得到了波罗的海海军物资的支撑，这些物资是通过荷兰船只运送到法国港口的。皇家海军扣押荷兰船只的



行为冒犯了其他中立国家，特别是俄罗斯。1780年2月，凯瑟琳大帝决定成立一个武装中立国联盟，这个联盟将为所有中立船运公司的权利提供保护，必要的时候会使用武力。<sup>52</sup> 如果荷兰加入这个联盟的话，在俄罗斯保护之下它就可以将更多的海军物资运送给波旁王朝。英国的一位大臣甚至担心荷兰会承担起运输法国和西班牙所需的全部海上物资的任务，这样就使得这两个波旁王朝的政府可以将他们几乎所有的海员都投入到海军之中去。<sup>53</sup>

因此，在1780年12月，英国政府借口发现了荷兰马上就要和美国签订商业条约的证据对荷兰宣战。就诺斯勋爵内阁及其同僚所设想的阻止荷兰获得俄国保护这一目的而言，他们的计划成功了。只要荷兰成为交战国，凯瑟琳大帝是不会来帮忙的。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英国大臣们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接受了英国驻海牙大使约瑟夫·约克的观点，认为对荷兰开战并取得胜会强化亲英的在荷兰执政的奥兰治王室的力量，并削弱爱国党（Patriot Party）内反对他的亲法派人士的势力。事实正好相反。奥兰治政权被严重削弱了，荷兰被赶向了法国的怀抱。



在1781年，北美战争的决定性的一年，华盛顿开局却很糟糕。1月，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军队中的哗变事件，使得大陆军根本无法展开任何攻势。法国甚至考虑将他们的远征军从纽波特撤出。前景看起来是如此的暗淡。当时，大陆会议代表们担心俄国和奥地利可能会强迫他们接受和平妥协，这种安排意味着英国可以保有它在北美占领的那些土地。<sup>54</sup> 大陆会议代表们，如果知道韦尔热讷伯爵在最糟糕的局面发生的情况下愿意接受这种妥协，他们会更为忧心忡忡。<sup>55</sup> 但1781年早期并不

仅仅只有美国人才对未来感到担忧。克林顿一直担心法美联军会威胁他在纽约的总部，而法国海军增援力量正跨越大西洋赶来，这更让他焦虑不堪了。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一直要求康华里从南边派兵过来，以便一旦遭到攻击，北方的英军可以更有把握地将敌人打退。在更往南的地方，在西佛罗里达，加尔韦斯继续抢占英军据点，并在5月占领了英军最后的军事要塞彭萨科拉（Pensacola）。<sup>56</sup>

但决定这场战争的北美战事最终结局的，是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1月初，康华里离开温斯伯洛，开赴北卡罗来纳。他带领的军队人数很少，但他预计不久就会得到莱斯利的军队的增援。同时，一支英军也从查尔斯顿出发，在恐怖角河（Cape Fear River）的威明顿（Wilmington）建立了一个基地，在那里，英军可以为康华里的军队搜集补给物资。英军不久就遭遇了一个重大挫败。1月17日，塔尔顿带领的英军，在考彭斯（Cowpens）被丹尼尔·摩根带领的大陆军和民兵打得惨败。塔尔顿对美军仓促展开了进攻，但败在了摩根更熟练的战场战术之下。<sup>57</sup> 英军的这一场失败带来的打击，至少和去年秋天在国王山的那次失败一样。不过，这一次，康华里拒绝撤退到南卡罗来纳去；相反，他决定继续推进，追击美军。摩根带来的美军分部以及格林率领的美军主力成功地躲开了他，而且在2月13日渡过丹河（Dan River）进入了弗吉尼亚。在高强度的急行军之后，康华里的军队疲惫不堪，无法继续追击美军了。康华里命令军队回到希尔斯伯勒（Hillsborough），并要求北卡罗来纳的保皇派过来增援。当地“政府之友”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来增援的任何意愿，在约翰·派尔（John Pyle）上校带领的一支向希尔斯伯勒进发的保皇派组成的队伍被美国骑兵冲击得支零破碎之后，受到

了很大的打击。

得到格林已经重新渡过丹河来到北卡罗来纳的消息之后，康华里立即离开了希尔斯伯勒，去迎击美军。格林终于在3月15日在吉尔福德法院（Guilford Court House）与康华里开战。<sup>58</sup> 康华里的人数与格林的人数相比还不到一比二，但还是决定进行进攻。美军可以进行纵深抵御，然后再伺机反攻。最后格林撤出了战斗。但是，如果说这是一场英国的胜利的话，那么，它也是一场再典型不过的皮洛士式的胜利<sup>注12</sup>。康华里的军队规模本来就小，但战力损耗却是格林的两倍。正如一位英国军官在很大程度上轻描淡写所说的，英国人或许胜利了，但“没有从这场胜利中获得任何显著的优势”。<sup>59</sup> 当康华里再一次号召当地保皇派来助阵的时候，没有一个鬼影来。忠于王室的当地人几乎没有加入到这么明显脆弱的英军中来的任何意愿。康华里别无选择，只好步履蹒跚地退回到威明顿英军据点中去。

同时，格林决定向南卡罗来纳进军，那里只有罗顿勋爵率领的少量英军和保皇派民兵守卫。格林的逻辑很简单：康华里要么放弃南卡罗来纳的英军据点，要么“必须赶回来救援”。<sup>60</sup> 格林认为，不论是哪种情况，他的军队都可以夺走英军的所有胜利果实。康华里等着看南方到底会发生什么，他更倾向于从威明顿往弗吉尼亚进军。正如在1779年和1780年一样，克林顿派了一支英军到切萨皮克去，以便对南方军队提供支持。由于对获得北卡罗来纳当地保皇派的支持不抱希望了，康华里想与弗吉尼亚的英军会合，把弗吉尼亚变为主战场。但如果他发现罗顿勋爵很难抵御格林的话，他会放弃向弗吉尼亚进军，赶回到南卡罗来纳去。

尽管人数要少很多，但在4月25日罗顿勋爵于卡姆登附近的霍布柯克山（Hobkirk's Hill）击败了格林。正如一位参加这场战斗的北卡罗来纳民兵军官后来所说的那样，英军的这场胜利在战略上是没有价值的，它没有“给罗顿勋爵带来任何优势”。<sup>61</sup> 美军不久之后就占了上风。5月10日，英军从卡姆登撤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英军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一系列的据点先后都落到了美军手中。罗顿勋爵病倒了，接替他职务的是亚历山大·斯图尔特（Alexander Stewart）中校，但后者除了在剩下的英军据点中死守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1781年9月，斯图尔特在尤托泉（Eutaw Springs）打退了格林的进攻，但不久之后他就撤退到了查尔斯顿。尽管没有赢得一场战争，但格林却为大陆会议夺回了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大部分土地。

这个时候，康华里在北方也遭遇了麻烦。他在得到罗顿勋爵在霍布柯克山取胜的消息之前就离开了威明顿。当他得悉他的下属取得了这场胜利的消息之后，他认为南卡罗来纳安全了，于是加快进军去与已经抵达弗吉尼亚的英军会合。这会让他有大概7000名士兵可供指挥。康华里遭到了由志愿参加大陆军的法国人拉法耶特侯爵率领的一小支美军的狙击。7月初，拉法耶特侯爵的前锋部队在绿泉（Green Spring）侥幸逃过了覆亡的命运。但康华里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打败阻挡他的美军，他还希望建立一个海军据点。而尽管克林顿早期认为向弗吉尼亚进军偏离了他的北方作战计划，但现在他和康华里一样认为应该“在切萨皮克建立一个供主力战舰和快速帆船停泊的航站点”。<sup>62</sup>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康华里选择了约克镇，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停泊大型战舰。8月初，康华里的军队开始构筑防御工事。从事后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带有

宿命意味的决定。当一直在进军并到处烧毁店铺追击美军的时候，康华里的军队非常强大，但一旦他龟缩到约克镇，就成了一个易受攻击的活靶子。

6月，罗尚博伯爵的军队已经离开了纽波特，去与正在纽约的菲利普斯堡的华盛顿军队会合。克林顿相信，他一直担心的美军对英军纽约总部的攻击马上就要到来了。但在8月19日，法军和美军开始向南进军。几天之后，装载着重型攻城大炮的法国舰队离开纽波特开赴切萨皮克。他们将在那里与另一支满载着超过3000士兵的法国舰队会合。为了让克林顿继续将注意力放在对英军纽约总部的担忧上，华盛顿和罗尚博伯爵佯装要从斯塔滕岛或桑迪胡克进攻纽约市。直至8月13日，在得到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英国舰队增援之后，英国海军上将托马斯·格雷夫斯才启程去帮助康华里抵御法国海军。9月5日，格雷夫斯与法国海军上将德·格拉斯（de Grasse）在切萨皮克湾入口附近海域发生了为时两个小时的战斗。双方都没有军舰被击沉，但英军舰队有了损伤，格雷夫斯决定回纽约进行维修。

现在，除非皇家海军可以回来并把法国舰队击退，否则，康华里就只能被困在笼中了。在华盛顿和罗尚博伯爵到来之前，康华里的军队已经比弗吉尼亚的美军数量要少了——这里的美军得到了格拉斯带来的法国军队的增援。克林顿意识到康华里处在险境之中为时已晚。他对康涅狄格沿岸开展了一次进攻。但是他对格罗顿（Groton）附近的格里斯沃德堡（Fort Griswold）的猛烈进攻以及将新伦敦基本烧毁的举动，都没有让华盛顿退缩。克林顿现在只能被迫组织尽量多的军队来开展一次救援作战。海军舰艇维修缓慢，这拖延了他和7000名士兵出发的时间。

直至10月19日他才开拔。但这个时候为时已晚，他在拯救康华里方面已经无能为力了。<sup>63</sup>

法美联军现在的兵力有1.6万人之多，他们在9月28~29日严密地包围了约克镇的守军。10月6日，英军阵地遭受了密集的炮火轰炸。10月14日，当法美联军占领了两处英军阵地之后，康华里继续抵抗的任何可能性都荡然无存了。康华里试图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渡河突围，但却因为恶劣天气而受阻。因此，在10月17日——伯戈因就是在四年前的同一天在萨拉托加投降的——康华里认识到已经无路可走，便开始同法美联军谈判。两天之后，英军放下了武器。

失去一支野战部队，可能还可以说是运气不佳使然，但失去两支部队的话，就只能说英军太不小心了。无论如何，对于英国来说，这个结果令人难以承受。此时英国认为继续在北美进行战斗是不值得的。“康华里勋爵投降的第一个效果是，大家都意志消沉。”持支持政府立场的拉夫伯勒勋爵（Lord Loughborough）这样写道。<sup>64</sup>而按一位反对派议员的话来说，“每个人看起来都对于继续在美国开战深恶痛绝”。<sup>65</sup>这场全球冲突中的美国战事突然停止了，英国人开始进行防御，集中力量保护他们已经占据的地盘，而华盛顿则发现他无法说服法国人和他一起进攻查尔斯顿或者纽约。对于法国人而言，他们愿意在约克镇之后继续提供帮助，但并不是通过在北美开展另一场战役的形式，而是希望通过扩大他们早前在加勒比取得的那种胜利的形式。他们在6月占领了多巴哥，在11月再次占领了荷属圣尤斯特歇斯岛，这座岛自3月以来一直都在英军手中。12月，德·格拉斯返回加勒比，计划占领巴巴多斯（Barbados）。



图3-3 约翰·特朗布尔1797年描绘约克镇投降仪式的画作。康华里宣称自己生了病，于是派副司令查尔斯·奥哈拉（Charles O'Hara）来参加投降仪式。奥哈拉一开始想将他的剑交给法军统帅罗尚博伯爵，但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法军只是来辅助美军的。而华盛顿则坚持让自己的副司令本杰明·林肯来接受查尔斯·奥哈拉的投降。

在其他地方，英军于1781年也遭遇了进一步的挫败。荷兰战争开始之后，伦敦的大臣们放弃了在太平洋与西班牙开战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并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防守更为薄弱的荷兰海外领地上。一个比较有诱惑力的攻击目标是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那里的荷兰基地控制着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3月，一支载有3000名士兵的英国舰队从英国扬帆起航，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占领好望角。但是，杰出的法国海军上将德·萨

弗伦不仅在佛得角群岛对正在补水和维修的英国舰队开展了攻击，而且他还赶在英国舰队之前于6月23日抵达了好望角，并安排两个军团的法军登陆对荷兰驻军进行增援。当英军抵达的时候，他们发现好望角的防御可谓滴水不漏，于是，大部分英国舰艇返回了英国，其中几艘则将士兵运送到了印度。

在印度，英军则更为成功一些。由于法军未能及时介入，使得新任英军司令艾尔·库特爵士得以在东印度公司孟加拉主力部队的支援下，重新获得了在1780年面对海德·阿里时所丧失的心理优势。7月，库特在波多诺伏港（Porto Novo）打败了迈索尔军队。他手下的一位军官认为，事后来看，英军取得的这次胜利是一个转折点，“这是长久以来在印度发生的一场最为关键的战斗”。<sup>66</sup> 库特乘胜前进，并在8月在波利勒取得胜利，进而在9月又在绍林格（Sholinghur）取得另一场胜利。英军开始对荷军展开了攻势，并轻松地夺取了除位于奈伽帕塔姆

（Negapatam）之外的全部荷军工厂，而奈伽帕塔姆也在被短暂围困之后于11月落入了英军手中。8月，东印度公司军队甚至占领了荷兰在帕当（Padang）的基地，并占领了苏门答腊岛西海岸的全部荷兰据点和工厂。<sup>67</sup>

甚至在欧洲，英军在1781年也抵挡住了敌人的进攻。1月，泽西岛的英国驻军抵挡住了法国的一次进攻。这场由一个新兵军团在一位年轻指挥官带领下开展的勇敢的防御战，激发约翰·辛格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创作了这场战争中的最令人难忘的战争画作：《皮尔逊少校之死》（*Death of Major Peirson*, 1783）。依旧被围困的直布罗陀则在4月份获得了新的补给，当时近100艘补给船在海军上将达比



（Darby）的护卫下抵达了直布罗陀。8月，皇家海军在北海的多格滩（Dogger Bank）与荷兰舰队交战。尽管这很难说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但这次战斗迫使荷兰海军撤回到泰瑟尔（Texel）龟缩起来。但8月份在其他地方的进展，则令英国政府不那么满意。法西联军在米诺卡登陆，并开始围攻马洪港（Port Mahon）的圣·菲利普城堡。之后不久，派兵登陆米诺卡的法西联合舰队出发来到了大西洋，抵达了英吉利海峡入口附近。这再一次让西南英格兰和爱尔兰紧张起来，担心可能会遭到入侵。正如在1779年一样，联合舰队上的海军士兵的疾病情况使得英国再一次免遭进攻。但这一次，年迈的西班牙海军上将唐·路易·德·科尔多瓦（Don Luis de Córdoba）的过于谨慎，可能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



图3-4 科普利不断被模仿的著名画作《皮尔逊少校之死》，描绘的是一位英雄在国旗之下牺牲的令人动容的场景。[注13](#)



尽管在约克镇之后，北美战事基本停止了（除了法军出人意料地在1782年8月对英国哈德逊湾公司[注14](#)的军事堡垒展开了进攻之外），更大范围的战争不仅持续进行着，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为激烈了。诺斯勋爵内阁失去了议会支持，4月新内阁成立了，首相为罗金汉侯爵。新内阁试图与美国人谈判，同时继续对英国的其他敌人开展军事行动。荷兰，正如在1781年一样，在伦敦的大臣们看来是一个软柿子。在西非，英军对荷兰的武装奴隶贸易站开展了进攻。在1782年2月对埃尔米纳[注15](#)的进攻失败之后，在3月，英军终于在沒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夺取了穆里（Mouri）、科曼汀（Kormantin）、亚潘（Apam）和贝拉古（Beraku），并在短暂围攻之后占领了亚卡拉（Accra）。5月，在科蒙达（Kommenda）的荷兰据点也投降了。与此同时，1782年1月，在印度，英军在占领了位于锡兰（斯里兰卡）亭可马里[注16](#)的荷兰基地。

然而，在1782年初几个月，英军也遭遇了挫折和失败。这意味着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北美殖民地。2月，海军上将德·萨弗伦派法国军队登陆，为迈索尔的海德·阿里提供增援，并在东印度海域挑战皇家海军。而海德的儿子蒂普则在坦焦尔（Tanjore）迫使英军投降。2月，米诺卡岛上圣·菲利普城堡的英军和汉诺威驻军由于败血病战斗力减弱，在被围困6个月之后终于投降。米诺卡的陷落最终给英军在地中海据点直布罗陀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月，法国占领了西印度群岛的圣基茨岛（St. Kitts），法军从硫磺石山（Brimstone Hill）对岛上

的英军据点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围攻，而英军试图将驻军救出来的努力也失败了。之后不久，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也被法军占领。3月，西班牙占领了位于现今洪都拉斯里奥内格罗（Rio Negro）的英军基地。波旁王朝开始计划联合进攻牙买加，而当时许多人，包括乔治三世在内，都认为这座岛屿是英国王室最有价值的海外领地。<sup>68</sup>

1782年4月，海军上将罗德尼在桑特海峡战役中对德·格拉斯指挥的法国舰队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仅拯救了牙买加，也增强了英军士气。<sup>69</sup>桑特海峡战役是18世纪中少数几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海军战役之一。罗德尼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让舰队列成一队开火的战术；相反，他指挥舰队大胆地穿越敌舰队列，把法国舰队切割开，并集中火力攻击被围在中心的法国军舰。德·格拉斯和他的旗舰“巴黎”号被迫投降。另外四艘法国军舰，连带着本来计划用来进攻牙买加的重型火炮，都落入了英军之手。罗德尼的下属海军少将萨缪尔·胡德爵士（Sir Samuel Hood）抱怨说对法国舰队造成更大伤亡的一个好机会被浪费了。<sup>70</sup>一位在德·格拉斯麾下的一艘军舰上的瑞典军官也持相同观点。他这样写道，如果罗德尼在晚上继续追击法国舰队的话，“英军的胜利战果还会扩大”。<sup>71</sup>但毫无疑问罗德尼这位英国海军上将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从而使得牙买加得以保全。4月28日，罗德尼率领舰队进入罗亚尔港（Port Royal），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海地岛上集结的西班牙军队则将自己的视野转移到北方去，并在5月占领了防御薄弱的巴哈马群岛，算是得到了一个安慰。

桑特海峡战役拯救的或许不仅仅是牙买加，它对英国人与法国人开展谈判也有帮助。因为法国人开始对英国海军力量的重新壮大感到担

忧，所以更愿意考虑和平谈判了。但是，桑特海峡战役并不是英国人比1782年头几个月看起来更好的局面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原因。成功守住了直布罗陀，同样也提升了英国人的信心，让波旁王朝感到泄气。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费尽心机建立了浮动炮台，对英军防御工事进行轰炸，之后又开始从陆地和海上轰炸。9月13日，按照英国守军中一名士兵的特别形象的说法，重型浮动炮台就像“无数不可战胜的鳄鱼一样”，在英军的核心防御工事“国王堡垒”下面围成了半个圆。<sup>72</sup> 双方都对对方进行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当时英国的一个统计是，就在那一天，“敌人至少发射了20万发子弹和炮弹，而守军则只发射了一半”。同一份资料显示，从上午10点到晚上6点，每个小时发射出了大约3000发子弹。<sup>73</sup> 浮动炮台一度看起来“在最重型的花炮攻击下依旧岿然不动”，<sup>74</sup> 但最后火热的炮弹终于引燃了这些炮台。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那之后没有开展任何重大的进攻了，尽管他们继续围困着直布罗陀，直到他们得到了初步和平协议已经签署的消息为止。<sup>75</sup> 在局面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英军和汉诺威驻军居然坚持住了。

不过，在印度，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军的脚跟就站得没那么稳固了。1782年4月8日，法国远征军占领了古德洛尔（Cuddalore）。尽管6月2日库特在阿尔尼（Arni）击败了海德的军队，而在一个月之后，海军上将爱德华·休斯（Edward Hughes）又成功阻止了法国人夺回奈伽帕塔姆的企图，但8月末，在荷兰军队的支援下，法国军队夺回了亭可马里。1782年末海德·阿里的去世，意味着英军要面对一位更为强大的对手：他的儿子蒂普。蒂普成功地打退了理查德·马修斯（Richard Matthews）准将率领的东印度军队从孟买那一侧对他的西侧翼展开的攻

击。英军在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勉力维持的据点依旧薄弱，而德·布希（de Bussy）率领的法国增援部队则在1783年3月在波多诺伏登陆。指挥这个地区的皇家军队和东印度公司军队的詹姆斯·斯图尔特少将试图在蒂普与法军会合之前将法军击退。6月，英军开始围攻古德洛尔。不过，当他们进攻法国阵地的时候，英军和汉诺威军队很轻易地被打退了。一位不满的英国军官这样写道：“逃跑的士兵之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这么普遍的恐慌。”<sup>76</sup> 法国海军上将德·萨弗伦把古德洛尔海域的休斯舰队逼退到了马德拉斯，这更加加剧了英军的不安。古德洛尔城里的法国军队受到了萨弗伦取得的胜利的鼓舞，在6月25日对围城英军开展了一次进攻。不过，斯图尔特的军队打退了法军的进攻。看起来，没有哪一方可以战胜另外一方。即便如此，当从欧洲传来消息说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的时候，斯图尔特立即同意终止敌对行动。他意识到，在休斯撤走的情况下他的阵地可谓朝不保夕。蒂普继续战斗到1784年，并在当年1月末从马修斯的军队手中夺取了芒格洛尔（Mangalore），直至3月他才与马德拉斯的英国总督马卡特尼勋爵（Lord Macartney）达成和平协议。

### 【注释】

1 Germain's thinking on this issue is set out in a letter to Clint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 Kew,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6, fo. 25.

2 H. M. Scot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1990), pp. 268–9.

3 See, for example, *Morning Post, and Daily Advertiser*, 5 May 1778.

4 K. G.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0–1783: Colonial Office Series* (21 vols, Shannon, 1972–81), xv. pp.57–62.

5 Ibid., xv. pp. 73–6.

6 Se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Ann Arbor, MI, Wedderburn Papers, a paper drawn up by Alexander Wedderburn, the British solicitor general, probably in January 1778, on the British position in the negotiations.

7 Robert A. Rutland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Mason* (3 vols, Chapel Hill, 1970), i. p. 435.

8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HMC), *The Manuscripts of the Earl of Carlisle* (London, 1897), p. 358.

9 See Jonathan R. Dull,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75), pp. 107–11.

10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Sandwich Papers, SAN/F/44/18, Sandwich's notes for cabinet, 4 April 1778.

11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 Edinburgh, Logan Home of Edrom Muniments, GD 1/384/6/30.

12 University Library, Nottingham, Newcastle of Clumber MSS, NeC 2646.

13 'Revolutionary Letters Written to Colonel Timothy Pickering by George Williams of Salem',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xliii

(1907), p. 199.

14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xv. p. 210.

15 Alexander William Crawford Lindsay, Lord Lindsay, *Lives of the Lindsays* (4 vols, Wigan, 1840), iii. p. 220.

16 Piers Mackesy, *The War for America, 1775–1783* (London, 1964), p. 232.

17 British Library (BL), London, India Office Records, Home Misc/142, p. 53, Hector Munro to Lord Weymouth, 27 October 1778.

18 Dull, *French Navy*, p. 133.

19 BL, Auckland Papers, Add. MS 34,416, fo. 246, Campbell to William Eden, 19 January 1779.

20 See, for exampl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Sir George Collier to Clinton, [16 May 1779].

21 See Alexander A. Lawrence, *Storm over Savannah: The Story of Countd' Estaing and the Siege of the Town in 1779* (Athens, GA, 1951).

22 G. R. Barnes and J. H. Owen (eds), *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 Earl of Sandwich* (4 vols, London, 1932–8), ii. p. 308.

23 For Clinton's attempts to provoke Washington into battle, see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xvii. p. 146.

24 Clint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shrewdly considered in

William B. Willcox, *Portrait of a General: Sir Henry Clinton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64).

25 See W. S. Coker and R. R. Rea (eds), *Anglo–Spanish Confrontation on the Gulf Coast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ensacola, 1982).

26 O. F. Christie (ed.), *The Diary of the Revd. William Jones, 1777–1821* (London, 1929), p. 58.

27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137/75, fo. 31.

28 Ibid., CO 91/25, Eliott to Lord Weymouth, 25 August 1779.

29 For the Irish volunteers see especially Peter Smyth, ‘The Volunteers and Parliament’, in Thomas Bartlett and D. W. Hayton (eds), *Penal Era and Golden Age: Essays in Irish History, 1690–1800* (Belfast, 1979), pp. 113–36; and Vincent Morley, *Irish Opin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0–1783* (Cambridge, 2002), Chapters 3 and 4.

30 University Library, Hull, Hotham Papers, DD HO 4/20, Lord Buckinghamshire to Sir Charles Thompson, 12 October 1779.

31 TNA, State Papers Military, SP 41/33, fo. 20, Lord Edgcumbe to Lord Weymouth, 13 August 1779.

32 Wiltshire Record Office, Trowbridge, Savernake Estate Papers, MS 9, Matthew Bentham to Lord Ailesbury, 10 October 1779.

33 BL, Add. MS 46,473, fo. 86.

34 See A.T. Paterson, *The Other Armada: The Franco–Spanish Attempt*



*to Invade Britain in 1779* (Manchester, 1960).

35 See Stephen Conway,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2000), pp. 218–23, 233–8.

36 Birmingham City Archives, Galton Papers, 248/2.

37 Christopher Wyvill, *Political Papers* (6 vols, York, 1794–1802), iii.p. 236.

38 For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expeditionary troops, see Lee Kennett, *The French Forces in America, 1780–1783* (Westport, CT, 1977).

39 For Arnold and his defection, see Willard Sterne Randall, *Benedict Arnold: Patriot and Traitor* (New York, 1990).

40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Edinburgh, Robertson–MacDonald Papers, MS 3945, fo. 61, Alexander MacDonald to his wife, 10 June 1780.

41 Jac Weller, ‘The Irregular war in the South’, *Military Affairs*, xxiv (1960), p. 133.

42 TNA, Cornwallis Papers, PRO 30/11/2, fo. 158, George Turnbull to Cornwallis, 15 June 1780.

43 Ibid., fo. 252, Lord Rawdon to Cornwallis, 7 July 1780.

44 Ibid., fo. 162, Turnbull to Cornwallis, 16 June 1780.

45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xviii. p. 170.

46 BL, Journal of Alexander Chesney, Add. MS 32, 627, fo. 17.

47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Greene Letter-book, I, to Robert Howe, 29 December 1780.

48 Mackesy, *War for America*, pp. 373–5.

49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 Broughton and Cally Muniments, GD 10/1421/7/338.

50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318/6, fo. 79.

51 BL, India Office Records, Munro Collection, MSS Eur. F 151/140, Thomas Munro to his father, 11 October 1780.

52 See Isabel de Madariaga, *Britain, 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 Sir James Harris's Mission to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1962).

53 See Scot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pp. 307–9.

54 See, for example, Paul H. Smith et al (eds), *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1774–1789* (26 vols, Washington, DC, 1976–2000), xvi. pp. 561, xvii. p. 279.

55 Richard B. Morris, *The Peacemakers: The Great Powers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65), pp. 173–90.

56 See the contemporary material collected in N. Orwin Rush, *Spain's Final Triumph Over Great Britain in the Gulf of Mexico: The Battle of Pensacola, March 9 to May 8, 1781* (Tallahassee, 1966).

57 See Lawrence E. Babits, *A Devil of a Whipping: The Battle of*

*Cowpens* (Chapel Hill, 2001).

58 See Lawrence E. Babits and Joshua B. Howard, *Long, Obstinate, and Bloody: The Battle of Guilford Court House* (Chapel Hill, 2009).

59 HMC, *Report on the Laing Manuscripts* (2 vols, London, 1914–25), ii. p. 510.

60 Julian P. Boyd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19 vols, Princeton, 1950–74), v. p. 361.

61 John C. Dann (ed.), *The Revolution Remembered: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Chicago, 1980), pp. 220–1.

62 TNA, Cornwallis Papers, PRO 30/11/68, fo. 43, Clinton to Cornwallis, 11 July 1781.

63 See John D. Grainger, *The Battle of Yorktown, 1781: A Reassessment* (Woodbridge, 2005).

64 BL, Auckland Papers, Add. MS 34,418, fo. 213, Loughborough to William Eden, 13 December 1781.

65 West Yorkshire Archives Service, Leeds, Ramsden Papers, Rockingham Letters, vol 2c, William Weddell to his wife, 13 December 1781.

66 BL, India Office Records, Munro Collection, MSS Eur F 151/140, Thomas Munro to his father, 2 October 1782.

67 Ibid., India Office Records, Home Misc/160.

68 The true value of Jamaica to Britain has been much debated by historians: see, for example, R.B. Sheridan, 'The Wealth of Jama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xviii (1965), pp. 292–311; R.P. Thomas, 'The Sugar Colonies of the Old Empire: Profit or Loss for Great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xxi (1968), pp. 30–45; Philip R.P. Coelho, 'The Profitability of Imperialism: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West Indies, 1768–1772',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1973), pp. 253–80.

69 See Stephen Conway, "'A Joy Unknown for Years Past': The American War, Britishness and the Celebration of Rodney's Victory at the Saints", *History*, lxxxvi (2001), pp. 180–99.

70 Sir John Knox Laughton (ed.),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rles, Lord Barham* (3vols, London, 1907–11), i. p. 178.

71 Amandus Johnson (ed. and trans.), *The Naval Campaigns of Count de Grasse* (Philadelphia, 1942), p. 103.

72 BL, Add. 38,605, fo. 142.

73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Extra Orderly Book, Boston and Gibraltar, 1775–1782, HM 52688, fo. 32.

74 John Drinkwater,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Siege of Gibraltar* (London, 1785), p. 291.

75 Minor operations continued: see, for example,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91/30, Eliott to Thomas Townshend, 15 January 1783.

76 BL, India Office Records, Diary of an unidentified officer, MSS Eur.  
C. 156a.

## 第四章 平民

要把握独立战争对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的影响，是很不容易的。“平民”这个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个时候这个词还没有被使用，这至少部分是由于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还没有被牢固地确立。男性要参加民兵来保卫自己的社区这种普遍的义务，意味着被我们视为平民的那些人，实际上也接受了军事训练并配备了武器。这在北美尤其如此，但在其他帝国战场，甚至在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就英国而言，由于存在志愿组织（这种组织是在面临入侵威胁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协会性质的组织，它们往往不被政府信任），就把这个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同样还有爱尔兰志愿者，他们不仅仅有军事上的作用，而且还有同等的政治上的作用。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波旁王朝入侵，还希望对位于伦敦和都柏林的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为爱尔兰赢得商业和宪法上的让步。<sup>1</sup>

海上的情况同样也是界限不清的。交战各国的海军会由政府征用的武装民船进行补充，私人帆船还被政府授权扣押任何船只。这些武装民船有时候还与海军舰艇并肩作战。但更多的情况下，它们会继续作为商船开展和平活动，只是在发现有好的进攻和占领敌人商船机会的情况下才摇身一变成为战船。但不论我们怎么称呼他们，是称呼他们为平民，还是非战斗人员（这个术语当时也不存在），抑或“居民”（当时的士兵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就是那些不像陆军士兵和海

军士兵那样积极参与战斗的、不主要从事战争活动的那些人。

要理解平民在这场战争中的体验，我们必须注意影响这种体验的不同变量。平民生活在哪个国家对这个问题是有影响的。这场战争对美国的非战斗人员的影响，比对欧洲人的影响要更为直接，更为强烈，因为叛乱的各个殖民地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现场，而欧洲的大部分地方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一些帝国战场的人民，西印度群岛的、中美洲的、西非的和南亚的人民，比起大部分居住在欧洲的人来说，受到了战争更为直接的影响。这场冲突对不同类型的平民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妇女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男人不同。同样的，黑人对战争的体验和白人的也不同：那些获得自由的反叛殖民地的黑人奴隶，比起那些利用这场战争提供的机会逃离他们主人的契约佣工和学徒来说，地位的改变更大。后者暂时脱离了劳役，但前者则永远地脱离了奴役。这场战争带来的混乱和破坏对黑人的影响尤其大。虽然我们没有特别可靠的数据，但这看起来是非常有可能的：通过逃跑并在北美重新定居而改变命运的黑人，或者由于西印度群岛的食物短缺而过早丧命的黑人，比白人要更多一些。<sup>2</sup>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由于平民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那些逃离了强制劳役的普通商船水手，对由于战时有经验的海上劳动力短缺而导致的工资的增长，毫无疑问是开心的。而船主们则对于成本的上升抱怨连连。投资交战国国债的富有的投资人则由于利率的提高而变得更加富有了，而支撑这些国家向这些投资人支付利息的 递减税制<sup>注17</sup>则对不那么富有的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盘剥。

在有限的篇幅内，避免试图对每一个卷入战争的国家的平民所受的

不同影响进行描述，而是适当地进行取舍，看起来更恰当一些。我们将集中考虑三类地方，这三类地方不是根据政治边界来确定的，而是根据他们受战争影响的强烈程度来确定的。第一类地方是战争地带。那里，平民与参战的陆军士兵或者海军士兵有直接的接触，而且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最为可怕的一面。第二类地方则是那种暴露在攻击之下、离战争地带很近因而很容易成为战争地带但却躲过一劫的地方。第三类地方是那种离交战现场很远，没有会受到攻击的现实风险的地方。欧洲交战各国的大部分领土都属于此类。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三种分类是完全黑白分明的。不同类别的地方的平民，甚至全部三类地方的平民，可能都对这场战争的某些特征有相当一致的体验。举例而言，税增加了，这对于战争地带、受战争威胁地带和远离战争现场的地带都是一样的。此外，某个地方可能会从一个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像新泽西一样，基本上一直都是战争前线。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新泽西是“美国革命的主场”。<sup>3</sup> 由于接近英国占据的纽约，它从1776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中都有战事发生。更常见的情况是，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战争地带，但紧接着的则是一段没有紧张战事发生的时期，或者相反。纽约的长岛在1776年8月是一场全面战争的现场，而之后则是一个稳定的军事占领时期。它离战场不远，可能会遭受攻击，但却没有再次遭遇任何激烈的军事行动，因此，当地居民的战争体验就有了改善。英国和爱尔兰——特别是南英格兰地区——则恰恰相反。这场战争的头几年，这个地区远离所有的陆地和海上军事行动，没有遭到攻击的危险。然而，从1778年开始，这个地区开始面临法国入侵的威胁，从而成了密集军事行动的现场。





我们首先考察居住在战争地带的平民。他们的体验也不总是负面的。对于北美的许多奴隶来说，英军的到来是一个获得解放的好机会，尽管后来他们马上就失望了。自从1775年弗吉尼亚的末代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给那些愿意加入他的队伍去镇压叛乱的奴隶自由那一刻开始，黑人就是正面看待英国的武装力量的。弗吉尼亚医生罗伯特·霍尼曼在1781年曾这样写道：英军就像一条磁蛇在弗吉尼亚穿行，而那些奴隶，“这些可怜的生命，从各个角落，甚至是最偏远的角落，被吸向敌人”。<sup>4</sup> 而从更凡俗的角度来说，一些白人居民则将士兵的出现看作是一个值得好奇的事情，因为这让他们的平淡生活有了一些消遣。康华里军队的一位高级英国军官查尔斯·奥哈拉在北卡罗来纳时写道：“美国偏远森林出现了兵营这种新鲜事，让好几个人盯着我们看。”<sup>5</sup> 其他人则发现了与军队做生意赚钱的机会。美国农民本着希望赚一些硬通货的目的将农作物供应给了英国和法国军营。而大陆军也定期采购当地供应的农产品，至少在大陆军的纸币贬值到几乎分文不值之前一直如此。当英军在1776年7月在斯塔滕岛登陆的时候，当地居民看到他们似乎很高兴，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士兵以“合理的价格”采购了他们生产的食品的缘故。<sup>6</sup>

但对于居住在战争地带的大部分居民来说，毫无疑问生活是残酷的。对于那些在西班牙开始围攻直布罗陀的时候正好被困在那里的非战斗人员来说，食品短缺马上就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1780年1月初，直布罗陀总督报告说许多平民处在“饥饿的边缘”。<sup>7</sup> 几天之后救援物资的抵达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在漫长的围城之战中，居民还将进一步遭遇困难时刻。波士顿的居民和难民在战争之初被围困了几乎一年之久，对

食品和燃料的短缺抱怨连天。海关官员理查德·里弗提到，“新鲜食品”在1775年7月末变得“异常稀少”。他在11月写道：“基本上居民用钱买不到什么东西。陆军和海军吞噬了一切。”<sup>8</sup> 一位当地的保皇派人士处境同样悲惨。“陆军中有人囤积居奇，欺压我们，”彼得·奥利弗抱怨说，“他们刚刚以每查尔特隆（Chaldron）[注18](#)1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大量的海运煤，而我们却被迫要支付每磅3.5英镑的价格。”<sup>9</sup>

对于战争地带所有地方的平民来说，对安全的焦虑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宾夕法尼亚日耳曼城的居民约翰·米勒在1777年9月第一次遭遇英军，他在日记里私下承认，他“感到非常恐惧，对外国雇佣兵的感觉更是如此”。<sup>10</sup> 许多农民不可能与军队进行公平的买卖，相反，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放弃他们的作物和牲畜，因为这些都被军队强制征用了。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还可能会收到有关被征用物资的收据，但即使如此，他们获得补偿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南卡罗来纳的保皇派人士亚历山大·嘉登医生的牛、马、羊、猪，还有“玉米、大米、豌豆和饲料等等”，都在1780年春天查尔斯顿围攻战中被不同的英军队伍征用了。其中一些倒是给了收据，但战争结束之后很久了，他也依旧没有看到任何钱款的影子。<sup>11</sup> 就是在平民的土地上安营扎寨这个事情本身，也给平民带来了损失。农作物被踩踏之后已经不适合于收割了，树木被砍倒用来做临时营房，篱笆甚至一些谷仓等都被拆了用来当柴火。那些造成此类损失的人往往心有遗憾，但却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作为战争现场的国家必须经历的不幸状态。”当伯戈因的军队在1777年夏天进军的时候，一位英国军官这样写道。<sup>12</sup>

然而，有的时候这种破坏可能是出于恶意的。在印度，海德·阿里

的军队在1780年攻打卡纳提克的时候将其摧毁了。根据英国的一项记录，尤其是海德·阿里的骑兵，焚烧并“洗劫了整个国家”，“甚至直至马德拉斯的大门口”。<sup>13</sup> 得到了在加拿大的英军帮助的印第安人——许多情况下也是在正规军和美国保皇派人士的协同下——同样也将反叛殖民地的边境地区夷为平地。他们摧毁庄稼和房屋，带走或者杀死牲口。作为报复，华盛顿于1779年夏天派美军到了边境地区，对曾来侵扰殖民地居民的印第安人的土地进行破坏。这次行动的目的是给印第安人造成最大限度的痛苦，按照华盛顿的话来说，就是“将他们的定居点彻底摧毁”。苏利文的士兵看起来非常兴奋地执行着命令，他们所到之处，印第安人的土地大片都被夷为平地，庄稼和村庄都统统被烧毁。<sup>14</sup> 尽管苏利文的军队带来了大面积的破坏，但印第安人并没有就此臣服。<sup>15</sup> 1780年，纽约边境地区的社区遭受了印第安人从加拿大发起的毁灭性的入侵。而在10月，奥尔巴尼附近的伯斯镇（Ballstown）和斯科哈里（Schoharie）都被印第安人付诸一炬。

英军对沿海地带的进攻也同样是为了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1775年夏天位于现在缅因州的法尔茅斯（Falmouth）遭到了进攻，这是遭到此种“待遇”的第一批地方之一。战争结束之前，许多其他城镇都遭到了劫掠。康涅狄格海岸上的新伦敦迟至1781年9月还遭到了进攻。在英军所到之处，房屋和船舶均遭焚毁。在弗吉尼亚，英军沿着河道进攻，烟草都被烧毁了，甚至连果园都不例外。内陆地区也不一定会免遭从沿海地区进军过来的士兵的毒手。一位英国军官在1780年9月在南卡罗来纳的奇罗（Cheraw）写道，他的军队“烧毁了大约50所房屋和农场”。<sup>16</sup> 这种毁灭性进攻背后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为了摧毁对美国人的

战争活动有益的物资，或者让武装民船丧失战斗力。杰曼在1778年3月特别建议对新英格兰展开劫掠活动，以便阻止美国人“继续对王国的贸易进行掠夺”。<sup>17</sup>其他一些进攻行动则是为了拖住叛军的手脚，而另外一些行动则是为了引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华盛顿来与英军正面交锋。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做同样是为了惩罚和恐吓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在威廉·特赖恩（William Tryon）带队在1779年7月进行的劫掠活动中，康涅狄格的费尔菲尔德的两座教堂被摧毁，他感到十分难过。但同时，他对于整个城镇的其余部分被烧成灰烬一点也不难过。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可以“激起一种普遍的恐惧和沮丧之感”。<sup>18</sup>

士兵的一些自发的而不是依据命令而作出的行动同样恶劣。当被迫撤退时，他们的沮丧和愤怒以及或许那种再也不会回来的想法，意味着他们可能放肆地进行破坏。在1776年3月撤离波士顿之前的那些日子中，英军大肆发泄着他们的愤怒。一位叫约翰·罗伊的商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个屋子中的军官们“打坏了烟道上的一块价值20金币的玻璃镜”。<sup>19</sup>当英军在1778年夏天从费城撤离的时候，有好几项记录都显示，各种形式的垃圾，包括大量的粪便，布满街头。<sup>20</sup>当普雷沃斯特率领的那一小支军队在1779年夏初从查尔斯顿外围地区撤退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些士兵似乎对南卡罗来纳的最后一位皇家副总督威廉·布尔（William Bull）的阿什利霍尔种植园进行了大肆破坏。破坏得可谓彻头彻尾，但看起来却毫无目的。甚至“每一张床和每一块床垫”都被切开了，所有“中国瓷器和其他陶器”都被打碎了。一条渔坝被破坏了，甚至布尔的私人文件也被胡乱扔在“草地上和花园里”。普雷沃斯特否认他的军队要为此负责，他试图将它推到美军的普拉斯基军团（Pulaski's

Legion），甚至是在混乱中失去控制的“一大群黑人”身上去。但不论到底是谁搞的破坏，这毫无疑问是由于这片种植园的不幸位置所导致的：它正好位于交战双方行进的通路上。<sup>21</sup>

战争地带的士兵们也趁机偷窃平民的财产。士兵们第一次抵达一个地方的时候，尤其倾向于进行这种活动，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让他们不再拘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权那么做了。大陆军甚至还偷自己的老百姓的东西，而他们的法国盟友，尽管并没有与纽波特的当地居民接触，但在1781年往南向约克镇进军的时候，也从不幸的居民那里偷窃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到了弗吉尼亚之后，法军因为偷窃当地人的财产而受到批评。但是，英军在这方面的名声是最糟糕的。1776年11月和12月，在新泽西，乘胜追击华盛顿不断瓦解的大陆军的英军和德军进行了大肆掠夺。根据当时一位人士的观察，“如果对英国正规军和黑森军在普林斯镇（Prince-town）的5英里范围内所犯下的每一桩抢劫和其他暴行进行描述的话……这会有满满一卷之多”。<sup>22</sup> 居住在特伦顿的保皇派人士丹尼尔·考克斯后来说他的“房间、壁橱和酒窖都被撬开了，被洗劫一空”。<sup>23</sup> 豪将军率领的英军在1777年9月向切斯特县

（Chester County）进军的时候，这支军队甚至闯入了位于特蕾迪弗林（Tredyffrin）的一座浸礼会教堂，抢走了圣餐盘、一块桌布、一本圣经，以及其他一些衣物和各式各样的安葬工具。<sup>24</sup> 当英军在1778年12月在圣卢西亚登陆的时候，他们同样进行了洗劫。在格兰特将军的部队登陆之后不久，被处决的一位英军士兵抢掠来的物品包括各式各样的男装——马裤、外套、马甲、衬衫、长袜，甚至还有女帽。<sup>25</sup> 在直布罗陀，西班牙人的炸弹炸开了装满葡萄酒的酒窖，驻军士兵立即享用了这些美

酒，并进而进行了大规模的洗劫活动，按照一位感到震惊的英国军官的说法，“士兵们到处抢、掠、入室和入店盗窃”。<sup>26</sup>

平民不仅仅是被抢，他们往往还遭受到身体上的欺凌。在边境地区，印第安人杀害他们进攻的城镇里的妇女和儿童，还有男人。与印第安人一起参加攻击行动的英国和保皇派军官宣称，根本不可能控制住他们盟友的嗜血行为（“我没有办法防止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这些野蛮人愤怒和不幸的牺牲品。”）。<sup>27</sup> 印第安妇女和儿童则受到了美军同样的残暴对待。在非边境地区，平民的悲惨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男人们在试图对士兵们的掠夺进行反抗时受到士兵的攻击，一些人甚至被杀害了——有时候是由于意外，但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故意的。许多报告都显示，大量的妇女被强奸。英军在1776年11月和12月通过新泽西的时候，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恶劣。大陆会议很自然会对这种宣传机会大加利用，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推定所有这些描述都刻意夸大了有关情况。美国士兵的私人信件显示，他们真的是非常愤怒。“恶魔，”一位美国军官写道，“向文明发动了战争。”<sup>28</sup> 纳撒内尔·格林则更为直接，他情绪激动地向罗得岛总督报告他对英军行为的极度震惊：“那些不到10岁的小姑娘都被强奸了，许多母女则被当着丈夫和儿子的面被强奸了，他们被强迫留下来观看这种兽行。”<sup>29</sup> 我们从一些妇女自己的证词中知道了一些被强奸的妇女的名字。英军在1776年8月登陆长岛的时候，玛丽·约翰斯顿被强奸了，她的名字出现在了军事法庭的记录中。当强奸她的士兵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她展现了她超越常人的宽容，甚至请求宽恕他们。<sup>30</sup> 北卡罗来纳的金·布莱尔在1781年5月给她的姐姐写信时提到了英军士兵强奸的妇女的名字：“在这些人之中，我弟弟说，有H. 蒙特福德的妻

子，约翰·赖茨·朗福兹的妻子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sup>31</sup>



那些足够幸运、居住在离战争地带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的北美居民，也对于这场战争难以忘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他们可能并没有直接面临被敌人打死的威胁，但是，其中一些人因为染上疾病而死，这些疾病在战争地带暴发，但被脱离队伍的士兵带到了这里。1775~1776年间横扫新英格兰地区，后来又进一步扩散的天花疫情，就和波士顿围城战有关，波士顿似乎是这次疫情暴发的中心地带。<sup>32</sup> 远离战场也不意味着可以免受那种参加了大陆军的丈夫、兄弟或儿子阵亡的痛苦。即使那些没有遭遇家庭灾难的平民，也由于失去了太多男丁而遭遇了重重的困难。许多社区中参军的男人比例太高了，这些男人不是参加了大陆军，就是参加了民兵组织。新泽西的查塔姆地区，在战争过程中年龄在16~50岁之间的男丁中有2/3都参军了。<sup>33</sup> 新罕布什尔的彼得伯勒（Peterborough）在1775年的人口是549人。其中有大约170名男丁在战争过程中从事了某种军事活动，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个适龄男丁都在某个时刻扛起过枪。<sup>34</sup> 妇女通过扮演新的角色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正如一位康涅狄格妇女在当兵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所写到的那样，“里里外外都是靠我自己张罗的”。<sup>35</sup> 但军事行动并不是劳动力短缺的唯一原因。许多奴隶和契约佣工逃亡了，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雇主抱怨人手不够，一些地方庄稼无人收割。1779年3月，马萨诸塞马什菲尔德（Marshfield）的萨拉·托马斯抱怨说“没有面包了”，她认为这是因为太多的男人“卷入了消灭彼此的战斗”，却“没有来耕种可以让他可怜贫穷的家人可以有面包吃的土地”。<sup>36</sup> 对于新独立各州的平民来

说，税负提高了，这也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更是如此。北美叛军控制的地区的居民们，还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严重混乱，这种恶性通货膨胀是由于大陆会议和各州大量印刷纸币造成的。从1775年到1778年，货币发行占大陆会议收入高达惊人的86.47%。<sup>37</sup> 在宾夕法尼亚，1779年物价涨了7倍。在马里兰，在1777年到1780年之间，像牛肉、黄油、玉米、小麦和盐这样的食品的价格涨幅在1900%至5045%之间。<sup>38</sup> 消费者强烈抗议，特别是城市中心的消费者更是如此。但大陆会议在战争最后几年中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让许多生产商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利润一下子蒸发了。财产损失的情况也并不仅限于发生战争的地方。在所有各州，被认定为是保皇派人士的美国人的房屋、土地和物品都被革命政府没收了，政府将这些东西出售，以便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支持。

即使如此，那些远离战斗地带的人的境况也比那些在战斗地带与士兵们鼻息相通的人要好一些。对于那些离战斗地带有一定距离的人来说，从这场战争中获利的机会也要大很多。保皇派人士土地房产的强制拍卖，使得许多有钱来购买新土地的富有的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甚至也让一些佃农，比如纽约、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成为他们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sup>39</sup> 大陆军的需求刺激了美国武器、弹药、制鞋和制衣业的生产。而在战争之前主要是满足家庭以及当地居民需求的那些农民，则由于军需人员为军队采购大量食物的缘故而进行了地域跨度更大、更为商业化的交易。<sup>40</sup> 获得硬通货的诱惑让美国人带着自己的农产品来到英军基地。一位在纽约的黑森军官就曾写到，有居民赶着牛走了20英里的路程将它们卖给驻军。<sup>41</sup>“装满烟叶的马车，”詹姆斯·辛普森在刚刚占领



的查尔斯顿写道，“是从超过230 英里之外的地方赶过来的。”<sup>42</sup>1781年9月经过费城的一位法国军官写到，他在费城见到了好几个商人，“他们说和平只会对他们的生意带来损害，因此，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他们不需要和平”。<sup>43</sup>

那些居住在英国控制地区的人们的境遇，也比那些战争地带的居民要好一些。当然，这些人也并不能体会到他们实际上是相对好运的。所有反叛各州被英军控制的地区都实行了戒严令，这意味着那种被怀疑犯罪的平民是在军事法庭被审判的。平民受到的处罚和士兵一样，遭到严厉的鞭打也不奇怪。正如费城的威廉·罗尔多年之后所回忆的：“对于那些之前已经经历过军事戒严的人来说，这里的军政府的做派尤其令人厌恶。”<sup>44</sup>平民经常被迫让军队在自家住宿，也经常抱怨因此而受到干扰和损害。在纽约，约书亚·佩尔抱怨说，住在他家的27 名士兵，“行为举止非常粗暴无礼，他们撬开了一个公寓，偷走了他的家禽，毫不吝惜地大肆消耗他的干草和柴火，而且，吵闹不堪，给他和家人带来了不少麻烦”。<sup>45</sup>英军控制的城镇由于大量难民和士兵涌入而人满为患，成了滋生疾病最好的温床。“这座城市这个月疾病肆虐，”一位纽约的德国牧师在1777年8月末这样写道，“许多人，特别是孩子，都病死了。”<sup>46</sup>一些居民的房子通常并不是英军士兵刻意烧毁的，但一些居民家的外屋什么的，都由于要为驻军提供柴火而被拆掉了。一些居民的房子则由于需要为守军提供防御阵地而被夷为平地。长岛西端的农民们的木材、马匹和马车不断被强制征用，农民们不堪重负。他们要么是因为对英军变得不满或者没有能力了，越来越不愿意服从这种强制征用命令。<sup>47</sup>英军控制地区的居民还必须承受英军士兵们的劫掠。1779年10月，长岛法拉盛

（Flushing）的詹姆斯·埃德加发现三名英军士兵试图对他妹妹的房子进行抢劫。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开枪打死了一名闯入的士兵。<sup>48</sup>长岛还因为遭受了所谓的“黑森瘿蚊”所带来的另一种灾害，在1780年末这种很小的昆虫毁坏了小麦。一些美国人认为（至少暗示）这种昆虫是由德国雇佣兵带到北美来的。<sup>49</sup>

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居住在英军控制地区的北美居民的境遇都比那些居住在战争地带的居民要好很多。在一些情况下，居住在英军控制地区的居民运气不错，因为当地的指挥官比较体察民情。这样的指挥官会尽力确保不给当地居民带来什么不便。1777年头几个月在纽波特担任驻军指挥官的佩尔西伯爵，就拒绝向豪的主力部队提供超出他认为当地居民负担能力的粮草。他在2月9日这么写道：“给当地居民留下800吨的存货是绝对有必要的，要不然这些人的生活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当纽波特的居民得知佩尔西伯爵要返回英国的时候，他们对他可谓千恩万谢，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sup>50</sup>1779年在佩诺布斯科特担任驻军指挥官的弗朗西斯·麦克李恩（Francis McLean）准将同样特别为当地居民着想，他竭尽全力确保自己的军队不进行什么抢掠活动，他的军队总体上来说表现良好。8月，麦克李恩很自豪地向克林顿说：“自从我们抵达以来，从来没有一件物品是在不付钱的情况下被士兵拿走的。”<sup>51</sup>

军队指挥官当然会起到好的作用，但是，即使当地的英军指挥官不像佩尔西伯爵和麦克李恩那样为民着想，那些居住在英军控制地区的平民的境遇也不像那些居住在战争地带的平民那么糟糕。军官们要约束守军，比约束行进中的或者正在开展攻击活动的士兵要容易一些。更重要的是，当平民们提出他们遭受了不公对待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获得救

济。而约书亚·佩尔对在他的家里安营扎寨的士兵的糟糕行为的抱怨，也使得纽约守军指挥官下令进行调查——“了解这些指控是否确有实据，而有这种不良行为的士兵应受到惩罚，佩尔先生应该获得立即救济。”<sup>52</sup> 居住在英军控制地区的妇女也可能像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遭到士兵的侵扰，但我们从各种资料中也发现，颇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嫁给了英军士兵。在费城，据一位黑森牧师估计，他至少为100位当地女性嫁给德国士兵主持了婚礼。<sup>53</sup>更重要的是，就像居住在被叛军牢牢控制的地方的军民一样，这里居民赚钱的机会比战斗地带的居民多很多。英军财大气粗，当地生产商和商人非常积极地向军队供应物品和提供服务。自从1776年9月开始直至战争结束的时候，一直处在英军控制之下的纽约可谓回到了七年战争时期的那种黄金时光。威廉·福克纳向不同的英军军团以及英军总军需官出售了大量的啤酒。<sup>54</sup> 而纽约市商人和店主的账簿显示，他们的生意都不错。在查尔斯顿，零售摊位的数量大量增加，而在费城，一位商人说道：“军队采购大量物资，并雇用许多当地人，这些人又成为买主，这带来了可观的销售额。”<sup>55</sup>

对于北美之外那些面临被攻击风险的其他地方（但不包括战争地带），情况同样如此。在牙买加，由于面临被入侵的威胁，民兵经常被召集起来。有人认为这种状态是“最糟糕的敌人”，因为这严重影响了甘蔗种植园的生产，并给当地业主造成了额外的成本压力。来自大陆殖民地的主要物资供应渠道也被切断了，按照一位房地产律师的说法，这导致了“向黑人的物资供应”极度缺乏。<sup>56</sup> 然而，从整体上来说，居住在没有发生实际战斗的地区的平民遭受的苦难要少一些，并且比战斗地带的人从中获得了更多的益处。多米尼加在1778年9月被法国占领之后，多

米尼加的英国种植园主们被迫每周向法军供应一定数量的牲畜以供军队医院之需，但至少他们获得了一些补偿。而且，尽管法国人占领了该岛，这些种植园主还可以继续从事商业活动。<sup>57</sup>

北美战争扩大到欧洲之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既遭遇了困难，也获得了机会。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受阻，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成功进一步降低了出口。英国的海外贸易大幅缩减。根据官方统计，1778~1791年间的年平均出口额比1774年少了24%。<sup>58</sup> 但是，从经济整体来看，在法国参战之后，由于政府为应对更为激烈的战争而大幅扩大开支，出口商的损失基本被抵消了。的确，政府开支扩大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它吸走了用于土地改良的资金——在战争的后半程圈地数量减少了——也使得基础设施项目（比如运河建设项目）失去了相应的资金。战时税，特别是在战争后面几年，开始对大众消费品进行征收，这可能降低了部分产品的消费量。这种情形与战争失败以及面临入侵威胁加在一起，毫无疑问引发了一场要求强化公共开支控制的院外运动，而这种运动使得诺斯勋爵内阁在1779年末倒台。<sup>59</sup> 而且，更为紧张的备战节奏使得一些地方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在苏格兰高地更是如此，这个地方征兵量很大。不过，尽管有所有这些不好的地方，但政府在战争活动上的开支的扩大毫无疑问刺激了工业和农业。诸如为苏格兰军团制造格子花呢衣服的威廉·威尔逊这样的制衣商，在战争中就大发横财。<sup>60</sup> 其他的军服制造商、大炮、小型武器和军火生产商，以及私人造船主——这些造船主收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造船订单，也是如此。1779年8月，来自沃特福德（Waterford）的供应商约瑟夫·雅各布就预计要从海军那里获得“不少的”合同。他在11月写道，他已经腌渍了大约5000桶牛肉和猪肉。当

然，好运并不是他一个人独享的，向他供应肉类的沃特福德地区的农民也因此而受益。<sup>61</sup>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欢迎军队来到他们的家园。诸如普利茅斯这样的地方的物价升高了，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士兵、民兵和水手聚集。1780年夏天，诺维奇市（Norwich）的市长提到，由于城里面蓄养了大量的龙骑兵战马，草料的价格升高了。<sup>62</sup> 客栈老板则对他们必须以低于向平民收取的价格容留军事人员提出了抗议，陆军部收到了大量抱怨士兵行为不检的举报信。来自汉普郡皮特斯菲尔德（Petersfield）的议员威廉·乔利夫（William Joliffe）在1779年4月抱怨说，驻扎在他所在社区的士兵“偷了20多头羊和羊羔，许多猪，还有数不清的家禽”。<sup>63</sup> 第二年，德文郡的准男爵弗朗西斯·布勒爵士（Sir Francis Buller）对驻扎在他所在地区的士兵造成的问题进行了更加大胆的抨击：“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没有士兵犯下重罪，他们闯入了好几所房子，在马路上抢劫，偷了一个人4头羊、另一个人3头羊，还有一个人的所有的家禽，肆无忌惮地抢劫果园和花园。”<sup>64</sup>

不过，尽管当地一些头面人物非常愤怒，大不列颠或北爱尔兰没有哪个地方有诸如新泽西、弗吉尼亚或者南卡罗来纳那样的遭遇。用于集中训练军队的军营带来的好处可能比坏处要多。被占用土地的地主获得了报酬，他们的财产受到的损害也获得了补偿。小规模偷窃活动给当地人带来了损失，疾病的暴发也导致周围居民的死亡率更高了，但向军营供应物资的机会以及军营吸引的大量的访客则让当地人欢天喜地。当地的旅店由于更多人来人往而获益颇丰。甚至还建立了一条公共马车线路，以便让伦敦的观光客可以到埃塞克斯的一个较大规模的兵营去参

观。报纸也借公众对军营的兴趣趁机推出“军营资讯”这样的固定栏目来赚钱。版画商则制作了描绘肯特郡考克斯希斯（Coxheath）军营热闹生活的风格暧昧的版画。而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则在1778年推出了一场名为《军营》（*The Camp*）的音乐剧。<sup>65</sup>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远离战争、很少受到或者没有受到敌人进攻的威胁的地方。参战的欧洲各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属于这个类别，在它们成为英国的敌对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而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从战争爆发到1777年末，也就是说，直到法国参战使得战争更为紧张、面临法国入侵的真正威胁之前，也是如此。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下其中一些中立国家的平民，这些平民由于这场遥远的战争而受到了波及。

远离战争会让人觉得战争于己无涉，因此对它采取高高挂起的态度。战争初期来到英国的美国贵格会教徒贾贝兹·莫德·费舍尔，在他的日记中就写道，威尔士人对大西洋彼岸的那场战争毫不关心，“他们几乎不了解这场战争”。<sup>66</sup> 不过，大部分证据则显示，其他地方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度更高一些。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自治市，甚至是县议会，都发来了支持开战的文书或者呼吁与美国人和解的请愿书。<sup>67</sup> 毫无疑问，这种不同态度的分野是由于不同地方之间的长期对立所导致的。而美国战争则让这种对立再次凸显出来。伦敦呼吁与殖民地之间弥合分歧，因为战争会带来更多的税、更多的债务，而且“我们担心，我们会因此丧失我们最有价值的商业活动”。<sup>68</sup> 在英军占

领纽约和华盛顿堡之后，斯塔福德郡的利奇菲尔德市（Lichfield）的教堂都敲响了钟声进行庆祝。在诺丁汉，一位商人在交易大厅提议为美军总司令祝酒，从而引发了一场混战。<sup>69</sup>英国新教异议分子比较倾向于对美国人，至少在战争早期是这样。而英格兰教会的信徒之间则有明显的不同意见：英国牧师阶层基本上都一边倒地支持政府，而相当多的普通信众则不支持政府。<sup>70</sup>议会同样是分裂的，反对派议员中有一小部分人公开反对战争，并担心政府的威权主义的意图。正如主要反对派的领袖罗金汉侯爵在1775年6月写道的：“如果让一支专横的军队来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一片土地的话……这意味着，不久之后，整个国家……都会遭受相同的奴役。”<sup>71</sup>

爱尔兰的英国地主精英阶层非常希望能够在被英国政府最少干涉的情况下统治爱尔兰，所以马上将他们的处境和美国人的处境相提并论起来。至少在战争初期，美国人不过是在主张他们拥有英国公民的权利。阿尔斯特地区的长老会信徒总体上都是叛乱分子的热情支持者。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政治和宗教上的同情也被家庭纽带强化了，因为大量的“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信徒在18世纪移民到了北美。<sup>72</sup>毫无疑问，许多爱尔兰天主教徒对于新教徒之间的这场战争态度暧昧，并对英国面临的困难幸灾乐祸。但他们的一些宗教领袖则意识到这是一个表达自己忠心的机会，并将这种表达作为争取议会减少对他们参与公共生活限制的一种手段。天主教发言人之一查尔斯·奥康纳（Charles O’Conor）就专门强调，殖民地的天主教徒平静地服从英国，而新教异议分子则蠢蠢欲动地进行反叛。<sup>73</sup>

对战争的不同看法引发了读者极大的兴趣。毫无疑问，苏格兰历史

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就是利用了公众对任何美国的事情都感到着迷这一点，在1777年推出了《美国史》的头两卷。<sup>74</sup> 诗人们则抓住这种兄弟阋墙式的冲突可能带来的情感上的困惑，发表了描述内战苦难的作品，比如托马斯·戴（Thomas Day）1777年的作品《荒凉的美国》（*Desolation of America*）。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比如邦克山战役中一位英国军官的阵亡或者长岛战役，也同样出现在了《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上，这在当年是一本主流杂志。<sup>75</sup> 伦敦、英格兰各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报道1775~1777年之间的北美战事。官方通讯、伤亡名单以及来自美国那边的报道，充斥着报纸的每一个角落。从商业上来说，编者们的必定是将这场冲突当作是天赐之物的。更重要的是，它增加了销量。随着公众希望了解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一切细节，读者数量在不断地增长。

相对于大不列颠或爱尔兰，法国对媒体的控制更严一些。但法国官方认可的报纸的销量也同样增长了。《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在七年战争时期卖得不错，但在后面的和平时间中销量降低了不少。<sup>76</sup>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情况也是如此。到了1781年，《法兰西公报》的销量达到了七年战争时期的最高水平。战争结束后其销量再一次下降。其他证据也显示法国人对这场美国战争有很浓厚的兴趣。英国和爱尔兰精英家庭的青年才俊来到欧洲大陆完成教育或者游玩，在独立战争头几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写信给家里说法国人非常同情美国人的事业。1775年9月，达特茅斯伯爵的儿子路易沙姆勋爵（Lord Lewisham）写道，“我们的美国纷争”是他与法国人谈话时的主要话题之一，而他认为法国人“都偏向美国人”。<sup>77</sup>



地理上远离战争现场并不意味着欧洲的平民没有受到影响。被派到国外的士兵和水手们很少有家人一起陪伴。分离本身就会带来痛苦和焦虑。威廉·康格利夫（William Congreve）上尉在北美的皇家炮兵部队服役，了解到他妻子“由于你离开了她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sup>78</sup> 而路易莎·科诺利夫人则提到，豪将军的妻子“焦虑不堪，以至于我一直为她而惴惴不安”。<sup>79</sup> 对于贫穷一些的妇女来说，由于丈夫不在身边，其带来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担忧了。1775年11月，威尔特郡的治安官将玛莎·哈德，一位远在外地的海军士兵的妻子，描述为一个无赖和流浪者，并将她送回到她丈夫原来的教区。<sup>80</sup> 而且，这种分离可能是永久的。不是所有的士兵和水手都能够返回家园。一些人开小差了，在外面建立了新的家庭，其他一些人则死去了——有的死于战斗，更多的则死于疾病。西印度群岛、西非和印度，对于那些不习惯当地环境的人来说，是尤其不利于健康的所在。而船员和乘客在上面一次就窝好几个月的船只，则是滋生各式各样疾病的温床。不论是对于居住在巴塞罗那、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贝桑松（Besançon）、伯明翰或者马萨诸塞的波士顿的人来说，自己亲爱的人死去的消息带来的打击都是一样的。

尽管大部分军队调动不像战区或者受到严重战争威胁的地区的军队那样频繁，但军队调动还是给欧洲参战国家带来了混乱和压力。甚至在英国政府于1780年12月对荷兰共和国宣战以前，伦敦的大臣们在得到英国驻海牙大使约瑟夫·约克爵士的警告，认为对驻扎在港口内的荷兰舰队进行闪电攻击面临很多困难之后，放弃了这个作战计划。不过，毫不奇怪的是，荷兰国会根本不想冒任何风险，两国马上就陷入了敌对状态，荷兰将军队转移到沿海省份并在海岸边建立炮台，从而加强了边境

防御。<sup>81</sup> 法国没有面临入侵威胁，但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军事动员。甚至在1775年，路易沙姆勋爵报告说：“图尔镇一直都充斥着赶赴南特的士兵。”这些士兵到南特之后会继续开赴法属西印度群岛，为的是增强那里的守卫力量，从而更好地抵御英国进攻，或者，路易沙姆暗示说，为的是可以更好地介入美国的战事。<sup>82</sup> 开赴上船地的士兵在港口聚集，这既给当地人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问题。住宿变得紧张起来，价格开始上涨，但当地店主和商人通常都从中获利不少。政府通过雇用商船来运输部队，向当地经济注入了资金。这种好处甚至会流向中立国家。1776年英国政府就雇用了荷兰船只来从莱茵河口运输德国军队。同样，1781年夏天派去占领米诺卡的西班牙远征军和法国军队（一开始只有8000人，到了1782年围攻战结束的时候，总共有超过1.45 万名军官和士兵），则依靠地中海西岸地区——不仅仅是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地区，也包括意大利——供应食品。<sup>83</sup> 兵营对它们所在地区也带来了相似的影响。当1778年春天，法国政府在诺曼底集结了超过3 万名士兵以威慑英国政府不要再派更多的战舰到大西洋彼岸去的时候，当地人看起来很可能体验到了军队存在所带来的不便，特别是偷窃和物价上涨，但也得到了一些好处，特别是以当地物产供应军队的好处。

对于欧洲的非战斗地区来说，最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在经济领域。许多人觉得他们支付了更多的税款。但是，有必须要指出的是，这种感觉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大不列颠，1778年以前，诺斯勋爵仅提高了土地税——这种税只对有产者有影响，以及不少奢侈消费的税——比如对雇用仆人的雇主征税。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会影响到穷人。但在法国和西班牙，情况往往是特权阶级逃避了这种负担，这样这种负担就更多地落

到那些普通人身上了。在法国，政府其实主要是依赖借款来维持战争的。不过，为了支付巨额的债务利息，1781年8月间接税提高了10%——这种间接税主要是针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sup>84</sup> 主要的受益人——这些人是被高达10%的年金保险利息率吸引过来的——则是那些大投资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荷兰共和国（那里的利息率低很多）或者瑞士。[注19](#)受到损害的主要是支付那种与大众消费品（比如盐）相关的税款的人。<sup>85</sup> 西班牙没有赤字财政的传统。由于有中美和南美的金银支撑，西班牙可以用它积累的金银币支付大量的战争债务。但是，从1779年开始，马德里政府不得不放弃了保持预算平衡的做法，举借了大量的款项，其利息率比法国国债的利息率低，但这还是导致有必要对国内加税。国家烟草专卖给政府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从1780年开始，烟草销售收入被专门用来偿债。从1779年开始，烟草税也提高了，尽管这看起来可能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因为消费者削减了烟草消费，或者转向了一些非法的替代品。<sup>86</sup>

远离战争地带的交战国的特定经济领域从这场战争中格外受益。由于扩大海军力量的需求，造船业的发展受到了刺激。实际上，在荷兰共和国加入这场战争之前，荷兰不同省份之间对是扩大陆军还是扩大海军更好一些这一问题就进行过辩论。毫不奇怪，内陆省份倾向于扩大陆军，因为他们担心战火会烧到陆地上来；而严重依赖海外贸易、对英国这个商业和帝国主义对手抱有敌意的沿海省份，则认为应该扩大海军力量。最富有也最为重要的省份荷兰省——它占了全国纳税额的很高比例——坚持要扩大海军。因此，最终荷兰共和国选择了扩大海军。荷兰海军在英荷战争期间大幅扩军。从1781年到1785年，荷兰国会拨款超过

7360 万荷兰盾，用来建造、装配战舰并给战舰配备相应人员。与此相比，从1771~1780年间的拨款只有2070 万荷兰盾。1782年10月，荷兰在建的配备40 到60 门大炮的战舰有16 艘之多。<sup>87</sup> 西班牙政府也集中了相当多的资源用来发展它的海军力量。1770~1779年之间每年5540万里亚尔的海军开支，到了1780~1783年之间扩大到了每年平均9270 万里亚尔。<sup>88</sup> 在1776年，西班牙海军有57 艘主力战舰。而一份未注明日期的“海军情况报告”（这份文件可能是西班牙在1779年加入战争的时候起草的）则显示，主力战舰数量已经上升到了64 艘。<sup>89</sup> 战争中由于被敌人击毁了一些战舰，这样，到了1780年底大概只有48 艘主力战舰在海军服役了。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主力战舰数量又增加到54 艘。<sup>90</sup> 法国在海军扩张方面更加卖力。1776年，海军军费大概有3500 万里弗（大约1500 万英镑），而到了1782年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2 亿里弗之巨（接近9000 万英镑）。<sup>91</sup> 相应的，法国主力战舰的数量也从1778年的52 艘增加到了1782年的73 艘。战舰的建造不仅让造船厂受益——造船厂或许是当时最大的工业企业，同时也给从制绳业和帆布制造业到铸铁厂的一系列相关行业带来了好处。

在所有参战国中，武器制造因为战争而变得兴旺起来。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陆军力量可能维持在和平时期的水平，因此，除了正常武器更替之外并没有带来额外的武器需求。但是更多的战舰意味着对大炮有大量的需求。主力战舰装配有60 到120 门大炮。因此，20 艘大型战舰就意味着至少需要1200 门大炮。从中受益的人有时候也不全是安排这种开销的国家的公民。1779年，西班牙所需的大炮，一部分是从苏格兰卡伦公司和从法国采购的。<sup>92</sup> 在所有参战国家中，由于需要给海军战舰

和武装民船上的士兵提供武器装备，小型武器的销售也增长了。荷兰特别擅长的炸药生产也因战争而受到了刺激。我们也不能忘记，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火药也流到了北美叛军手中。根据英国情报人员搜集的证据，在1776年冬至1777年初，大陆军从法国皇家兵工厂收到了大约200门野战炮和3万支火枪，而1777年夏天则又收到了1.2万支法式火枪。美国的军装部分也是由欧洲盟国供应的。1777年4月，西班牙的“军装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发往了新奥尔良，美国的代理人在那里收货。第二年9月，大陆会议采购了蓝棕相间的法式制服。那些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的国家的生产商也从战争中受了益：普鲁士布料沿着易北河送到了汉堡，从那里运往阿姆斯特丹，并继而运向北美。<sup>93</sup>

食品生产商和零售商也因需求增加了而受益。准备开航的船队需要储备大量的食物，以供船员们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食用。如果船上载有军队，那么，对食物的需求就更大了。海军力量就像城镇一样，他们自己几乎不生产食物（除了在航行中抓捕一些鱼类之外），但消耗量却惊人。科克市由于周边有丰富的内陆农业用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主要食品供应中心，同时也是1776年派往北美的陆军的主要食品供应来源。为了储备食物并控制价格，政府禁止爱尔兰向海外出口食物，这使得本地商人和他们的政治盟友大为光火，他们宣称，这样一来，海外市场将永久地落入到欧洲竞争对手的手中。或许德国和丹麦的肉类生产商确实利用了送到他们面前的好机会，但实施禁运本身并不意味着这种禁运被真的执行了——不同的证据显示，爱尔兰商人此后继续与他们的许多旧的商业伙伴进行贸易，甚至为法国舰队提供食物。与来自法国牧场的肉类相比，法国舰队更偏爱爱尔兰牛肉，因此进行了大量采购。<sup>94</sup>

更多的军事活动，特别是海军活动带来的刺激，需要在这种军事活动给海外贸易带来了损害这种背景下来考虑。在大不列颠，在战争第一阶段，生产商和商人都因为与各个叛乱殖民地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止而遭受了损失。早在1775年7月，英国中部地区的金属加工业受到了冲击，有一个商人就曾说道：“铸铁业受到的损失尤其令人痛心。”<sup>95</sup> 纺织业遭受了更严重的冲击。羊毛出口在1772年占英国向北美大陆殖民地出口的30%左右，而现在美国市场基本上关闭了。在格拉斯哥，1775年进口了重达4600万磅的烟草，第二年这个数字急剧下降到了700万磅，而1777年则降到了微不足道的21万磅。<sup>96</sup> 从更一般的层面上来说，战争提高了所有交战各国进行海上货物运输的成本。这部分是因为与更大的货物损失风险相对应，保险费提高了，但这也是由于海员的工资提高了，因为海军从现有海员中征调了大量人力。实际上，在法国参战之前，美国武装民船就劫掠了大量的英国商船，这主要发生在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之后，当美国武装民船能够利用欧洲盟友的港口进行作战的时候，他们就在离英国更近的海域进行这种劫掠活动了。当其他国家参战之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商船也面临被攻击的危险。荷兰在参战之后的头几个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不仅仅是因为受到了武装民船的攻击，也是因为遭受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攻击。但法国商船则遭受了更为持久的打击：从1778年到1783年，大概有1500艘法国船只遭到扣押。<sup>97</sup>

但如果说在美国发生的这场冲突，对于欧洲交战各国的进出口商和船主来说是一件坏事的话，那么它也为中立国家带来了新的机会。在被拖入战争之前，荷兰人从运输大量的美国海外贸易货物中大幅受益。圣尤斯特歇斯成了一个很大的中转港，美国货物从这里出口到欧洲，欧洲

（包括英国的）货物则从这里出口到美国。1781年占领该岛的海军上将罗德尼认为，这座岛屿所从事的贸易“给英格兰带来的损害，比对所有其他敌人带来的损害都要更大一些”。<sup>98</sup> 而且，荷兰商船还将海军物资——主要是木材、沥青和大麻——从波罗的海运输到法国和西班牙港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至少有一位英国大臣担心，波旁王朝的全部海外贸易可能都会通过荷兰船只进行，这能够让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可以尽可能地从他们各自的商船上征召有经验的海员。<sup>99</sup> 当荷兰被迫在1780年卷入战争之后，获利的机会一下子就消失了，但其他人则立即将荷兰留下的空白填补上了。在1782年，根据一位到访者的观察，韦茅斯（Weymouth）的海外贸易几乎都是通过“中立船只”进行的，很可能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船只。<sup>100</sup> 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在两国正式成为敌对国家之后立即停止了，但看起来英国到荷兰的出口货物以及荷兰到英国的出口货物，不过就是改道到中立的奥属荷兰（大致是今天的比利时）绕了一圈而已。所以，一位到访奥斯坦德（Ostend）的英国人在1782年提到，当地商人担心和平会导致他们的好日子到了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当地商人从临近的荷兰共和国转过来的英国贸易中受益颇丰，因此，他们担心在和平之后贸易很快就会恢复到战前的那种状态。<sup>101</sup>

### 【注释】

1 For the British volunteers, see Stephen Conway, “‘Like the Irish’? Volunteer Corps and Volunteering in Britain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in Julie Flavell and Stephen Conway (eds),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The*

*Impact of War and Warfare in Anglo–America, 1754–1815* (Gainesville, 2004), pp. 143–69; for the Irish volunteers, see above, pp. 100–1.

2 For estimates of the number of slaves who fled from their owners in North America, see Casandra Pybus, ‘Thomas Jefferson’s Faulty Math: The Question of Slave Defection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xxiii (2005), pp. 244–64.

3 Leonard Lundin, *Cockpit of the Revolution: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in New Jersey* (Princeton, 1940). The aptness of the phrase is considered in Mark Edward Lender, ‘The “Cockpit” Reconsidered: Revolutionary New Jersey as a Military Theatre’, in Barbara J. Mitnick (ed.), *New Jerse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NJ, 2005), pp. 45–60.

4 Richard K. Macmaster (ed.), ‘News of the Yorktown Campaign: The Journal of Dr Robert Honyman, April 17–November 25, 1781’,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lxxix (1971), p. 394.

5 West Suffolk Record Office, Bury St Edmunds, Grafton Papers, Ac 423/191, O’Hara to the Duke of Grafton, 20 April 1781.

6 ‘Bamford’s Diary: The Revolutionary Diary of a British Officer’, *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xxvii (1932), p. 301.

7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 Kew,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91/26, George Augustus Eliott to Lord Weymouth, 8 January 1780.

8 Centre for Buckinghamshire Studies, Aylesbury, Howard –Vyse



Deposit, D/HV B10/8, 13.

9 British Library (BL), London, Egerton MS 2659, fo. 186.

10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New York City, Joseph Reed Papers, Journal of John Miller, 25 September 1777.

11 TNA, Audit Office Papers, Loyalist Claims Commission, AO 12/50, fo. 78.

12 BL, Diary of Lieutenant William Digby of the 53rd Foot, Add. MS 32,413, fo. 64.

13 Ibid., Liverpool Papers, Add. 38,405, fo. 125, Sir Eyre Coote to Charles Jenkinson, 1 December 1780.

14 J.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39 vols, Washington, DC, 1931–44), xv. p. 189.

15 Their activities are vividly described in Wayne E. Lee, *Barbarians and Brothers: Anglo–American Warfare, 1500–1865* (Oxford, 2011), Chapter 8.

16 TNA, Cornwallis Papers, PRO 30/11/64, fo. 92.

17 Ibid.,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5, fo. 39.

18 Ibid., CO 5/98, fo. 122.

19 E.L. Pierce (ed.), ‘The Diary of John Row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2nd series, x (1895–6), p. 97.

20 John W. Jackson, *With the British Army in Philadelphia, 1777–1778* (San Rafael, CA, 1979), pp. 266–7.

21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182, fo. 157–62.

22 Varnum Lansing Collins (ed.), *A Brief Narrative of the Ravages of the British and Hessians at Princeton in 1776–77* (Princeton, 1906), p. 13.

23 TNA, Audit Office Papers, Loyalist Claims Commission, AO 12/13, fo. 91.

24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Chester County Miscellaneous Papers, Depredation Claims, account sworn by James Davis, elder of the church, 18 November 1782.

25 Ballindalloch Castle, Grantown on Spey, Macpherson Grant of Ballindalloch Papers, Bundle 393, ‘Inventory of Articles found in the Possession of Josh Anderson Private Soldier in 15th Regiment of Foot’.

26 BL, Log-book of a member of Gen. Robert Boyd’s staff, Add. MS 38, 605, fo. 3.

27 Ibid., Haldimand Papers, Add. MS 21,760, fos. 78–9.

28 New York State Library, Albany, Israel Keith Papers, Israel Keith to Cyrus Keith, 4 January 1777.

29 R.K. Showman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 (13 vols, Chapel Hill, 1976–2005), i. p. 375.

30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71/82, pp. 412–25;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Great Britain Order-book, 1 October 1776.

31 Don Higginbotham (ed.), *The Papers of James Iredell* (2 vols, Raleigh, NC, 1976), ii. p. 225.

32 Elizabeth A. Fenn, *Pox Americana: The Great Smallpox Epidemic of 1775–82* (New York, 2001).

33 Donald Wallace White, *A Village at War: Chatham, New Jerse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utherford, NJ, 1979), pp. 239–41 (Appendix B, table 9).

34 John Shy,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6), p. 171.

35 Mary Beth Norton, *Liberty's Daughters: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 1750–1800* (Boston, 1980), p. 215.

36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Dering Family Papers, vol I, Sarah Thomas to Sylvester Dering, 11 March 1779.

37 Ben Baack, 'Forging a Nation State: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iv (2001), p. 654 (Table 1).

38 Ann Bezanson, *Prices and Inflation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ennsylvania, 1770–1790* (Philadelphia, 1951), p. 14.

39 Harry M. Ward,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London, 1999), p. 40.

40 James A. Henretta,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Collected Essays* (Boston, 1991), p. 241;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especially pp. 6–7, 248.

41 Bernard A. Uhlendorf (ed.), *Revolution in America: Confidential Letters and Journals, 1776–1784 of Adjutant-General Major Baurmeister of the Hessian Forces* (New Brunswick, NJ, 1957), p. 237.

42 K.G.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0–1783: Colonial Office Series* (21 vols, Shannon, 1972–81), xviii. p. 171.

43 Howard C. Rice and Anne S.K. Brown (ed. and trans), *The American Campaigns of Rochambeau's Army* (2 vols, Princeton, 1972), i. p. 48.

44 T.I. Wharton (ed.), 'Memoir of William Rawle', *Memoir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iv (1840), p. 43.

45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Woolwich, MS 9, vol II, p. 117.

46 E. G. Schaukirk, 'Occupation of New York City by the British',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x (1886), p. 423.

47 See, for example,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60/32, 'Return of Wood to be furnished', 22–24 November 1781, and 'list of the Inhabitants Who has not furnished the Quantity of Wood', n.d.

48 Ibid., WO 71/90, pp. 410–16.

49 The name gained currency at least partly because the flies caused similar devastation to the Hessians: see Philip J. Pauly, 'Fighting

theHessian Fly: American and British responses to Insect Invasion, 1776–1789’, *Environmental History*, vii (2002), pp. 485–507.

50 Alnwick Castle, Northumberland, Percy Papers, vol xlix, Part A, p. 13;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4, fo. 416, Address of the Inhabitants of Newport.

51 TNA, British Army Headquarters Papers, PRO 30/55/18, 2214 (6).

52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MS 9, vol II, p. 117.

53 Jackson, *With the British Army in Philadelphia*, p. 83.

54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Faulkner Papers, Day-book, 1774–88, and Accountbook, 1773–90.

55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Clifford Papers, vol 5, Thomas Clifford Jr, to Thomas Franks, 27 December 1777.

56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Stowe Collection, Brydges Papers, STB Box 26, John Pool to Anna Eliza Elletson, 27 March 1777. See also, for the impact of martial law, Pool to the Duchess of Chandos, 12 September 1779, Edward East to the Duchess of Chandos, 11 September 1779, 11 May 1782.

57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Aberystwyth, Nassau Senior Papers, E 36, Thomas Yea to Robert George Bruce, 24 December 1778.

58 Stephen Conway,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2000), p. 70.

59 Ibid., pp. 233–8, for the campaign for ‘economical reform’.

60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Edinburgh, William Wilson Papers, MS 9672, Daybook, 1771–80.

61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Northern Ireland, Belfast, Greer Papers, D 1044/552, 572.

62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1/1007, p. 789.

63 Ibid., WO 1/1004, p. 395.

64 Ibid., WO 1/1007, p. 259.

65 See Stephen Conway, ‘Locality, Metropolis, and Nation: The Impact of the Military Camps in England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History*, lxxxii (1997), pp. 547–62.

66 Kenneth Morgan (ed.), *An American Quaker in the British Isles: The Travel Journals of Jabez Maud Fisher* (Oxford, 1992), p. 229.

67 See James E. Bradley,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England* (Macon, GA, 1986), and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English Radicalism* (Cambridge, 1990), Chapter 9.

68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xxxv. p. 405 (27 October 1775).

69 Conway,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pp. 131, 288.

70 For the Church of England, see Paul Langford, ‘The English Clerg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Eckhart Hellmuth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England and German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0), pp. 338–72.

71 City Archives, Sheffield, Rockingham MSS, R 1/1569.

72 For Presbyterian 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 see R. J. Dickson, *Ulster Emigration to Colonial America, 1718–1775*, 2nd ed (Omaha, 1988).

73 Catherine Coogan Ward and Robert E. Ward (eds), *The Letters of Charles O'Connor of Belanagare* (2 vols, Ann Arbor, MI, 1980), ii. pp. 110, 114. See also, for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situation, Vincent Morley, *Irish Opin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0–1783* (Cambridge, 2002).

74 See Mrs Gillespie Smyth (ed.),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 . . of Sir Robert Murray Keith* (2 vols, London, 1849), ii. pp. 60–1.

75 *Gentleman's Magazine*, xlv (1775), p. 396, and xlvi (1776), p. 228.

76 Bob Harri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Press: Britain and France, 1620–1800* (London, 1996), p. 58.

77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HMC), *The Manuscripts of the Earl of Dartmouth* (3 vols., London, 1887–96), iii. pp. 221–22.

78 Staffordshire Record Office, Stafford, Congreve Papers, D1057/M/F/26.

79 Brian Fitzgerald (ed.), *Correspondence of Emily, Duchess of Leinster* (3 vols, Dublin, 1949–57), iii. p. 226.

80 Phyllis Hembry (ed.), *Calendar of Bradford-on-Avon Settlement Examinations and removal Orders, 1725–1798* (Wiltshire Records Society, xlvii, Trowbridge, 1990), p. 43.

81 Victor Enthoven, ‘Dutch Maritime Strategy’, in Donald Stoker, Kenneth J. Hagan and Michael T. McMaster (eds),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London, 2010), pp. 187, 189.

82 HMC, *Manuscripts of the Earl of Dartmouth*, iii. p. 222.

83 See Rafael Torres Sánchez, ‘Monopoly or the Free Market: Two Ways of Tackling the Expenditure: The Expedition to Minorca (1781–1782)’, in Stephen Conway and Rafael Torres Sánchez (ed.), *The Spending of States: Military Expenditure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atterns, Organization, and Consequences, 1650–1815* (Saarbrücken, 2011), pp. 313–38.

84 Robert D. Harris, ‘French Finances and the American War, 1777–178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lviii (1976), p. 247.

85 For problems with the structure of French public debt, see James B. Collins,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Cambridge, 1995), p. 236.

86 See Rafael Torres Sánchez, ‘Public Finances and Tobacco in Spain for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in H.V. Bowen and A. González Enciso (eds), *Mobilising Resources for War: Britain and Spain at Work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amplona, 2006), pp. 191–224.

87 Enthoven, ‘Dutch Maritime Strategy’, especially Table 9.3 and



## Appendix 9.1.

88 José Jurado-Sánchez, 'The Spanish National Budget in a Century of War: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ng the Army and Nav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Rafael Torres Sánchez (ed.), *War, State, and Development: Fiscal-Military Stat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mplona, 2007), p. 228 (Appendix).

89 BL, Miscellaneou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Spanish Navy, 1740–82, Add. MS 20, 962, fo. 324.

90 Figures derived from Jonathan R. Dull,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75), pp. 359–76.

91 Ibid., pp. 349, 359–76.

92 Agustín González Enciso, 'Buying Cannon Outside: When, Why, How Many? The Supplying of Foreign Iron Cannons for the Spanish Nav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Richard Harding and Sergio Solbes Ferri (eds), *The Contractor St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1659–1815*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2012), pp. 135–57.

93 Huntington Library, Intelligence, enclosed in Lord North to Admiral Lord Howe, 28 October 1777, HM 25799, pp. 3–5.

94 See, for example, BL, Bowood MSS, B1, fo. 15, Francis Baring to the Earl of Shelburne, 15 November 1782.

95 Dr Williams' Library, London, Wodrow–Kenrick Correspondence,

MS24157 (51).

96 M.L. Robertson, 'Scottish Commerce and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ix (1956–7), p. 123.

97 David J. Starkey, *British Privateering Enterpri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xeter, 1990), p. 217 (Table 23).

98 G.R. Barnes and J.H Owen (eds), *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 Earl of Sandwich* (4 vols, Navy Records Society, London, 1932–8), iv. p. 148.

99 See above, p. 109.

100 C. Bruyn Andrews (ed.), *The Torrington Diaries* (4 vols, London, 1934–8), i. p. 94.

101 Leicestershire Record Office, Turville Constable Maxwell MSS, p. 1122.

## 第五章 战争结局及解析

这场战争是如何结束的？为什么英国失去了13个殖民地但却成功保住了庞大帝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在前面章节中已经作出了部分回答，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更为系统地考虑一下这些问题。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和平谈判的情况，这既包括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也包括英国和欧洲敌国之间的。<sup>1</sup> 第二部分则讨论的则是更大范围的问题：为什么战争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为什么英国失去了北美殖民地，但却在范围更大的战争的后期阶段坚持住了，甚至还占了上风？



在1782年春天，罗金汉侯爵的新内阁决心结束与美国的战争，但大臣们对于如何才能结束这场战争有不同的意见。自从1775年以来一直反对与美国进行战争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成为外交大臣，这是新内阁创设的一个新职位。福克斯希望尽快与大陆会议达成协议，以便可以将英国的资源集中用于与波旁王朝和荷兰的战争上。<sup>2</sup> 为了这个目标，他愿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并接受它独立。但他的同僚、担任内政和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谢尔本伯爵则认为，与美国人的谈判是他的职责范围，因为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被英国政府承认，因此，美国人还是属于受他管理的叛乱分子。

在这场奇特的权利斗争背后体现的是一种重要的分歧，不仅仅是方

法上的分歧，还有目标上的分歧。与福克斯不同，在与英国的欧洲敌国达成一项全面的和解协议之前，谢尔本伯爵不愿意承认美国独立。他甚至希望最后没有必要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在英国和美国之间确立某种政治联系，从而将英国的大西洋帝国从废墟中拯救出来。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建立一种联邦体制的想法看起来肯定是讨论过的，尽管美国那边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种提议。<sup>3</sup> 但谢尔本伯爵也比福克斯更为关注英国的欧洲地位问题。他希望与法国达成一项全面的和解，这样为英法共识和合作铺平道路，在这种共识和合作下，两国将共同对付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这几个正在兴起的东欧强国。他认为这些国家对欧洲的权力平衡造成了最大的威胁。

福克斯和谢尔本伯爵之间的争斗，导致他们每个人都派了单独的代表参加巴黎和谈。谢尔本伯爵甚至在诺斯勋爵的内阁倒台之前就一直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保持着联系。新政府甫一成立，谢尔本伯爵就立即派理查德·奥斯瓦尔德，一位富有的苏格兰商人，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去充当他的谈判代表。而作为回应，决心不放弃自己立场的福克斯则派了托马斯·格伦威尔（Thomas Grenville），一位支持政府立场的议员，来代表他发声。富兰克林认识奥斯瓦尔德，因此很愿意和他交谈。“富兰克林医生对我很友好。”奥斯瓦尔德向谢尔本伯爵汇报说。而富兰克林自己也告诉谢尔本伯爵，他认为奥斯瓦尔德是“一个睿智而诚实的人”，他愿意与他打交道。<sup>4</sup> 相反，格伦威尔则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不论是在富兰克林这里（富兰克林只想和奥斯瓦尔德打交道），还是在韦尔热讷伯爵这里，都是如此。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对于格伦威尔提出的英法之间的谈判应该以1763年和平协议为基础的提法尤其不感冒。法国政

府非常不满地认为，福克斯根本没有认识到英国的地位已经被大大削弱了。<sup>5</sup> 福克斯在内阁是一个少数派，国王也很不支持他。即使如此，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直到1782年7月罗金汉侯爵意外辞世、谢尔本伯爵成为内阁首脑为止。那时，福克斯辞职了，格伦威尔也从巴黎打道回府，这样谢尔本伯爵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自由行事了。

谢尔本伯爵倾向于认为如果慷慨对待北美前殖民地的话，会削弱美国 and 法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像大部分英国政治家一样，他继续认为美国人从本能上是反对信奉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波旁王朝的，而尽管发生了这场战争，他们还是更倾向于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而富兰克林这边则鼓励奥斯瓦尔德说，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慷慨会给英国带来好处的，因为一旦法国和西班牙了解到英国和美国马上就要达成协议的话，它们也会很快与英国达成协议。富兰克林甚至还走得有些太远了，说英国可以将加拿大割让给美国。但总而言之，谢尔本伯爵愿意作出重大让步。然而，当富兰克林生病之后，和谈就停滞了。取代他担任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约翰·杰伊，对奥斯瓦尔德就没有那么大的好感了。奥斯瓦尔德发现，杰伊非常蛮横，不愿意向英国人作出任何让步。杰伊甚至在奥斯瓦尔德是否获得合法授权这个问题上给他制造了难堪。富兰克林重新回来参加谈判之后，与英国尽早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的前景才又重新浮现出来了。然而，保皇派人士的问题是一个双方争议很大的问题。富兰克林敦促奥斯瓦尔德不要提出任何赔偿要求，理由是：“这些保皇派人士任意焚烧和破坏农屋、村庄和城镇，对我们的财产也造成了无尽的伤害。”<sup>6</sup> 如果英国政府坚持要为保皇派人士争取赔偿的话，富兰克林继续说道，那么，大陆会议就会针锋相对地要求英国就英军和保皇派部队在战争

中扣押或破坏的财产作出赔偿。直到1782年11月，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前的两周，奥斯瓦尔德还试图说服美国代表团给保皇派人士适当的补偿，但美国代表团再一次拒绝了。像之前一样，他们的回答是，英国人进行了掠夺活动，例如，7月份从萨瓦纳撤离的英军就带走了从奴隶主那里逃出来的大量的奴隶。<sup>7</sup> 最终，英国和美国代表团于11月30日达成了协议。这些他们所称的初步条款是临时条款，后续要签订一项正式的全面和平协议。但这些初步条款最后并没有改变。英国政府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并同意从查尔斯顿和纽约撤军。美利坚合众国得到的领土范围比大陆会议所能合理预想到的要多很多。依旧对英美战后和解抱有希望、同时希望在美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插入一个楔子的谢尔本伯爵，放弃了五大湖和俄亥俄之间的土地。美国人甚至被允许在纽芬兰岛海域捕鱼。作为交换，英国谈判代表团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美国人承认他们的债务，并承诺大陆会议会建议各州发还英国公民和保皇派人士的财产。奥斯瓦尔德那个时候一定清楚各州积极响应这种建议的可能性一定是微乎其微的。

当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谈判的时候，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谈判也在进行。韦尔热讷伯爵希望尽可能将1763年的和平协议反转过来，因此，他对于福克斯通过格伦威尔提出来的这种立场——即七年战争结束后缔结的和平协议应该是双方进行谈判的基础——感到不可思议。1782年7月，韦尔热讷伯爵告诉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蒙莫兰（Montmorin），说他希望“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并“根据公正和对双方有利的原则”达成一项全新的协议。<sup>8</sup> 在桑特海峡战役中被捕并被关押在英格兰的德·格拉斯，在1782年8月和谢尔本伯爵谈到了未来和平的框架会是什么样子。

他向韦尔热讷伯爵汇报的情况，让这位法国外交大臣相信，英国至少准备在某些方面靠近法国的目标。韦尔热讷伯爵的副手杰拉德·德·雷纳沃尔（Gérard de Rayneval）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与谢尔本伯爵直接会谈。但是在9月13日的会议中，谢尔本伯爵看起来不像格拉斯汇报的那样愿意进行妥协。在印度问题上，他向雷纳沃尔解释说，“1763年确立的情况必须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不要指望国王会同时放弃两个大陆”。<sup>9</sup> 从更积极的一面来说，谢尔本伯爵暗示，如果英法两国可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那么，两国可以成为欧洲共同的主宰。

尽管韦尔热讷伯爵不喜欢谢尔本伯爵那种不愿意在印度问题上作任何让步的顽固姿态，但他对于谢尔本伯爵提到的英法合作来主宰欧洲的想法还是很认同的。韦尔热讷伯爵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权力平衡的一个威胁：奥地利和俄罗斯在1781年6月缔结的联盟，让他相信凯瑟琳大帝马上就会发动另一场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奥斯曼帝国是法国的长期盟友。1782年9月末，韦尔热讷伯爵发现俄罗斯确实在为战争做着准备（当时韦尔热讷伯爵刚刚了解雷纳沃尔和谢尔本伯爵会谈的情况）。其他一些事件使得他更愿意向英国的立场靠近。罗德尼在桑特海峡战役中的胜利，是皇家海军依旧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象征。法国的公共债务也是一个因素。这场战争的代价非常高昂。两年以来，内克一直在说，法国无法承受战争继续拖延下去的后果。

如果说韦尔热讷伯爵现在更愿意妥协的话，西班牙则在没有获得直布罗陀的情况下不愿意结束战争。虽然1782年9月对直布罗陀的围城战失败了，西班牙政府还继续希望将直布罗陀要回来。在法国参加和谈的西班牙大臣阿兰达伯爵（Conde de Aranda）甚至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土地

交换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阿兰达的计划，法国可以获得圣多明各（这样法国就获得了整个海地岛），前提是法国将它的另一块海外领地让给英国，进而英国可以将直布罗陀交还给西班牙。谢尔本伯爵曾短暂考虑过放弃直布罗陀，以便可以从西班牙甚至法国那里获得一些让步。但这样的土地交换最后变得没有必要了，因为在1782年12月，在英美初步协议签署之后，西班牙认为它要回直布罗陀的机会变得很渺茫了，因此，就放弃了这个要求。

荷兰则坚持得更久一些，但最终他们的抵制也被消磨掉了。荷兰派驻巴黎的谈判代表杰拉德·布兰特森（Gerard Brantsen）得到的指示是不要作出任何让步。考虑到荷兰在战争中的糟糕表现，他提出的要求是完全不现实的。荷兰国会希望被英国占领的所有土地和贸易基地都被返还给荷兰，英国应承认中立船主的权利，并就荷兰在海上遭受的损失向荷兰进行赔偿。韦尔热讷伯爵将这些要求接过来，代表荷兰进行谈判，最终成功地让英国同意将亨可马里交还给荷兰，但他无法说服英国政府放弃奈伽帕塔姆。荷兰最后在1783年1月20日同意停战，而几天之后其他各国都接受了初步协议。直至1784年5月20日，荷兰才在最终协议上签字。荷兰代表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协议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不仅保留了奈伽帕塔姆，而且也获得了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权利。

美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在1783年9月3日签署的最终和平协议，确认了初步协议中同意的全部事情。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承认，其疆域也比任何美国人在1776年7月，甚至在约克镇战役后所能预想的要大很多。法国在印度问题上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东



西，但他们在印度次大陆上的贸易站都被英国返还了，他们重新得到了圣卢西亚，保留了多巴哥，重新获得了塞内加尔，获得了在纽芬兰岛海域捕鱼的更好的权利，以及在敦刻尔克构筑防御工事的权利（1763年他们的这个要求被拒绝了）。而西班牙虽然没有获得直布罗陀，但佛罗里达和米诺卡也算是可以接受的安慰奖励。英国，原来发动战争是希望保留北美大陆的殖民地，则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殖民地成了独立国家。但是乔治三世的帝国并没有完全解体。英国继续保有着加勒比地区的大部分领地，并抵制住了法国要求它在印度问题上让步的压力，而且，通过继续占有位于奈伽帕塔姆的原荷兰基地，英国强化了自己在印度的地位。



不论是从什么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在战争头几年于美国开战的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英国都应能够扑灭殖民地叛乱，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传统的解释倾向于强调美国人的革命热情、他们更高超的战术技巧、华盛顿的英明领导，以及英军的无能和不适应。所有这些解释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令人满意，而且，即使全部综合起来看，它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抵挡住英国并最终赢得独立。

美国人在战争初期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围攻盖奇将军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军的美国民兵，确实是出于保卫自己的社区不受英军侵犯的愿望才来参与围攻的。在这个阶段，一种真诚的愤怒情绪似乎占据了殖民地人的心胸。他们努力训练，计划打到更南方的地区以及新英格兰去。<sup>10</sup>但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热情就是成功的保障。当《独立宣言》在纽约向大陆军将士们宣读的时候，确实引发了欢呼，但美国人随后在长岛战役中的表现，很难证明狂热可以取代专业的战斗。实际上，当得到豪将军

取胜的消息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沮丧地玩味着这样一句话：“这样一个令人感伤的定理……不论是受什么原则激发起来的人，都无法成功抵挡军事镇压。”<sup>11</sup> 我们还应该看到，到了美国战争的后期，对于战争的厌烦情绪比对于独立的热情支持似乎要更加明显一些。在弗吉尼亚，独立战争的摇篮之一，英军在1779年、1780年甚至1781年几乎都没有遭到什么像样的本地人的抵抗。最后那一次，本杰明·吉尔伯特

（Benjamin Gilbert），一位在弗吉尼亚服役的来自马萨诸塞的士兵对他所见所闻感到很沮丧。“在弗吉尼亚这个地方，要找到一个忠实于自己国家的朋友真是很难，”他这么写道，“就和要在马萨诸塞湾找到一个亲英分子一样难。”<sup>12</sup> 来自弗吉尼亚的军官约翰·巴纳斯特（John Bannister）则一点也不奇怪地对这种情况显得更加宽容（“人们都厌倦了战争，都是极不情愿上战场的。”）。<sup>13</sup> 但他的这种判断，同样对以美国人的革命热情来解释英国失败的思路提出了疑问。

我们同样也不能夸大美国人所使用的后来被称作“游击战”的战术的作用。民兵确实在战争的不同时期对英军搞了一些突然袭击。或许，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战争爆发当时英国人从康科德撤退的时候，以及1776年冬至1777年初在新泽西与1780年在南卡罗来纳内陆地区作战的时候。英军军官自己的话也证明这种非常规作战让英军感到沮丧，士气受了打击，但我们不能就此推定这是叛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更不能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叛军就是靠这种作战方式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意识到这种“游击战”战术有它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同样也非常注意对战争的进展保持控制。<sup>14</sup> 华盛顿个人秉性以及后天养成的习惯都是偏保守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大陆军是一支像英军一样开展传统

作战的军事力量。随着战局的进展，他的建立一支欧洲式的军队的想法几乎都要实现了。到了1779年末，华盛顿在1775年夏天接手的新英格兰民兵部队（他很不喜欢这支部队）已经成为一支更为专业化的部队了：士兵们穿着新的制服，并接受着普鲁士教官冯·施杜本的欧式训练。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许多美军士兵都演变成了欧洲军队中的那种士兵了：他们是不同比例地从最底层人之中被选拔出来的。大陆军士兵贫穷出身的一个表现是有大量的士兵是黑人，特别是在大陆军的北方军中就更是如此。法国军队中的一位德国军官在1781年于纽约的白原市看到了大陆军，他写道：“他们之中有四分之一都是黑人。”<sup>15</sup>从军事角度而言，这样一批人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由于他们贫穷，这促使他们愿意多次应征入伍，这意味着美国的士兵变得越来越有经验，不再是那种每年都只是新兵加入的情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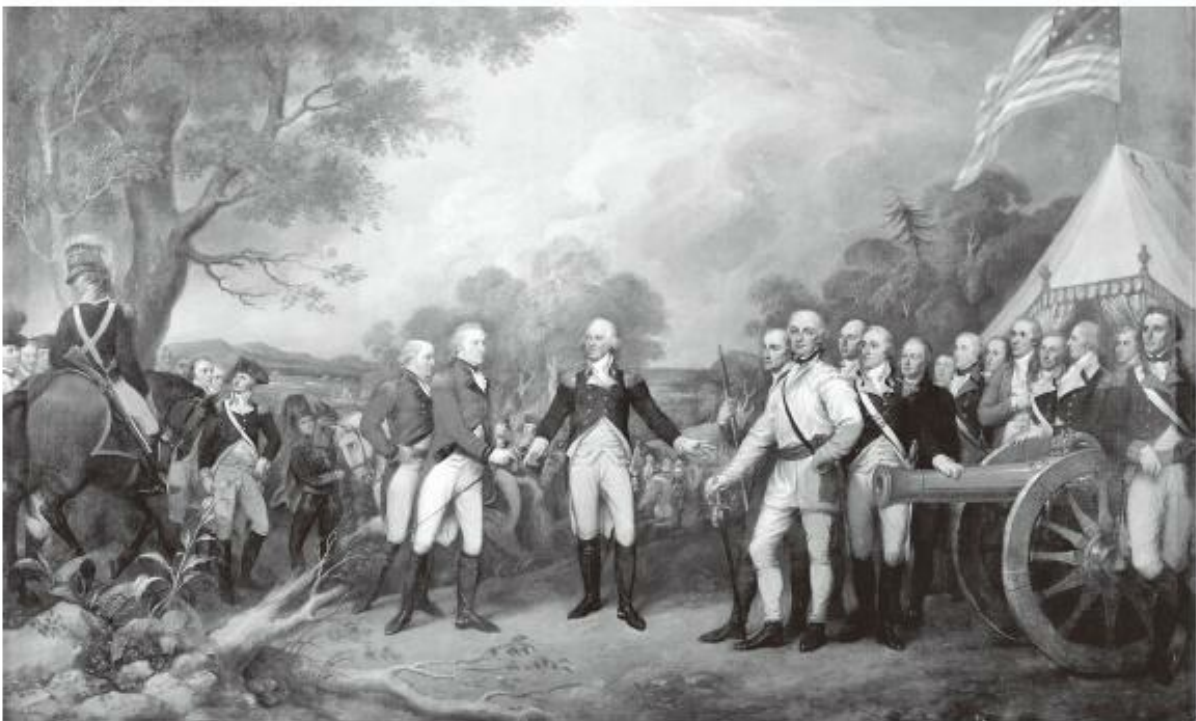


图5-1 图为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一幅画作。

否认华盛顿在美利坚合众国得以存活下来方面的作用是极为不恰当的。1776年12月他在特伦顿战役中大胆的反攻，甚至可能挽救了美国的革命事业。人们对他的崇拜甚至神化远远超出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范围。对于许多欧洲人，包括许多英国人而言，他给了美国革命一个令人值得尊敬的面目。<sup>16</sup> 甚至不承认华盛顿与自己棋逢对手的豪将军，也是以华盛顿是和自己同等的专业军事将领的方式来同华盛顿对话的。但华盛顿的军事领导能力很容易被夸大。他在1776年的纽约战役中被全面击败，在长岛战役中损失惨重，第二年又在宾夕法尼亚的布兰迪维因小溪战役中遭遇失败。他参与的大部分战斗都失败了，或者至少没有取胜。1778年，一些大陆会议代表认真地考虑过用在萨拉托加取胜的盖茨将军来取代他。华盛顿的真正成就是，让他的军队继续保留在战场上进行战斗。他代表了美国人在挫折和失败面前继续坚持到底的精神，他的军队成了美国反抗精神的象征，或者，按照他的同僚、来自罗德岛的纳撒内尔·格林的话来说，是“美国自由的持久耐力”的所在。<sup>17</sup> 只要大陆军活下来了，可以在第二天投入另一场战斗，美国人的事业就存活下来了。华盛顿的个人偏好是展开攻势并快速地解决战斗，但他最终只能选择尽量避免战斗，使得他的对手没有机会以对大陆军进行致命一击的方式来结束这场冲突。他在1779年不愿意与克林顿将军正面交战，使得这位英国指挥官走向了歧路。<sup>18</sup>

但英军也远非那种根本不适合于赢得美国这场战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英军汇集了贵族秩序的所有的恶，而美军则是他们所在的热爱自由的社会的象征。如果说许多英军高级军官确实是贵族的话，这也并

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一无是处的纨绔子弟。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的军事职责是非常认真的，并且在掌握专业作战技能方面可谓兢兢业业。威廉·豪，虽然是一位子爵的弟弟，之所以赢得英国在美国的军事行动的指挥权，至少部分是因为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在美国服役，而且有轻步兵战术经验。<sup>19</sup> 康华里，作为伯爵，是一位大胆的指挥官，他让自己和他手下的军队全力以赴。而克林顿，作为一位伯爵的孙子，尽管因为看起来无所作为而广受批评，但有时候的表现也非常勇敢，而且对北美战事的战略现实有清晰的把握。他们带领的士兵尽管经常受到严厉的处罚，但并不仅仅是因为担心受到这种处罚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像豪、克林顿和康华里这样的将领，诉诸的是士兵们人性的良好一面，甚至是士兵们对这场战争的政治影响的理解。我们所能掌握的少量证言显示，至少其中一些人并不仅仅是出于恐惧或为了金钱，而也是出于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才参的战。如果说历史学家夸大了反叛的殖民地人民的革命狂热的话，他们同样也低估了他们的对手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

而且，英军很快出色地适应了美国的情况，至少同他们在七年战争中做得一样好。不仅军服被调整了，战术也发生了变化。早在1775年春天，轻步兵就已经习惯了趴在地上开火和装火药了。<sup>20</sup> 在战争的前几年，军队的其他兵种也在相同的作战方法上获得了经验。英军的用小股部队开展快速冲击战的技术，在1778年12月给驻守在圣卢西亚挤成一团的法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这显示英军在北美两年多的作战经历中，已经学会了使用更为松散的阵型，并学会了运用轻步兵战术。1781年7月，在弗吉尼亚的绿泉——这是英军在美国进行的最后几场战斗之一——英军甚至和他们的大陆军对手掉了个个，大陆军那个时候采取的是

欧式的紧密阵型，他们受到了躲在暗处的英军的猛烈火力的打击。<sup>21</sup>

如果说英军未能在美国赢得战争不是因为美军极高的士气、领导力或者战术，那么到底原因何在呢？在战争开始之前，正如我们看到的，伦敦的大臣们认为新英格兰是反抗的核心地区。他们将主要军力都集中在马萨诸塞，希望可以既震慑马萨诸塞，又震慑其周边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但是，经过了头几个月的战斗之后，英军被围困在波士顿，这让大臣们和高级将领们不再考虑继续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作战，而是转而考虑如何将这个地区与其他反叛各州分割开来。

或许，如果英国政府当初更好地利用了新英格兰地区——这个地区主要是清教徒，也有民主传统，同在宗教上更加等级森严、社会阶层更加固化的南方各州之间的真正区别开来的话，反叛可能就瓦解了，至少也可能被控制住了。但英国政府并没有作出任何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强化这种差别。杰曼过于执着于最新出现的（而且可能更加表面化的）叛乱分子和保皇分子的分类，而这种分类被证明很难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sup>22</sup>

事实上，尽管新英格兰在战前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行径的主要力量，在1775年的时候叛乱是普遍发生的，但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地理中心。反叛殖民地没有欧洲意义上的首都。由于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英国政府而走到一起的，没有团结统一的传统，因此，没有哪个美国城市可以担当起“首都”的职能。费城虽然是大陆会议所在地和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无法与欧洲各国的首都相提并论。这意味着豪将军率领的军队在1777年占领费城的给美军士气带来的打击是有限的。英军占领诸如纽约和查尔斯顿这样的一些大城市所造成的心理打击，同样也无法和诸如维

也纳或柏林这样的欧洲城市被占领时相比。反叛殖民地主要还是农村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散居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的。

许多地区军队是很难进入的。诸如特拉华河谷这样的地方，进入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这些地方很平坦，有已经建成的道路网络，一直以来都在被开发。弗吉尼亚也容易进攻，因为可以航行的河流很多，交错纵横，这可以让英军抵达很多内陆的地区。而新英格兰的内陆地区则整个来说都是难以开展军事作战的。按照一位英军军官的说法，这个地方“森林茂密，丘陵起伏”，是非常难进入的。<sup>23</sup>更为困难的是上纽约的森林地带。伯戈因的军队在1777年夏天曾试图穿越这一地带。那里有道路，但一旦英军和德军离开了原定路线，就必须通过砍倒树木来打通新的道路。难怪伯戈因的军队行进得如此缓慢。

对于英军来说，北美作战区域的庞大规模也是一个问题。这个战区比英军在低地国家甚至德国西部地区作战时的传统作战区域要大很多。18世纪40年代，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在奥属荷兰作战的英军的整个作战区域位于法国和荷兰边界中间，横跨还不到80英里。英军1758～1762年在德国西北地区作战的时候，作战区域则要大很多——从北部的不来梅一直到南部的法兰克福附近，南北横跨约200英里。但在1779年，亨利·克林顿爵士指挥的军队则十分分散地散布在从现在缅因州的佩诺布斯科特到佐治亚州的萨瓦纳的广大地域内，两个地方之间的直线距离达到了约1200英里，要协调中间被大片叛乱土地分割的英军的作战行动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伯戈因在1777年从加拿大开始的远征行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如果说北美的幅员辽阔给英军造成了困难的话，帝国中心和殖民地

之间的距离则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通讯通常都很慢。从波士顿出发，一艘帆船需要5到7周才可以抵达英格兰，而返程则需要花大概4到5周。从英格兰出发到切萨皮克则需要9周的时间，而从切萨皮克到英格兰则大概需要6周。<sup>24</sup>正如杰曼意识到的，要在伦敦对这场战争进行微观指导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在为这场战争确定大的战略方面，也因为大臣们离北美战场过于遥远而受到了不利影响。杰曼在1777年的时候未能协调好相关作战计划——当时豪基本上是让伯戈因自己单独作战——主要是因为沟通不畅所致。这种沟通不畅，部分可能是因为杰曼不愿意过于强加自己的意志，但至少同样也是因为相关指令要抵达现场的指挥官那里耗时太久之故。豪直到8月末才对杰曼要求他及时完成宾夕法尼亚的战役以便助伯戈因一臂之力的请求作出回复。而杰曼了解到豪不大可能能够遵守他的指令的时候，已经又过去数周了。而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无法再作出什么补救措施了。<sup>25</sup>

大西洋还给英国人造成了其他困难。当他们七年战争期间在北美作战的时候，英军可以依赖当地的物资供应；而相反，在独立战争中，英军却要仰仗从3000英里之外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运输过来的食品和其他关键物资。1776年，豪对他的军队所获得的后勤支持是很满意的，在那年年末，他说他的军队从来没有发生过食物短缺。<sup>26</sup>但从遥远的母国跨越大西洋为这支军队供应物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每年都需要费力地组织相应必备物资并将它们运输过去。时不时地，由于英军控制了北美足够多的地方，对这种漫长的大西洋供应线的依赖程度因此降低了，但没有哪个英国指挥官能够完全仰仗当地资源。跨越大西洋也总是风险重重，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美国武装民船经常扣押英军物资供应



船只，而在法国也加入战争之后，英军的生命线经常处在危险之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物资供应的担忧阻碍了克林顿发起进攻行动。<sup>27</sup>

北美的英军也离自己的主要支援部队相距太远。同样，这和七年战争中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一场战争中，英军可以征召当地人力来强化它的力量。在独立战争中，印第安人和一些殖民者确实应召为英军提供了帮助，但皇家军队的主要力量还是来自欧洲。在七年战争最高峰的时候，当地征召的士兵占了与法军作战的英军部队的约一半。而在独立战争中，当地人从来没有达到过三分之一的水平。正规军每发生一个减员，都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补上，比叛军补充兵员的时间要长很多，因为叛军是在自己的家乡作战。正如法军中一位德国军官所指出的：“美国人一天中损失了600人，但8天之后，又有1200人入伍，而英军要补充10人的兵员都是一件费力的事情。”<sup>28</sup> 避免英军发生重大伤亡的必要性，可能比受到威胁的跨大西洋运输线更大程度地妨碍了高级军官的作战行动。这也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豪将军看起来总是不愿意开展决战。或许他是想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这会让恢复和平的努力更加困难。<sup>29</sup> 如果说这种政治考量促使他不愿意过于激进的话，看起来非常有可能的是，保存军事力量至少也是他这么做的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英军在战争的头几年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国王没有同意招募新的军团，而这种方式是快速扩大英军规模的一个好方式；相反，国王更倾向于雇用可以在1776年立即投入战斗的德国军队。虽然华盛顿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开展了反攻，使得英军开展进一

步的作战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还是决定雇用更多的德国军队，而不是在国内招募新的军团。在军事上来说，依赖德国军队有它的合理性。黑森军队，至少在1776年被派往美国的首批军队，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士兵，在头几场战斗中表现不错。美国人曾经抱有的这种希望，即作为“雇佣军”的德国人对英国的事业缺乏忠诚，或许可以说服这些人开小差，但后来被证明过于乐观了。在抵达北美之后的几个月中，没有任何一个黑森士兵开小差。只是在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之后德国士兵开小差的问题才成了一个严重问题。<sup>30</sup> 但从政治上来说，雇用德国军队或许是一个错误。在1775年末，一些美国人在了解到德国军队会跨越大西洋来北美作战的消息之后，认为英国让德国人卷入战斗是国王已经将殖民地人民从他的大家庭排除出去的一个标志。美国人的有关英国政府可能会在北美建立一个威权主义秩序的担心，可能也因为德国军队的来源地而被强化了。这些士兵来自美国人认为的专制地区。如果说这场战争的全部就是效忠问题的话，用克林顿的话来说，也就是“一场有关谁能赢得美国人的心并让美国人臣服的竞争”<sup>31</sup>，那么，雇用德国军队对英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可能没有什么帮助。

或许更为糟糕的是，英军与殖民地人民最害怕和痛恨的一批美国人联系在了一起。印第安战士和英国人结盟，不断地侵扰边境地区。然而，印第安人对英军所起的作用是存在疑问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他们给反叛殖民地的经济造成了破坏。一份英军报告宣称，1778年印第安人进行的一次侵扰活动就摧毁了“大概1000所房屋，以及他们的磨坊”，而且，美国人“大概损失了1000头带角的家畜，以及大量的绵羊和猪”，这些动物都被赶到了英军基地。<sup>32</sup> 印第安人对边境地区的进攻最终也迫

使华盛顿分出很大一部分兵力去消除印第安人的威胁，这就削弱了大陆军主力部队的力量。然而，英军不一定因为印第安人的帮助而获得了什么优势。许多殖民地人，特别是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由于一代一代的相互冲突以及有关印第安人残暴杀人的故事的代代相传，对印第安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一些英军军官曾经认为，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恐惧可能会产生好的效果，印第安人的侵袭可能会让叛乱分子因为内心感到恐惧而屈服。<sup>33</sup>毫无疑问，至少一些美国人因此屈服了，但其他人反抗到底的信念看起来反而更加坚定了。大量的新英格兰人蜂拥而至来加入与伯戈因对抗的盖茨的军队，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什么巧合——伯戈因的军队中有相当多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恐怖声名马上就得到了验证，这毫无疑问“起了作用”。虽然伯戈因一再请求印第安人进行克制，但这个盟友不管不顾，还是倾向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付殖民地人。保皇派人士简·麦克里亚（Jane McCrea）被印第安人杀害并割掉头皮的案件，给了美国人绝佳的宣传机会，美国人立即毫不迟疑地抓住它不放。盖茨告诉伯戈因，他利用印第安人的事情会“出现在每一份公报中”，“让全人类都相信”伯戈因将军有这样的卑劣行径：买通印第安人来割掉美国人头皮。<sup>34</sup>因此，伯戈因的一位来自布伦瑞克的军官认为，“如果我们不把印第安人拉过来的话，我们的境况可能会好一些”，就一点也不奇怪了。<sup>35</sup>



图5-2 当时的一张德国士兵的图片。德国士兵是英军在北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存在可能更加坚定了美国人反抗英国的决心。

在英国试图赢得殖民地居民的支持这一点上来看，皇家军队和殖民地的奴隶人口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同样也是有害的。如果说居住在殖民地边境地区的人一直对于印第安人的进攻忧心忡忡的话，整个殖民地的白人则担心他们的奴隶会逃跑甚至发动叛乱。战争初期被困在波士顿的饥不择食的英军军官就考虑过将奴隶人口，特别是想把各个南方殖民地的奴隶人口动员起来，以便镇压叛乱。<sup>36</sup> 在英国国内，少数一些政客也提出认为这可能也是解决军队兵员不足的一个好方法。<sup>37</sup> 据我们所知，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提议。英国在加勒比的种植园依赖奴隶劳动人口的这个事实，使得大规模解放奴隶这种做法是一个有高度风险的战略。<sup>38</sup> 但是，弗吉尼亚的最后一任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在1775年试图将奴隶人口招到他的麾下，而克林顿在1779年基本上也是重复了邓莫尔勋爵的做法，给那些离开自己的主人来到英军控制区的奴隶自由。看起来，克林顿的想法并不是要将奴隶人口用作军队的辅助兵员，而是鼓励他们离开自己的奴隶主，从而打击殖民地经济。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试图鼓励白人契约佣工离开自己的雇主。一些来到英军控制区的奴隶人口确实加入了英军成了作战人员，但更多的人则是在军队的辅助部门作为工匠、马车夫或者工人，或者成了军官甚至是普通士兵的仆人。<sup>39</sup> 这种被解放的体验可能和许多逃跑的奴隶所设想的不同。大量的奴隶不过是将一种奴役换成了另外一种奴役而已。虽然如此，从奴隶的角度来看，英国人看起来比大部分美国白人更愿意给他们自由。不过，从英国的角度来说，奴隶人口所起到的作用最多是好坏参半的。依附于英军的奴隶人口最终变成了一个负担，而不是一种助益，因为这些人消耗了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物资。更为重要的是，军队与奴隶逃亡和解放联系在一起，降低了将摇摆不定的美国白人争取过来的机会。看起来

白人奴隶主根本没有因为大量的奴隶起义和甚至看起来无法阻止的黑人劳动力的持续流失而吓住；相反，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加坚定地要反对英国的统治了。甚至那些有亲英倾向的美国人也对他们奴隶的流失抱怨连连。

而保皇派人士，至少武装起来的保皇派人士，可能也是使得英国争取美国人心更加困难的一个团体。正如我们看到的，乔治·杰曼勋爵的设想是，保皇派人士是英军战争力量的一支重要力量。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都认为大部分美国人是支持恢复皇家统治的。英军高级将领们，虽然随着战争的进行对于到底有多少人是保皇派人士变得越来越怀疑，但也认识到将“好的子民”（用詹姆斯·罗伯逊的话来说）武装起来，以便制服那些“坏的子民”，在一定程度上是补充各个反叛殖民地英军正规军数量不足的一个方法。<sup>40</sup>但是让美国人与美国人对抗，使得这场战争变得更像一种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大幅加深了对立双方之间的敌对情绪。保皇派人士组成的军队可能包含一些英国军官和军士，也有一些以前的叛乱分子当士兵，但这些军队主要是由“政府之友”组成的。这些人财产被毁，因此不愿意对他们的对手保持宽容。这些保皇派人士进行复仇的渴望，使得英国指挥官很难阻止他们破坏实现和解的机会。一个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保皇派人士联盟”（Associated Loyalists），它由不愿意加入各个殖民地叛军的逃兵组成，马上就因为到处抢掠和残暴行径而臭名昭著起来。这让一位反叛人士谴责克林顿什么也不是，不过就是“一群到处打家劫舍的匪徒的匪首”而已。<sup>41</sup>

许多时候，英军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一些美国人因为英军的到来而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其他人则有正当的理由对他们遭遇

英军的日子抱怨连连。英国大臣和将军们可能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来将美国人从大陆会议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的，但对绝大多数殖民地居民来说，这支军队并不是作为朋友到来的，而是作为侵略者到来的。由于战争爆发前的头几个月英军主要集中在波士顿，这样，叛乱分子就很容易地在13个殖民地都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因此，1776年夏天，英军就被迫要去夺回他们失去的土地，而不是对他们占领的据点进行防御。英军第一次与一个地方的美国平民接触的时候，往往是他们追击或打败了华盛顿军队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胜利往往冲昏了他们的头脑，英军士兵在这种时候往往倾向于将当地居民当作他们的猎物。在新泽西，在1776年11月和12月，大量当地人的财产被剥夺了，人身也遭到了攻击。不同来源的报告都报告了大量的强奸事件。这种现象在英军进军所到之处都不断重复，虽然那些被英军更为稳固控制的地区的居民受到的对待往往没有那么悲惨。英军军官往往将这些事情推到黑森军队身上去，美国人的报告也显示德国军队确实尤其为所欲为。但英军的纪律记录和军事法庭记录以及民间的通信和日记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这么残暴对待当地居民的并不仅仅限于黑森士兵。尽管并不是所有受到伤害的美国人都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一些人以很强烈的宿命主义态度接受了他们的命运，但英军的暴行毫无疑问制造了敌人，而那种时候英军本来更需要的是朋友。

即使英军和德军的行为良好，以最大的礼貌和友善来对待当地的非战斗人员，英军在殖民地往返奔袭，也毫无疑问会让潜在的保皇派人士感到踌躇。军队到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然后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在长期来看，使得那些倾向于英军的人越来越不愿意站出来。正如当

时的一项记述所记载的：“大不列颠政府之友往往在英军到来的时候宣布自己支持英国，但之后则需要单独来为自己的这种鲁莽行为买单。”<sup>42</sup>那些因为英军到来而宣布他们是“政府之友”的人，可能暂时觉得更加自信，但如果军队撤退的时候，如同英军在1777年离开新泽西、在1778年离开宾夕法尼亚和1779年、1780年离开弗吉尼亚那样，那些新宣布自己是保皇派人士的人则需要独自面对邻里的敌意。那些有关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英军但不久之后就被英军抛弃了的不幸经历的报告，不大可能鼓励其他地方的保皇派人士站出来支持英军。由于担心马上就会被抛弃，在1781年几乎毫无疑问阻止了北卡罗来纳的“政府之友”去加入康华里的军队。

与此同时，英军的频繁转移也可能将那些有中立倾向的美国人赶到了反叛阵营。当英军抵达一个地方之后——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反叛殖民地的大部分地方或早或晚都遭受过英军的进攻，民兵将被号召出来抵御英军的进攻。直到那个时候之前还一直努力与这场冲突保持距离并低调行事的男性，现在则要面对一个困难的抉择：要么加入美国守军阵营，要么被认为是隐秘的保皇派人士。虽然拿起武器是危险的，大多数面临这个困境的男性都选择站到民兵这一边。他们或许经过考量，认为在英军离开之后被暴露在邻居们的愤怒之下是更加危险的。而加入了反对英军的民兵阵营之后，很自然这些人就更认同美国人的事业了。参战的经历，特别是被英军打伤的经历，使得他们不大可能继续保持中立或者不选边站。<sup>43</sup>

但如果说英军可以做得更好，从而避免将大量的美国人赶向叛军那一边的话，其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使得美国这场战争对于英国



政府来说注定是赢不了的，法国、稍后的西班牙，最后荷兰共和国都参战了。即使是在1778年夏天法国正式参战之前，外国援助也在一直支撑着美国人的抵抗运动。资金和火药是最为重要的贡献。在1777年，第一笔大额的法国贷款和一大批法国火枪维持了叛军的战争行动。即使是欧洲各国通过向美国派出少量训练有素的军官的方式，也帮助美国人抵挡住了英军的进攻。外国资金和火药在1778年之后继续大量涌向美国——外国资金可能帮助了美国经济在1781年避免陷入全面的崩溃——但一旦法国政府全面参战之后，这场冲突的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与此同时美国欠英国的欧洲敌国的外债数量也相应地增加了。

如果诺斯勋爵内阁可以赢得欧洲盟友的支持的话，英军的处境可能不会有这么糟糕。在18世纪以前，英国从来未在没有一个欧洲主要国家协助的情况下与法国开战。七年战争中英国成功的关键是，给德国军队付钱来牵制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英国舰队和陆军则对法国海外领地进行扫荡。这次没有欧洲盟友提供相同的协助，因此，英国政府就无法防止法国将其大部分力量集中在海战上。法国政府在战争之前及进行期间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造战舰。1778年它的主力战舰数量是52艘，到了1778年就已经增长到了73艘。1778年，法国政府的战略一度看起来要失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上发生了冲突，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有演变为更大范围内的欧洲大战的风险。但法国大臣们没有被他们的盟国奥地利带入这场冲突，而是将他们的主要精力严格地放在了与英国的战争之上。

海军历史学家合理地指出，法国的优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强大的海军是不可能通过将资源从陆军转移到海军之上的方式一夜之间建

成。这需要许多年的不断稳步地投入。<sup>44</sup> 但如果说法国没有英国那样的强大海军基础的话，至少在1775年到1782年这个短暂但却关键的时期内，法国看起来能够挑战皇家海军的统治地位，并让英国在北美的希望破灭。如果英国政府争取到一个欧洲主要国家作为盟友，或许法国可能被迫将资金投向陆军，他们的海军可能因此会弱许多。然而，英国的孤立并不是英国刻意选择的，至少从18 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不是这样的。许多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官在独立战争之前以及独立战争过程中都试图与一个或多个欧洲国家来结成新的联盟，以便制衡法国，但却发现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和英国站在一起。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让大部分欧洲国家相信，法国对于权力平衡不再构成任何威胁，它们中没有哪个国家对法国担心到了愿意与任何其他国家建立联盟来反对法国的地步。确实，欧洲大陆的普遍认识是，英国现在比过去强大了，必须对英国进行制衡。1780年的“武装中立联盟”就是为了对英国海军的耀武扬威进行抵制。但是，在18 世纪之初没有建立任何此类的大联盟来反对路易十四，到了18 世纪末也没有类似的联盟来反对法国革命中的法国。

外国介入这场战争一起来反对英国的最为明显的后果是，战争的地域范围扩大到了加勒比、中美洲、西非、欧洲和亚洲。现在，英国政府必须在多条战线上作战。伦敦的大臣们同意继续北美的战争，但野心却已变得小多了。他们不再认为能够重新夺回所有的叛乱殖民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南部殖民地保住，这些殖民地能够对英属西印度群岛提供关键的物资供应。英国陆军和海军资源被分散到其他战线上去了，特别是加勒比地区和国内防御上。1778年2月，在法国介入战争前夕，英军陆军力量的65%都是在北美。到了1780年9月，<sup>45</sup> 这个数字只有29%。在

这种情况下，由于其他一些战线在争夺军队和战舰，叛乱殖民地的英军已经不够强大了，甚至无力去实现英国政府已经降低了的在北美的目标。

在北美内部，外国干涉也发生了重大影响。在1778年早期，由于预计西班牙会卷入战争，杰曼命令克林顿分出一部分兵力，来增强西佛罗里达和东佛罗里达的防御力量。西班牙最终在1779年夏天参战后，马德里政府指令路易斯安那总督加尔韦斯开展夺回佛罗里达的战斗。加尔韦斯的行动格外成功。到了1781年5月末，他就占领了西佛罗里达的全部英军据点。但是对于克林顿来说，佛罗里达从来不过就是一个次要战场，他真正担心的是法国介入北美。1780年罗尚博伯爵带领的法国远征军抵达之后，他开始担心他在纽约的总部，但他最大的噩梦是法国海军可以与美军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将他的军队切割围困。1778年7月在纽约，法美协作没有实现，不久之后在长岛的纽波特也没有实现。1779年在萨瓦纳也没有带来什么积极的效果。但是，在1781年秋天，法军和美军之间的协作终于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当德·格拉斯将军的战舰成功控制了切萨皮克之后，康华里被迫在约克镇投降了。<sup>46</sup>

以上这些，并不是说要矮化殖民地叛军本身对英军在北美大陆失败的贡献。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华盛顿在特伦顿的反击，在1776年年末给即将熄灭的美国革命事业之火注入了新的活力。萨拉托加大捷对于美军来说是一场更为成功的出奇制胜。英军的一支主力作战部队投降了，叛军变得自信了——或许是第一次有了自信——他们现在相信自己可以抵挡住高度专业化的英国军队了。但是，与常见的观点相反的是，法国并不是因为伯戈因的失败才决定参战的。萨拉托加大捷只是加快了法国介

入的速度而已，并不是法国介入的原因所在。韦尔热讷伯爵已经赢得了法国政府内部有关是否加入这场战争的斗争。美国人有能力保住自己的叛乱事业，尽管他们一再在战场上失利，但至少避免了被消灭，这让巴黎的大臣们相信，美国人是值得帮的，法国的介入会严重损害英国的利益。然而，韦尔热讷伯爵需要时间来强化海军，也需要时间来说服西班牙与它一起参战。萨拉托加大捷让他相信，法国介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有西班牙一起介入更好，但如果有必要时，西班牙不介入，法国也可以介入。美国人从1775年开始就知道，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他们获得外国帮助的能力。他们的真正“成就”就是一一直坚持到外国援助到来为止，在那之后，在几次与法国盟友不那么成功地合作之后，双方逐渐高效的最终合作终给英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如果说英国在北美失败了，但英国在其他地方的成功却使得英国更强大了。这在约克镇战役之后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根本上来说，罗德尼在桑特海峡战役中的胜利以及直布罗陀守军英雄般的长久坚持，提升了英军的士气，打击了波旁王朝的信心。<sup>47</sup> 英军取得的这些胜利，可以从当地和个人特质来解释，比如罗德尼将军的魄力，以及直布罗陀当地的易于防守的天然特性，但这两场胜利都和一个根本因素联系在一起：英国海军力量。在桑特海峡战役中，罗德尼麾下的主力战舰比对手德·格拉斯要多。罗德尼的高超战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毫无疑问也受益于拥有更多的战舰这一点。罗德尼指挥的是皇家海军在欧洲海域之外部署的最大的一支舰队。<sup>48</sup> 同样，如果在被围困的过程中没有补给船队的抵达，直布罗陀也是不可能坚持这么久的。到

了1779年8月，直布罗陀总督报告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鲜食品了”。<sup>49</sup>而到了1780年1月，虽然不是那么快，第一艘补给船就抵达了。第二艘也在1781年6月抵达了，这次来得非常及时，避免了直布罗陀守军由于缺少食物而陷入非常危险的脆弱境地。1782年10月另一艘补给船成功抵达，最终使得围困直布罗陀的敌军认为自己没有希望能够占领这个英军据点。每一艘补给船只都是由大量战舰护送过来的，没有强大的皇家海军，这些补给船是不可能抵达的。1778~1779年，当西班牙参战之后，英国舰队的总数量比所有敌国的数量要少一些。但是，这一时期，英国海军的扩张是非常迅猛的，主力战舰的数量从66艘增加到了99艘。法国海军在同一时期也扩大了，但不像英国海军这么大。它的主力战舰在1778年是52艘，到了第二年增加到了63艘。<sup>50</sup>

皇家海军规模的扩大，仅仅是在波旁王朝看起来不可避免会介入战争的时候英国更加协调统一地安排自己的战争计划的一个方面而已。从1778年开始，陆军力量的动员力度也比之前英国只是需要面对北美叛军的时候大了很多。1778年陆军增加了12个步兵军团，第二年又增加了14个，此外还增加了4个轻骑兵军团。在1777年9月和1778年9月之间，陆军士兵增加了2.4万人，这还不包括在爱尔兰的军团，而在此前的12个月中新增士兵的数量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sup>51</sup>随着法国的介入，金融动员的步调也改变了。诺斯勋爵在1778年引入了新的税种，其中的许多税种与战争早些时候开征的那些税种不同，它们更多地落在了普罗大众身上。接下来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税种是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政府借贷也大幅增加了。在1776年到1778年之间，诺斯勋爵内阁获得了总计750万英镑的贷款。而在1778~1780年这个数字是1300万英

镑。到了1780~178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2400万英镑。<sup>52</sup>

为什么英国政府为了这场更大范围的战争所做的动员，比原来为1778年以前的纯北美战争所做的动员要有效率得多？在一定意义上答案是技术性起了一定作用。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国王最初是不愿意招募新军团的。但这种不情愿最终只能让步于看起来马上要和法国开战这个因素。招募新兵是快速扩大陆军的最好方法，这意味着在1777年末开始陆军扩张的速度，比之前单单与美国人开战的时候要快得多。但陆军之所以扩张更快了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我们还需要考虑观念的作用。英国政治家和普通大众认识到，在一场世界之战中与波旁王朝进行战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与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英国的传统天主教和专制主义敌人之间的冲突，至少让这个国家又团结在一起了，而北美战争却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分裂。正如我们在讨论北美殖民者时所说到的，仅仅热情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但是，如果说热情可以带来更多的士兵和更多的战舰的话，那么，热情毫无疑问是会带来帮助的。不过，最终，英国国家力量动员的新速度，可能还受一个简单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对于大部分英国人来说，美国战争过于遥远。在1778年以前，虽然有一些支持政府的人担心殖民地叛乱会激发爱尔兰甚至伦敦也发生叛乱，<sup>53</sup> 这场战争对英国本土不构成任何直接威胁。相反，与波旁王朝的战争则更为切身。法国不仅人口众多、强大，而且距离也很近。它强大的军队就驻扎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而英吉利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21英里。在1778年尤其是1779年法西联合舰队出现在普利茅斯海域的时候，本土可能遭到入侵的威胁刺激了英国人民。英国开始发行公债募集资金，以鼓励人们参加陆军和海军。

与政府无关的许多人的支持可能对英国的战争事业有不少帮助，但这种决心之所以能够挺过1782~1783年，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一个历经考验的国家财务体系。在17世纪90年代，与路易十四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以及新宪法和解导致英国税收和国债发生了变革。当国王开始和议会合作了之后，税收收入就变得更加稳定可靠了，这样就能够举借长期债务了。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所说的“军事财政国家”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出现的。这个时期的英国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来为它的18世纪陆军和海军力量提供支持。<sup>54</sup>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议会同意平均每年征收1200万英镑的税款。许多资金都是为了支付长期国债的利息，而这种长期国债从1775年的1.27亿英镑增长到了1783年的2.32亿英镑。高税负水平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实际上，在1778、1780年这两个危机年份中——当时英国的战争局势看起来不妙——对于英国政府大幅扩大的收入被滥用的担忧，导致民间兴起了一项要求压缩开支和进行议会改革的运动。此外，随着战局的拖延，政府发现只有付出更好的利息才能够再度举债。1779年，诺斯勋爵对“有钱人强加的非常高的利息条款”哀叹不已，两年之后再次由于必须根据“如此不利的条款”借债而同样心有不甘。<sup>55</sup>虽然如此，英国毕竟还能够举借大量的债务，来维持其在1782~1783年的战争行动。

将英国与法国这个欧洲的主要对手进行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法国经济可能和英国的一样强，但英国的人均税负要更高一些。<sup>56</sup>部分来说，法国无法积聚足够多的资金来支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获得了重要的税收豁免。一些省份争取到了不交某些税种的特权，而法国的整个贵族阶层则不需要缴纳特定的一些税种。在巴黎及

执行国王法令的省议会占主导地位的贵族阶层，顽固地抵制了连续好几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改革企图。虽然如此，由于开征了更为普遍适用的战时税种，获得税收豁免的阶层慢慢地也被迫作出更大的贡献。<sup>57</sup>或许和法国的贵族特权以及有些省的特权同样重要的，是法国的人口结构。法国的城市化没有英国那么高，其人口更加分散，这往往就意味着要确定和征收间接税更为困难一些。我们也不能忘记大量的法国纳税人财务状况困难。<sup>58</sup>如果法国政府更加激进地提高税率的话，这可能会使得征税产品的消费降低，从而减少税收收入。提高税收收入所涉及的问题，意味着举债是法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资金的唯一方式。然而，由于税基有限，如果不给足够高的利息率的话，投资者就不愿意买法国的公债。内克在1777~1781年间大概发行了2170万英镑的公债，但是主要是以利息率为10%的终身年金形式筹集的——这几乎是英国政府1781年和1782年发行的统一公债收益率的两倍。<sup>59</sup>为了维持极为昂贵的七年战争，法国公共财政已经左支右绌了，到了独立战争的最后阶段已经快要崩溃了。而英国政府，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依旧能够向其武装部队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支持。最终说来，英国更为雄厚的财力，意味着它可以比它的欧洲对手耗更久的时间。英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的成功，以及最后签署的和平协议的内容，最终都与法国对财政枯竭的担忧有相当大的关系。正如乔治三世在1780年9月所预见的那样：“这场战争，就像上一场战争一样，将是一场在金钱上的较量。”<sup>60</sup>

### 【注释】

1 My account of the peacemaking draws heavily on C. R. Ritcheson,



‘The Earl of Shelburne and Peace with America, 1782–1783’,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 (1983), pp. 322–45; Jonathan R. Dull,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1985), Chapters 17–20; H. M. Scot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1990), Chapter 12; and Andrew Stockley, *Britain and France at the Birth of America: The European Powers and the Peace Negotiations of 1782–1783* (Exeter, 2001).

2 See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 Foreign Office Papers, FO 27/2, Fox to Thomas Grenville, 26 May 1782.

3 See, for exampl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Ann Arbor, MI, Shelburne Papers, Richard Oswald to Thomas Townshend, 11 October 1782.

4 Ibid., Oswald to Shelburne, 18 April 1782; Francis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6 vols, Washington, DC, 1889), v. p. 538, Franklin to Shelburne, 18 April 1782.

5 TNA, Foreign Office Papers, FO 95/511, Fox’s instructions to Grenville, 21 May 1782.

6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Shelburne Papers, Franklin to Oswald, 26 November 1782.

7 Ibid., Oswald to Townshend, 15 November 1782.

8 Henri Doniol (ed.), *Histoire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rance à l’établissement des Etats-Unis d’Amérique: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et documents* (5 vols, Paris, 1886–99), v. p. 84.

9 Bedfordshire Record Office, Bedford, Lucas of Wrest Park Collection, Robinson Papers, L 30/14/307, Shelburne to the Earl of Grantham, September 1782.

10 See Charles 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 1775–1783* (Chapel Hill, 1979).

11 Thomas W. Copeland et al (eds),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10 vols, Cambridge, 1958–78), iii. p. 294.

12 John Shy (ed.), *Winding Down: The Revolutionary War Letters of Lieutenant Benjamin Gilbert* (Ann Arbor, MI, 1989), p. 41.

13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Bland Papers, Bannister to [Theodorick Bland], 16 May 1781.

14 See above, p. 65.

15 Evelyn M. Acomb (ed. and trans), *The Revolutionary War Journal of Baron Ludwig von Closen* (Chapel Hill, 1958), p. 89.

16 See Troy Bickham, ‘Sympathizing with Sedition? George Washington, the British Press, and British Attitudes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ix (2002), pp.101–22.

17 R.K. Showman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 (13 vols, Chapel Hill, 1976–2005), iv. p. 108.

18 Biographies of Washington are too numerous to list, but two

recent additions to the genre present interesting perspectives: Ron Chernow, *Washington: A Life* (London, 2010), and Stephen Brumwell, *George Washington: Gentleman Warrior* (London, 2012).

19 For Howe's involvement in training light infantry companies in 1774, see J.A. Houlding, *Fit for Service: The Training of the British Army, 1715–1795* (Oxford, 1981), pp. 336–7.

20 The diary of Robert Honyman, a Virginian doctor, who saw British troops drilling in Boston just before the war, is clear on this point: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Robert Honyman's Journal, 1775, HM 818, p. 71.

21 Matthew H. Spring, *With Zeal and With Bayonets Only: The British Army on Campaign in North America, 1775–1783* (Norman, OK, 2008), pp. 140–51.

22 See the stimulating essay by Julie Flavell, 'British Perceptions of New England and the Decision for a Coercive Colonial Policy, 1774–1775', in Julie Flavell and Stephen Conway (eds),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The Impact of War and Warfare in Anglo-America, 1754–1815* (Gainesville, FL, 2004), pp. 95–115.

23 Alnwick Castle, Northumberland, Percy Family Papers, vol L, Pt. A, fo. 53, Earl Percy to Edward Harvey, 20 April 1775.

24 These timings are taken from Jonathan Scott, *When the Waves Ruled Britannia: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1500–1800* (Cambridge,

2011), p. 74.

25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4, fo. 311, Howe to Germain, 30 August 1777.

26 Ibid., Treasury Papers, T 64/108, fo. 73, Howe to John Robinson, 2 December 1776.

27 See R. A. Bowler, *Logistic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British Army in North America* (Princeton, 1975).

28 Acomb (ed. and trans), *The Revolutionary Journal of Baron Ludwig von Closen*, p. 75.

29 Th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hat may have influenced Howe are assessed in Ira D. Gruber, *The How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1972).

30 See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1980), Chapter 9.

31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memo of conversation, 7 February 1776.

32 BL, Haldimand Papers, Add. MS 21,760, fo. 32, John Butler to Mason Bolton, 8 July 1778.

33 See, for example, City Archives, Sheffield, Spencer Stanhope of Cannon Hall Muniments, 60542/10, Francis Bushill Sill to John Spencer, 19 September 1775.

34 Library of Congress, Horatio Gates Papers, folder 4, Gates to Burgoyne, 2 September 1777.

35 Charlotte S.J. Epping (ed. and trans), 'Journal of Du Roi the Elder', *German American Annals*, xiii (1911), p. 154.

36 See, for exampl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James Robertson to Clinton, 13 January 1776.

37 See, for example, the speech of William Lyttelton, a former governor of South Carolina, 26 October 1775, in R.C. Simons and P.D.G. Thomas (eds),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s respecting North America, 1754–1783* (6 vols to date, Millward, NY, 1982 –), vi. p. 96.

38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ve uprising in the Caribbean and the events in North America, see Richard B. Sheridan, 'The Jamaica Slave Insurrection Scare of 1776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lxi (1976), pp. 290–308.

39 See Philip D. Morgan and 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 'Arming Slav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and Philip D. Morgan (eds), *Arming Slave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2006), pp. 180–208.

40 Centre for Kentish Studies, Maidstone, Amherst Papers, U 1350 O79/13, Robertson to Amherst, 9 November 1776.

41 W.B. Weedon (ed.), 'Diary of Enos Hitchcock', *Rhode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vii (1899), pp. 169–70.

42 See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34/110, fo. 144, 'Remarks on some Improvements Proposed by an Officer to be made in the Plan of the American War', n.d. but probably 1778.

43 See John Shy,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6), especially pp. 217–22.

44 See, for example, N.A.M. Rodger, '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Lawrence Freedman, Paul Hayes and Robert O'Neill (eds), *War,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Michael Howard* (Oxford, 1992), pp. 39–55.

45 Percentages derived from Piers Mackesy, *The War for America* (London, 1964), pp. 524–5.

46 The British dilemma is succinctly analysed in William B. Willcox, 'British Strategy in America, 177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ix (1947), pp. 97–121.

47 For British responses to Rodney's victory, see Stephen Conway, "'A Joy Unknown for Years Past': The American War, Britishness and the Celebration of Rodney's Victory at the Saints", *History*, lxxxvi (2001), pp. 180–99.

48 As N.A.M. Rodger has noted, 'The Battle of the Saintes was the first and last major action ever fought by the principal British fleet outside European waters – indeed, it did not leave European waters again until 1944.'

‘Seapower and Empire: Cause and Effect?’, in Bob Moore and Henk van Nierop (eds), *Colonial Empires Compared: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750–1850* (Aldershot, 2003), p. 107.

49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91/25, Eliott to Viscount Weymouth, 25 August 1779.

50 See the figures in Jonathan R. Dull,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75), pp. 359–76.

51 BL, Liverpool Papers, Add. MS 38, 344, fo. 162.

52 Stephen Conway,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2000), p. 54.

53 See, for example, the fears of the Rev. John Butler, Surrey Record Office, Guildford Muniment Room, Onslow MSS, 173/2/1/125, Butler to the Earl of Onslow, 6 October 1776.

54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1989).

55 William Cobbett and John Wright (eds),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36 vols, London, 1806–20), xx. p. 57, xxi. p. 1330.

56 See Peter Mathias and Patrick O’Brien, ‘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15–181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1976), pp. 601–50.

57 See M.D. Kwass, *Privilege and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Liberté, égalité, fiscalité* (Cambridge, 2000).

58 For the British state's advantage in this respect, see Brewer, *Sinews of Power*, especially pp. 178–82.

59 For British consols, see C.E. Heim and P. Mirowski, 'Interest Rates and Crowding Out during Brita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vii (1987), especially p. 120.

60 Sir John Fortescue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6 vols, London, 1927–8), v. p. 136.



## 第六章 尾声

失去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自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战争结束之后紧接着的那些年中，许多评论家，不论是英国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认为英国在失去了北美大陆的殖民地之后已经沦落为二流欧洲国家，甚至是三流的欧洲国家了。国家自信力已经被充分动摇了，使得宪法改革成了特别优先的议题。现有政府机构看起来没有能够阻止政府管理失误和军事失败。在战争的危机年份中涌出来的改革运动——要求降低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议会的影响力及重新分配议会席位——一直持续到战后的和平年代。1785年，国王钦定的首相、曾在谢尔本伯爵内阁担任财政大臣的小威廉·皮特是议会改革的领导者。

许多英国人对于他们眼中的美国人的背叛有着极大的怨恨。当谢尔本伯爵及后来的皮特都试图劝说议会给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很大的商业让步的时候，这个提案立即被拒绝了。议员们——以及大量的普通民众——都倾向于把美国从《航海条例》所确立的封闭的贸易体系中排除出去。谢菲尔德勋爵1783年的政论作品《美国各州商业观察》

（*Observations on the Commerce of the American States*）认为应当将美国人完全当作外国人，看起来引起了共鸣。公众广泛支持另一个国家战略，即与欧洲大陆建立更为强大的联系。1786年的英法贸易条约就是这种战略的成果之一，而在美国这场冲突结束后的十年中，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发展迅猛。<sup>1</sup> 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与欧洲各国建立政治联系

一点也不比与美国建立政治联系要差。战后，国内对英国的政治孤立进行了反思性的辩论，这种政治孤立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在大西洋彼岸失败的关键原因所在。<sup>2</sup> 一篇报纸文章认为，整个国家在欧洲的地位是可悲的——“在全世界没有一个盟友。”<sup>3</sup> 与欧洲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的努力在1760年就开始了，而在战争过程中也得到了强化，在战后则变得更为紧迫了。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发现英国帝国事务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谨慎态度。在议会主张其有权对北美征税从而引起美国人叛乱之后，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再也没有试图通过主张其征税权来在帝国之内进行征税了。<sup>4</sup>

然而，英国的失败没有出现那种本来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整个国家复苏很快。正如谢尔本伯爵和皮特所发现的，在政治上是无法恢复战前的跨大西洋贸易安排的，就更别提可以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系了（尽管谢尔本伯爵本来很希望能够建立这种联系）。从政府层面来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年之中一直处于冷若冰霜的状态。但如果我们看看其他领域，不考虑正式的政治关系，可以看到，战前秩序的核心方面很快就恢复了。<sup>5</sup> 自17世纪初以来就是英国大西洋帝国的主要特征之一的移民潮在战争结束之后就立即恢复了。移民出现了新动向。有不少美国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在大西洋湾区重新安家。许多旧有的移民模式也恢复了。阿尔斯特地区的新教教徒和苏格兰高地人往大西洋彼岸蜂拥而去，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前那几十年中没有什么两样。家人之间跨越大洋的通信往来，使得一个跨大西洋的大社区概念依旧活跃在人们的心中。<sup>6</sup> 同样，大量的文化作品，包括伦敦出版的书籍和手册，在费城重印，而美国早期的政治印刷品往往都是由英国出生的镌版工经手的。

宗教上的联系，特别是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异议分子和他们在美国的教友之间的联系是很强的。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也恢复了，最终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到了18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法国革命导致欧洲市场关闭，英国向北美的出口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的保皇派难民在巩固甚至扩大了英帝国的其余部分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大量的保皇派移民到了加拿大，使得加拿大变成了一个说英语的新教社会，而这种社会结构正是英国自1760年以来征服加拿大之后一直希望在那里建立的。同时，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接收了其他一些美国的保皇派难民。一些美国难民甚至离开他们的家园来到了更远的地方。1787年，塞拉利昂这个自由黑人建立的天堂在西非建立了。5年之后塞拉利昂又迎来了超过1000名的获得自由的奴隶，这些人原本是试图在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立足的。<sup>7</sup> 保皇派人士甚至远涉重洋来到了印度。<sup>8</sup> 更为重要的是，从英国的角度来看，18世纪90年代以及19世纪早期，英国已经拥有了一个亚洲帝国了，这对英国失去北美构成了一种补偿。如果说独立战争终结了第一个大英帝国的话，第二个大英帝国马上就粉墨登场了。<sup>9</sup>

对于那些获胜的盟国而言，它们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曾经不可一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影响力。它在1780年之前就已经摇摇欲坠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荷兰共和国自己也陷入了政治混乱之中。亲英的奥兰治政府（诺斯勋爵内阁错误地认为，英国与荷兰开战会强化奥兰治政府的地位）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主要受益的是亲法的爱国派，这些人受到英国在北美失利的鼓舞，要求对共和国进行彻底的宪法改革。政治冲突不久就演变成了一场内战。1786年9月，忠于奥兰治亲王的军队与爱国运动的极端派别的民

兵“自由军团”（Free Corps）在格尔德兰（Gelderland）发生了战斗。第二年春天奥兰治的士兵被乌得勒支的自由军团打得落荒而逃。颜面尽失的奥兰治亲王最后是在普鲁士的军事干预之下才获救的，而普鲁士是在英国的鼓励和支持之下进行干预的。至少从短期来说，英国会因为亲法的爱国派的失败而获益，而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通过这个获得了荷兰和普鲁士两个盟友。但爱国运动并没有被扑灭，奥兰治亲王对普鲁士刺刀的依赖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荷兰共和国的旧秩序再次面临压力。1795年1月，法国军队推翻了奥兰治政府，并将爱国派扶上了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的统治地位。<sup>10</sup>

西班牙战后并没有立即陷入那么糟糕的境地。国家财政很快恢复了，这主要是由于中美和南美运进来大量的金银币的缘故。<sup>11</sup> 政府实现了其在1779年决定参战之时确立的许多目标。直布罗陀还在英国手中，而且也永久失去了牙买加，这确实令人沮丧。但米诺卡被重新夺了回来，佛罗里达也是如此。换句话说，西班牙成功地挽回了它在七年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但长期来看，西班牙对美国人的支持可能是一个错误。1777年，西班牙首相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Conde de Floridablanca）就曾担心，美国的独立“可能给其他殖民地树立了最糟糕的榜样”<sup>12</sup>——而这正是英国政府大臣们在美国殖民地爆发叛乱之初起就一直对西班牙和法国政府苦口婆心灌输的观点。西班牙参战的时候，西班牙大臣们很小心，他们刻意以法国的盟友身份，而不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盟友身份参战。但这种谨小慎微对防止起义的传染没有任何作用。18世纪80年代早期，西班牙的美洲帝国期望走上与英国北美殖民地一样的道路。从北方的新格林纳达[注20](#)到南方的智利，起义连绵起

伏。<sup>13</sup>1781年，委内瑞拉的一位西班牙皇家官员报告说，西裔美洲人“极度渴望独立”。<sup>14</sup>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这也是西班牙政府在战后所采取的方法——对帝国进行联邦制改组。1787年，卡洛斯国王正式宣布废除美洲西班牙人和本土西班牙人之间的区别。这样，两类人在理论上都有资格在“母国”担任公职。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希望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大量的帝国联邦制度被制定出来，但没有一项被付诸实施。西裔美洲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大家很容易就将西裔美洲人所在的省份与“为自由而战”的“英国殖民地”拿出来进行比较。<sup>15</sup>西裔美洲人中的煽动性言论越来越盛行。

要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和西属美洲地区的独立之间确立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同英国帝国改革一样，西班牙政府改革也引发了殖民地反叛。换句话说，西属美洲地区的反叛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虽然这种反叛与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反叛同时发生，原因也类似。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08年西班牙王室统治瓦解的时候才开始脱离西班牙。两年后阿根廷也开始了同样的进程，而直至1824年秘鲁人才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虽然如此，至少这样说是合理的：美国革命战争推动了摧毁西班牙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统治的进程。<sup>16</sup>

从长期来看，介入北美战事也没有给法国带来什么好处。那种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长期商业关系、开创跨大西洋贸易并摧毁英国霸权地位的期望，都没有实现。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就将法国不断往外排挤了。1781~1783和1786~1789年间，法国与美国的贸易额降低了72%。<sup>17</sup>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大臣们没有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的话，在其他方面，他们则获得了远超自己预期的东西。和西班牙

一样，法国支持和鼓励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叛乱对自己也是有风险的。韦尔热讷伯爵将这些令人不安的东西放在了一边，一门心思要抓住机会羞辱英国并恢复法国的强权地位。在约克镇战役之后，他的判断看起来是正确的。几年之后局面就没有那么明朗了。1791年圣多明各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叛乱，黑人奴隶站起来推翻白人种植园主的统治。这场叛乱是整个大西洋世界中有关奴隶制和自由之间的宪政对话所引发的混乱的一个结果，更是邓莫尔勋爵以及后来的克林顿给北美的黑人奴隶自由的战时行动所引发的一种新精神的实际体现。<sup>18</sup> 人们可以合理地反驳说，圣多明各的叛乱之火并不是被北美殖民地叛乱之火所点燃的，而是被法国国内的革命之火点燃的，当时法国自己也陷入了革命之中。但是法国国内旧秩序的崩溃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革命所引发的后果之一。

这并不是说我们认同一位深受伤害的美国保皇派牧师在1797年作出的一个论断：法国大革命是美国革命的一个“巨大的产物”。<sup>19</sup> 那种认为在北美参加战斗的法国士兵将自由的革命理论带回了法国的旧式理论，现在已经基本上被否定了。大量曾在北美殖民地参战的军官对他们的所闻所见一点也不感冒。一些人在1789年的时候还成了反对革命的人。<sup>20</sup> 下面这种观点也是同样值得商榷的：普通法国士兵之所以参加乡村地区的叛乱活动（乡村地区的叛乱活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很重要的一环），是因为他们接触到了美国社会，这个社会自主产权是一种常态。<sup>21</sup> 参加北美战争的许多法国老兵确实是来自于在1789年发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地区，但是这种关联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些地方是法国最贫穷的省份，法国军队从这样的地区大量招募士兵。实际上，法国的普通士兵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的平民阶层隔离开的。法国士兵获得美

国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知识的可能性可谓微乎其微。<sup>22</sup>

法国无法避免变革之风从大西洋彼岸吹到本土。不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关联，更是由于财政危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传播所导致的。<sup>23</sup> 最近的一些学术著作对法国在独立战争时期的战时债务的规模提出了质疑，认为财政损失要么更早就已经发生了——也就是在七年战争时期就发生了，要么是在后来，也就是18世纪80年代，才发生的——当时法国的财政大臣们试图通过炫目的新开支项目来托住不断下坠的信心。<sup>24</sup> 但是，如果说内克在独立战争时期大举借债的行为肯定不是法国财政危机的唯一原因的话，那么，这种行为至少极大地催发了在18世纪80年代导致法国君主统治被推翻的那场危机。1776年在有关是否应该支持美国人的争论中失败了的杜尔哥至少正确地指出，法国需要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时期来从七年战争导致的财政紧张中缓和过来。而北美冲突却完全背道而驰。大量资金被用来扩张海军，但是，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大幅提高国内征税水平，大部分资金只能来通过举债筹措。由于法国政府信用不佳，只有在提供非常高的利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贷款。到了1783年的时候，法国已经不断地滑向财政灾难，而战后开支则加快了这种下滑的速度。

从表面上看，美利坚合众国从战争中诞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它从英国王室统治中独立出来了，而且也没有成为法国的傀儡。但是，这种成功的代价是高昂的。南方地区的战争尤其具有破坏性。要重建一个遭受严重损害的经济——要在荒芜的土地上重建船厂和农场、蓄养牲畜和种出农作物需要花很长的时间。1786年，华盛顿乐观地宣称，“看到战争所带来的损害很快得到修复，真是令人感觉兴奋异常”，但他是在

给一位法国人写信的时候这些说的，而他这么说的目的可能是要制造一种好的印象。<sup>25</sup> 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南方各州的出口量还只恢复到了战前一半的水平。根据一项现代估计，从1774年到1790年新生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降低了46%。如果这种估计准确的话，这种降幅可以与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时期相“媲美”。<sup>26</sup>

而且，美国革命也对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乐土的形象造成了损害。保皇派人士遭受了粗暴的征收，这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都给英美政府关系造成了损害。最终，对这些人所受损失的补偿，不是如和平条约所说的那样是由美国政府作出的，而是由英国议会作出的。最终，在调查委员会进行的漫长调查之后，英国议会向近2300人支付了超过300万英镑的补偿款。<sup>27</sup> 最为糟糕的是，就美国的声誉而言，奴隶制这个尴尬的问题被革命理论一再凸显出来。白人殖民者宣称他们所有的权利以及他们愿意给奴隶的权利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反叛者蒙上了虚伪的恶名。甚至在战争过程中英国政府支持者就一再指出美国人的这种自相矛盾。战后，由于英国政府急于恢复自己的形象，更急于矮化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同时虔诚的宗教人士急于重新获得上帝的眷顾，英国评论家们大力抓住英国在1783年开始的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以与美利坚合众国相比较：在美利坚合众国，奴隶制不仅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继续存在，而且也在1787年的新宪法中获得了合法地位。<sup>28</sup>

那部宪法是在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一段颇长的政治混乱之后才产生的。第一次试图确立各州和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邦联条例》过于倾向于各州，使得大陆会议无法募集战争所必要的资金。然而，要在一个更好的宪法安排上达成协议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那些反对强化联邦政府



的人认为（他们的主张有一定道理），让大陆会议获得征税权就是对革命的背叛，而这种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拒绝另外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试图侵犯不同殖民地经济自主权的企图。美国人之所以走到一起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治权，而现在他们居然被要求放弃自己的权利，把它交给一个强化了了的中央政府。支持联邦政府的人则认为这种主张同样也有它的道理，《邦联条例》的松散架构根本就行不通。它以前破坏了战争行动，现在又阻碍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任何作用。如果无法在和平时期获得资金维持一支军队的话，美国甚至无法迫使英国政府从在1783年已经许诺给美国的西部土地上的据点中撤出。一些热情歌颂美国革命的外国人士，比如英国的理查德·普莱斯，他宣称这个新共和国是全世界的榜样。<sup>29</sup> 然而，大部分外国观察家则不那么认同。欧洲政治家们怀疑美国人是否可以维持他们的独立。一些人甚至预测美国各州会再一次成为英国的某种新形式的附庸。

1787年宪法的通过并没有解决中央政府同州权之间的冲突问题。这部宪法也没有完成自独立之日开始的这个进程：建立一个美国国家。宗派忠诚和地方忠诚依旧十分强大。有时候这些地方力量可以在那种泛泛的“美国”概念下开心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对本州和本地区的忠诚非常强大，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的一种替代。很说明问题的是，直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之后，“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才作为一个单数名词——而不是复数名词——被广泛使用。美国也没有像这个新生国家的创立者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地完成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它只是在19世纪后半叶完成了工业化之后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的。可以这么说，美国从20世纪初期开始才有了显著的全球性

影响力。

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处在比较弱的地位。实际上，尽管美国获得了政治独立，美国人可以自由地将他们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大陆上进行扩张上，但在许多方面，美国还是依赖英国。不错，由于不受英国的商业立法限制了，他们可以与此前对他们封闭或者至少来说难以进入的世界相关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美国与北欧以及非英属西印度群岛地区的贸易额在18世纪80年代有了显著的增长。到了1790～1792年，这两个地区的贸易额加在一起占到了美国出口的40%。但同样是在这些年份，不列颠和爱尔兰一直是美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它们进口了美国出口的所有货物的31%。而且，在18世纪90年代，在诸如烟草、谷物、木材和鱼类产品这样的传统出口物资之外，又增加了棉花这种新品种。这些棉花维持了苏格兰西南地区的兰开夏郡和克莱德河谷（Clyde Valley）的棉纺织厂的生产。英国生产的产品，特别是铁器和纺织品，则继续在美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在美国禁止从英国进口产品时期涌现的美国国内工业，在淹没了战后美国的大量廉价的英国制造商品的冲击下，艰难地维持着生计。换句话说，从经济上来说，美国基本上还是它原来的母国的殖民地。

可以说，美国独立战争并不是通常的武装冲突中一方失败而另一方胜利的简单刻板的故事。名义上的失败者英国在冲突结束后看起来是处境不佳，但许多人马上就开始意识到，他们依旧可以享受英国与美国殖民地之间的旧式帝国主义关系所带来的许多好处，同时又不用承担那种关系所带来的负担。英国的更大范围的帝国还远远没有开始一场缓慢但不可避免的衰落；相反，几年之后它变得比以前还更为庞大了。而那些

表面上赢得胜利的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后续发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特别是，法国和荷兰的旧体制都崩溃了，而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它们介入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所导致的。这种影响首先是财政上的，后来又演变为政治上的。短期来看，西班牙重新夺回了一些土地，但接着它却又失去了美洲帝国的大部分地方，这种长期后果至少部分受到了英国的13个北美殖民地叛乱成功的影响。即使是美国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不可争辩的胜利者，在战争之后的许多年之中，美国也一直没有获得与其政治独立相匹配的经济和文化的独立……

【注释】

1 See Stephen Conway, *Britain, Ireland, and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imilarities, Connections, Identities* (Oxford, 2011), p. 94–7.

2 This view is supported in Brendan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Defe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1714–1783* (London, 2007), especially Chapters 22–3.

3 ‘The Present State of Europe Considered’, *General Advertiser*, 26 November 1785.

4 Eliga H. Gould, ‘A Virtual Nation: Greater Britain and the Imperial Leg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iv (1999), pp. 476–89.

5 See P.J. Marshall, *Remaking the British Atlantic: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fter Independence* (Oxford, 2012).

6 Sarah Pearsall, *Atlantic Families: Lives and Letters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8).

7 Sylvia R. Frey, *Water from the Rock: Black Resistance in a Revolutionary Age* (Princeton, 1991), pp. 193–6.

8 Maya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American Loyalists in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New York, 2011).

9 The terminology is disputed: see P.J. Marshall, 'Britain without America— A Second Empire?', in P.J. Marshall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p. 576–95.

10 See Simon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London, 1991).

11 Jacques A. Barbier and Herbert S. Klein, 'Revolutionary Wars and Public Finances: The Madrid Treasury, 1784–180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 (1981), pp. 315–39.

12 Quoted in John Lynch, *Bourbon Spain, 1700–1808* (Oxford, 1989), p. 320.

13 J.H.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2006), p. 355.

14 Quoted in Mario Rodriguez,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Spanish-and Portuguese-Speaking World', in Richard B. Morris (ed.),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broad* (Washington, DC, 1976), p.

103.

15 Ibid., p. 115.

16 See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Chapters 11 and 12.

17 Paul Cheney, 'A False Dawn for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Franco–American Trade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xiii (2006), pp. 463–88.

18 See Laurent Dubois, *A Colony of Citizens: Revolution and Slave Emancipation in the French Caribbean, 1787–1804* (Chapel Hill, 2004).

19 Jonathan Boucher, *A View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irteen Discourses, Preached in North America between the Years 1763 and 1775* (London, 1797), vii.

20 A good example is the Swedish-born Axel Fersen, who seemed to despise everything he saw in America: see Katherine Prescott Wormeley (ed. and trans),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Count Axel Fersen* (London, 1902).

21 Forrest McDonald, 'The Relation of the French Peasant Vetera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Feudalism in France, 1789–1792', *Agricultural History*, xxv (1951), pp. 151–61.

22 See Claude Fohlen,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France', in Morris (ed.),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broad*, especially p. 27.

23 The classic exposition of the case for ideological transfer across the

Atlantic is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1959).

24 See, especially, Robert D. Harris, ‘French Finances and the American War, 1777–178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lviii (1976), pp. 233– 58.

25 J.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39 vols, Washington, DC, 1931–44), xxviii. p. 500.

26 John R. McCusker and Russell R.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1789* (Chapel Hill, 1991), p. 374.

27 Harry M. Ward,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London, 1999), p. 47.

28 See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2006).

29 Richard Pric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784), especially pp. 14–15.

# 延伸阅读

有关美国独立战争方面的文献非常庞杂。下面是一些非常有用的著作、论文和文章。其中一些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基础，其他一些则和本书描述的图景完全不同。这个清单仅限于二手文献。前面的尾注已经显示了可供研究这场战争的学者们研究的一手资料的广度，这些资料既包括进一步档案文件，也有印刷品。

Alden, Joh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69)

Armitage, Davi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ix (2002)

Baack, Ben, ‘Forging a Nation State: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iv (2001)

Barbier, Jacques A., and Klein, Herbert S., ‘Revolutionary Wars and Public Finances: The Madrid Treasury, 1784–180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 (1981)

Bickham, Troy, *Making Headline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seen Through the British Press* (De Kalb, Ill., 2009)

Black, Jeremy, *War for America: The Fight for Independence, 1775–*

1783 (Stroud, 1991)

Bowler, R.A., *Logistic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British Army in North America* (Princeton, 1975)

Bradley, James E.,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England* (Macon, Ga., 1986)

Brown, Christopher Leslie, *Moral Capital: The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2006)

Chickering, Roger, and Förster, Stig (eds.), *War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75–1815* (Cambridge, 2010)

Coker, W.S., and Rea, R.R. (eds.), *Anglo–Spanish Confrontation on the Gulf Coast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ensacola, 1982)

Conway, Stephen,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2000)

Conway, Stephen,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1775–1783* (London, 1995)

Dickinson, H.T.(ed.),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98)

Dull, Jonathan R.,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1985)

Dull, Jonathan R.,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75)



Enthoven, Victor, 'Dutch Maritime Strategy', in Donald Stoker, Kenneth J. Hagen, and Michael T. McMaster (eds.),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London, 2010)

Fenn, Elizabeth A., *Pox Americana: The Great Smallpox Epidemic of 1775–82* (New York, 2001)

Ferling, John, *Almost a Miracle: The American Victory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2007)

Fischer, David Hackett, *Washington's Crossing* (New York, 2004)

Flavell, Julie, and Conway, Stephen (eds.),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The Impact of War and Warfare in Anglo–America, 1754–1815* (Gainesville, 2004)

Gould, Eliga H., *The Persistence of Empire: Britis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2000)

Graebner, Norman A., Burns, Richard Dean, and Siracusa, Joseph M.,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from Confederation to Constitution, 1776–1787* (Santa Barbara, Ca., 2011)

Griffiths, Samuel B.,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from 1760 to the Surrender at Yorktown* (Urbana, Ill., 2002)

Gruber, Ira D., *The How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2)

Harris, Robert D., 'French Finances and the American War, 1777–

178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lviii (1976)

Hibbert, Christopher, *Redcoats and Rebels: The War for America, 1770–1781* (London, 1990)

Higginbotham, Don,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Military Attitudes, Policies, and Practice, 1763–1789* (New York, 1971)

Jackson, John W., *With the British Army in Philadelphia, 1777–1778* (San Rafael, Ca., 1979)

Jasanoff, Maya, *Liberty's Exiles: American Loyalists in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New York, 2011)

Kennett, Lee, *The French Forces in America, 1780–1783* (Westport, Conn., 1977)

Kurtz, Stephen G., and Hutson, James H.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1973)

Langford, Paul, 'The English Clerg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Eckhart Hellmuth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England and German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0)

Lawrence, Alexander A., *Storm over Savannah: The Story of Count d'Estaing and the Siege of the Town in 1779* (Athens, Ga., 1951)

Mackesy, Piers, *The War for America, 1775–1783* (London, 1964)

Marshall, P.J.,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mpires: Britain, India, and America, c.1750–1783* (Oxford, 2005)

Marshall, P.J., *Remaking the British Atlantic: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fter Independence* (Oxford, 2012)

Middlekauff, Robert, *The Glorious Caus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9* (New York, 1982)

Middleton, Richar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1775–1783* (London, 2012)

Mitnick, Barbara J. (ed.), *New Jerse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NJ, 2005)

Morley, Vincent, *Irish Opin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0–1783* (Cambridge, 2002)

Morris, Richard B. (ed.),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broad* (Washington, DC, 1976)

Morris, Richard B., *The Peacemakers: The Great Powers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65)

Norton, Mary Beth, *Liberty's Daughters: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 1750–1800* (Boston, 1980)

O'Shaughnessy, Andrew Jackson, *An Empire Divided: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2000)

Paterson, A.T., *The Other Armada: The Franco–Spanish Attempt to Invade Britain in 1779* (Manchester, 1960)

Peckham, Howard,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 Military History*

(Chicago, 1958)

Randall, Willard Sterne, *Benedict Arnold: Patriot and Traitor* (New York, 1990)

Robson, Eric,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1763–1783* (London, 1955)

Shy, John,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6)

Scott, H.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1990)

Smelser, Marshall, *The Winning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3)

Torres Sánchez, Rafael, ‘Public Finances and Tobacco in Spain for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in H.V. Bowen and A. González Enciso (eds.), *Mobilising Resources for War: Britain and Spain at Work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amplona, 2006)

Torres Sánchez, Rafael, ‘Monopoly or the Free Market: Two Ways of tackling the Expenditure: The Expedition to Minorca (1781–1782)’, in Stephen Conway and Rafael Torres Sánchez (eds.), *The Spending of States: Military Expenditure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atterns, Organization, and Consequences, 1650–1815* (Saarbrücken, 2011).

Wallace, Willard M., *Appeal to Arms: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51)

Ward, Christopher, *The War of the Revolution*, ed. John Alden (2 vols., New York, 1952)

Ward, Harry 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ationhood Achieved, 1763–1788* (New York, 1995)

Ward, Harry M.,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London, 1999)

White, Donald Wallace, *A Village at War: Chatham, New Jerse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utherford, NJ, 1979)

Willcox, William B., *Portrait of a General: Sir Henry Clinton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64)

[注1:](#) 也就是现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Praia）。——译者注

[注2:](#) 这是英国内阁在1782年之前存在的一个部门。1782年之前，有一个北部国务大臣，一个南部国务大臣，二者之间的权限划分是按照地域进行的。南部国务大臣级别高一些，负责的是南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北美殖民地（1768年美国殖民地的管理交给了殖民地国务大臣），并负责与罗马天主教和欧洲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北部国务大臣，级别相对低一些，负责北英格兰和苏格兰，并负责与北欧的新教国家之间的关系。1782年，两部被改组为内政部和外交部。——译者注

[注3:](#) 实际上，英文中的American，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为“美国（人）”的时候，有时候不那么准确，因为在具体语境下，“美国”这个国家可能还没有诞生，就谈不上“美国（人）”了。但是，考虑到翻译为“美国（人）”并不会引来特别的歧义，因此，为了阅读的简便，同时与原文保持一致，除非特殊情况，本书中通常都直译为“美国（人）”，有时候也使用“北美（人）”“殖民地（人）”的译法。——译者注

[注4:](#) 桑特海峡战役（Battle of the Saintes），发生于1782年4月9日至12日，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在西印度群岛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是一场英法之间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的利益争夺战，英国的获胜，也结束了其在此地区受到的来自法国的威胁。——编者注

[注5:](#) 迈索尔（Mysore），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旧称。——编者注

[注6:](#) 新英格兰地区，指的是美国东北部的康涅狄格、缅因、马萨诸塞、罗得岛、佛蒙特及新罕布什尔。——编者注

[注7:](#) 原文为Episcopalian，指主教派教徒或美国圣公会教徒。由于美国独立革命，英国圣公会于1789年在美国被废除，美国的安立甘宗教后将其改名为美国圣公会。——编者注

[注8:](#) 新法兰西，指原法国位于北美洲的殖民地，最初包括圣劳伦斯湾地区、纽芬兰以及新斯科舍。后来逐步扩张，又包括大湖地区的大部分和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部分地区。最终形成北起哈德逊湾，南至墨西哥湾，包括圣劳伦斯河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划分成加拿大、新斯科舍、哈德逊湾、纽芬兰、路易斯安那五个区域。——编者注

[注9:](#) 即现在的金奈，印度第四大城市，泰米尔纳德邦首府。——译者注

[注10:](#) 即现在的毛里求斯岛。——译者注

[注11:](#) 即现在的留尼旺岛。——译者注

[注12:](#) 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亦即惨胜，胜利一方同样遭

受了沉重损失，基本上和一场失败没什么差别。——译者注

[注13:](#) 请参见前文特朗布尔的画作《蒙哥马利将军之死》和《邦克山战役》。——译者注

[注14:](#) 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一家成立于1670年5月2日的英国公司。它是北美最早的商业股份公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司之一。——编者注

[注15:](#) 埃尔米纳（Elmina），加纳的一座小城，在历史上是西非地区的首个欧洲人殖民地。——译者注

[注16:](#) 亭可马里（Trincomalee），斯里兰卡东北部港市。——译者注

[注17:](#) 递减税制下，收入高的人的税率，低于收入低的人的税率。——译者注

[注18:](#) 容积单位，相当于36 蒲式耳。——译者注

[注19:](#) 出生在日内瓦的法国财政部长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在瑞士



有不少故旧。

[注20](#): 新格林纳达是西班牙在南美洲北部殖民地从1717年开始的名称，其领域相当于今天的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19 世纪南美洲的独立运动结束了这个海外殖民政府。——编者注